

军事天地

- 47 谈谈航母战略问题(上) / 石稼
55 军语新解 / 石评

人物

人物春秋

- 57 陈赓与黄埔军校 / 陈予欢

陈述黄埔

- 62 聂荣臻在黄埔军校论说“纸老虎” / 陈宇

百岁黄埔老人

- 67 百岁风雨路 悠悠黄埔情
——记我的父亲、百岁黄埔老人刘华民 / 刘春

黄埔人生

- 69 关麟征将军与台儿庄战役 / 马冠群

我的黄埔前辈

- 72 一位黄埔四期生的人生经历 (上)
——记父亲姚国俊 / 姚建

历史

黄埔研究

- 75 抗日伤残官兵生产自救的安置事业(上) / 杨守礼 黄胜利

黄埔收藏

- 80 我珍藏的黄埔军校签名本《化学兵器教程》 / 单补生

黄埔日历

- 87 1926年5月5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成立 / 贾晓明

黄埔连载

- 92 你不知道的台湾: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十一) / 熊子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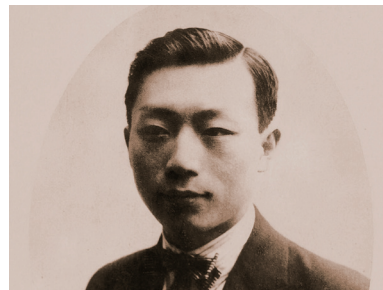
双月刊单月1日出版
2023年第1期总第208期



2 黄埔后代风采(山东篇)



57 陈赓与黄埔军校



62 聂荣臻在黄埔军校论说“纸老虎”

扫码下载
《黄埔》杂志 APP




黄埔后代风采

——山东篇

□ 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 供稿

黄埔精神，薪火相传。近年来，在黄埔精神感召下，越来越多的黄埔亲属后代走进黄埔军校同学会，接过老一辈黄埔人手中的旗帜，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成长为黄埔精神坚定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他们以“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极大热情投身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各项工作中。他们更以“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奉献与担当精神立足岗位，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发展进程中，在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推动祖国统一进程中，彰显了黄埔担当、弘扬了黄埔精神、贡献了黄埔力量。

本期特别策划——“黄埔后代风采（山东篇）”选取了部分山东黄埔后代的故事。他们是广大黄埔亲属后代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生动缩影。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各种波折与荆棘。“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广大黄埔后代将继承先辈伟大志业，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黄埔后代 风采

山东篇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记黄埔后代李德强

李德强，黄埔军校1期生李仙洲之子。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常委，第七届至第九届山东省委会常委，第十届省委会副主委，第十一届省委会主委。

在李德强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幅“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的书法作品。这8个字，不仅嵌入了李德强的名字，更是李德强的人生座右铭。几十年来，这8个字激励着他迎难而上、遇雨穿行，一路向前。作为企业技术骨干，他钻研创新，助力小鸭集团的创建和发展；作为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他带领山东省民革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奋进，开创了山东省民革工作新局面；作为黄埔后代，他牢记“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竭诚促进两岸交流交往。无论在人生哪个阶段，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李德强都勇于担当，主动作为，业绩斐然，体现了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品格和特性。

德以修身——穿越风雨志弥坚

李德强的父亲，就是电影



/ 李德强。

《南征北战》中“李军长”的原型、原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李仙洲是黄埔1期毕业生，因入校时年龄最大、个头最高，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和同学们一起亲切地称李仙洲为“李大哥”。1925年到1927年，他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历任国民革命军的排长、连长、少校营长等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后参加了长城居庸关抗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豫中会战等，多次负伤，因战功卓著成为抗日名将。

1947年2月，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被俘。1960年，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第二批特赦

人员释放，这时，13岁的李德强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父亲按照族谱，将他的乳名“树国”改为“德强”。“直到后来我才深深体会到，父亲是希望我要以德修养自己，脚踏实地，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去创造美好的明天。我将这作为自己一生遵奉的信条。”李德强说。

特赦后的李仙洲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冲击。受父亲的影响，李德强在学校里也遭到同学的歧视。于是，李德强比其他同学更勤奋更努力，不仅主动帮助同学补习功课，而且主动承担班级各种劳动任务。每天，他都最早到学校，帮助清扫院子、提水、冲洗厕所等。学校开展勤工俭学，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会理发、木工等技术，义务帮助全班同学理发，还用碎木料维修教室的桌、椅、门窗。李德强默默地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还被同学选为全校的少先队大队长。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李德强被分配到日照，后又到济宁的农村。不管在哪里，李德强干活从来不惜力，都是抢最重最累的活干，还主动帮助体弱干活慢的社员。面对村民的偏

见，他始终默默坚持用行动换取理解——义务为村民服务，办黑板报传授农业小知识，教村民唱歌，为村民理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帮农户把水缸挑满。全村一百多户，都得到过李德强的帮助。吃苦肯干的他不仅得到了当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还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知青队长。1972年，城市招工回城，李德强被调回分配到一个30多人的集体小厂——济南变压器制修厂，当了一名工人。

德以立业——攻坚克难勇担当

刚到济南变压器制修厂时，李德强的工作是缠铜线，全是手工操作，不仅累而且效率低。除此之外，制修厂其他的工序环节也均是手工操作，工人们干起来很吃力。李德强决心自学电器知识，改变落后的生产工艺。

李德强是老三届出身，文化基础好，但要提升企业工艺水平并非易事。工作之余，李德强购买了相关专业书籍开始刻苦钻研技术：不会画图，自学；不会车床，自学；不会电焊，自学。自强不息的李德强凭借自己的刻苦和努力，研制出自动的电动倒链机、自动割纸机、自动对焊机，为工厂搞了大量的技术革新，使厂里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几十倍。当年，李德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担任了全厂“七二一



高中时的李德强(左)与父亲李仙洲。

大学”的教师。1975年，制修厂制造了全国第一台KVA5600千瓦高频电炉变压器，参与研发组装变压器主体核心部件的李德强胸戴大红花接受了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嘉奖。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李德强凭高考分数免试上了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学习电子专业。他一边在职学习，一边在变压器制修厂继续搞产品创新。1978年，工厂接到了试制洗衣机的任务，便把这项重任交到了李德强手中。李德强回忆：“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只知道用

手、用搓板搓衣服，谁也没见过洗衣机，没用过洗衣机，人们不知道洗衣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辗转在广州寻找到一台报废的日本洗衣机，运到济南当样机。”在试制车间，李德强把样机的电动器件全部拆卸开，一件一件地做好标记并查明用途，忙得顾不上吃饭，实在饿了就抓个凉馒头啃几口。然而进行到最核心的电路焊接部分时，李德强被难倒了。他忽然想起父亲有位日本籍的教授朋友，马上骑自行车到教授家里，找到一本专门论述日本产洗衣机的书。拿到



李德强(左)在厂里的“七二一大学”给工友们上课。



1985年,在北京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李德强(站者)展示国内同时也是亚洲第一台滚筒全自动洗衣机,国家轻工业部领导现场观摩。

书后,李德强跑回车间,一点一点地研究并焊接线路,直到第二天早上厂长来给他送早饭,他才发现自己一整夜都没合眼。厂长劝李德强休息,李德强说:“我

不困,找不出线路不通的原因,我睡不着。”以李德强为核心的7人试制小组,吃住在厂里,经过107天的艰苦奋斗,终于成功制造出10台洗衣机样品。从此,

全自动的波轮洗衣机在济南诞生了。1979年4月,根据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国家轻工业部将济南确立为全国六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济南洗衣机厂应运而生。

1982年,李德强作为技术骨干和负责人,代表济南洗衣机厂到意大利考察,为引进滚筒洗衣机技术做前期调研和市场考察。回国后,他下基层搞调查研究,跑市场了解用户心理,整理出第一手的市场分析和资料数据。1984年3月,济南洗衣机厂与CITIC合资从意大利引进了先进的滚筒洗衣机技术、设备和生产线,生产制造出亚洲第一台全自动滚筒洗衣机。一时间,小鸭牌洗衣机随着“小鸭小鸭,顶呱呱”的广告语享誉千家万户。

就这样,李德强从技术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先后取得了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职务也由小组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晋升到副厂长,真正见证和参与了济南洗衣机厂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可以说,“小鸭”牌洗衣机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凝结了李德强的智慧和辛劳。1987年,“小鸭”在同行业中首获国家质量奖银质奖章。1994年,“小鸭”又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成为国内洗衣机行业唯一一家通

过国内外两家体系认证企业，并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取得德国GS、欧洲CE、美国UL国际安全认证，荣获“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称号。其年销售额也由1990年的2000万元猛增至1998年的18亿元。2000年，小鸭集团“超值服务工程”荣获国家经贸委第五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

技术创新之余，李德强还编写了《家用洗衣机的结构性能和原理》《全自动滚筒式洗衣机的结构性能和原理》《家用洗衣机的维修》等5部专著，共计70余万字，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共计50余篇。1990年，李德强的论文获国家轻工业部论文三等奖。同年，他本人荣获了山东省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称号。

被问到怎样看待人生中的逆境？李德强和蔼而平静地回答：“我常说，人生有三宝，一是好习惯，二是好心态，三是好人缘。当你生活遇到低潮的时候，应该把自己变成草原的小草，要有踩不死、揉不烂、烧不尽的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不要去怨天尤人，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自己不断努力，持之以恒必获教益。”

德聚人心——民革工作换新颜

1985年，李德强作为有代表性的人士加入民革（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2007年，李德强当选为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在此之前，李德强已在民革济南市委担任了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委和第五届、第六届委员会主委，对民革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思考。2007年省委会换届之后，李德强提出，要把搞好政治交接作为工作重点，要把促进团结和谐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建设团结和谐的领导班子，进而实现全省民革党员的整体和谐，是民革各级组织的重要任务，也是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客观要求。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首先抓的就是团结。”李德强认为，“团结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团结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大同就是争取在大的原则方面取得共识和谅解，小异就是在小的具体问题上可以保留不同的见解”。在李德强的领导下，民革山东省委会领导班子严格按照“集体领导、分工合作、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开展工作，极大地激发了机关同志的工作积极性，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效。机关呈现出团结、和谐、奋进、向上的良好氛围。民革山东省委会被上级部门称为“团结和谐的领导班子”。

李德强还把爱学习的好习惯带到了山东省民革机关。他认

为参政党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首先要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学习，把民革真正打造成学习型政党。李德强担任主委期间，始终把学习作为承载各项工作的基础。他经常勉励机关干部：“读书学习既是一种政治责任，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更是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李德强的倡导下，民革山东省委会建立了《中心学习组学习制度》，把学习列为各种会议的重要议程。省委会定期举办党员骨干培训班，邀请领导、专家作有关多党合作等理论的讲座，开创性地将学习与重大活动相结合，以活动提升学习成效，以学习带动活动开展。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活动，山东省广大民革党员进一步加深了对多党合作理论的理解，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李德强更是率先垂范。56岁那一年，他终于迎来了一个回到校园读书的机会，进入山东大学攻读MBA专业。他说：“虽然这些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不断学习，但感到很多知识已经跟不上时代，只有更系统地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知识，才能更好地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进大学学习，李德强不是为了拿文凭、装面子，而是真学习、真读书。他认真听好每一堂课，认真做好课堂笔记，遇到问题认真与老师交流



/ 2007年12月，李德强（前排左五）参加庆祝民革成立60周年书画笔会。

探讨。3年的学习课程，李德强几乎一节不落，成了课堂上年龄最大、出勤率最高、听课最认真的学生，被老师们亲切地称为“三最”学生。

2009年，李德强将山东省民革的工作主题定为“基层组织建设年”，亲自率调研组到淄博、潍坊、日照、青岛4个市进行调研。山东省委会制定并下发了《民革山东省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全省民革各基层组织大力加强自身建设，不仅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提高了广大民革党员的政治理论素养，激发了大家参政议政和社会服务的热情，也为发现和培养后备干部提供了重要保障。李德强还积极推进民革内部监督工作，在2011年1月10日的民革山东省第十一届六次会议上，民革山东省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也是山东省各民

主党派中最早成立的内部监督机构。

李德强还非常重视宣传。在他的关注和支持下，2008年10月，民革山东省委会网站正式开通，从此，全省民革各级组织有了更具广泛性和实效性的宣传阵地。2009年，《山东民革》杂志第一次出版增刊，专题报道省内优秀民革党员的事迹。增刊一发到山东民革党员们手中就引起了热烈反响，激发了大家更加努力地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的积极性。2011年5月，由李德强担任名誉团长的山东中山艺术团成立，为山东省民革增添了一个新的宣传平台。艺术团成立大会上，李德强勉励各位团员“要力争把山东中山艺术团打造成为传承革命先辈优良传统、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讴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展示民革党员时代风采的优秀平台”

德怀天下——参政议政谏诤言

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是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民主党派永葆活力的源泉。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对参政议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建立参政议政工作的长效机制？如何促进提案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如何体现党派的特色？”这是李德强经常思考、反复研究的问题。

李德强首先扩充了民革山东省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使这项工作的组织保障更加有力。另外，他还重视借助“外脑”。2008年，民革山东省委会举行聘任仪式，聘请了中共山东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省政协提案委、省政协研究室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民革山东省委会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顾问委员会。除此之外，李德强还在深入挖掘山东省民革党员智力资源上下工夫。2009年，民革山东省委会聘任了66名特邀信息员和35名信息联络员。2011年，又建立了民革山东省社情民意信息操作系统平台，完善了信息报送网络。为了更广泛地调动全省民革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民革山东省委会还制定了《民革山东省委会参政

议政提案、建议奖励办法(试行)》《民革山东省委会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比奖励办法(试行)》，同时邀请专家举办参政党理论研究、参政议政提案的撰写、社情民意的收集等一系列专题讲座，培训和储备了一批后备人才，形成了“由下而上，集思广益，人人参与”的良性循环，为民革山东省各级组织不断提升参政能力、进一步发挥参政党职能夯实了基础。

李德强不仅重视省委会的参政议政工作，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他更是心系国是、情牵民生。为确保提案质量，获得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李德强亲自带队，广泛深入开展调研。2009年，为调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李德强带领民革山东省委会调研组，先后赴山东的青岛、烟台、枣庄、泰安、莱芜、临沂6个市9个县(市、区)12个乡镇深入调研，通过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座谈交流，深入12个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若干个土地承包大户和农村合作组织进行实地考察，深入村庄同农民交谈等，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2010年6月，为进一步推进山东省小城镇建设发展，以李德强为组长，由城市规划和村镇建设的有关专家组成的调研组，先后到威海、潍坊、

临沂、济南、莱芜等市的10余个县(市、区)20多个小城镇，以及广东、浙江、江苏等小城镇建设先进省份进行了深入调研。“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通过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李德强获得了翔实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先后撰写出了《实施强镇带村战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议》等提案。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业生产迈上了新台阶。但是，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涉及“三农”的问题也是李德强每年关注的焦点。针对农村宅基地私下无序流转、偏远农村宅基地缺乏合理规划、富裕农民进城购房造成“空心村”等现象，李德强提出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建议》。随着农村金融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涉农主体的金融需求进一步得到了释放和满足，金融成为助推农业健康发展、新农村建设提速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动力。为了更好地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新型金融工具为农业所用，李德强提出了《关于积极推进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改革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大涉农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扶持力度的建议》。在多次全国政协

会上，李德强还提出《应对金融危机，稳步推进对外投资的几点建议》《关于大力推广节能环保、减排除硫、自主创新燃煤技术的建议》《关于防范中小银行盲目扩张风险的建议》等提案，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理念。

德牵两岸——血脉同根一家亲

作为一名黄埔将领的后代，李德强一直为推动海峡两岸沟通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而积极奔走。李德强利用自身特有的家庭背景，与父亲原来的老同事、老部下(他们中许多都是台湾高级军官)及其后代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前些年，李德强每年通过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接待来自台湾及海外的黄埔军校同学会、成城中学同学会等团体的参访达数十次。通过陪同他们参观祖国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以经济、文化、亲情为话题进行交流，使他们增强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李德强认为，除了交流活动外，通过对两岸近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共同研究，让两岸同胞建立共同的历史记忆，也是密切两岸同胞关系的重要形式和内容。

担任民革山东省委会主委期间，李德强代表山东省委会接待



1 / 2009年12月，李德强（左）率团访台期间，与连战座谈。

了台湾齐鲁文化之旅参访团、中国国民党高雄市干部参访团、台南妇女菁英参访团，以及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瞻夫妇，台湾防务部门原副参谋总长、海军二级上将费鸿波，中国国民党“中常委”、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廖国栋等台湾友人。2008年10月，由李德强担任会长的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山东分会在济南正式成立，为加强山东省民革各级组织和党员对孙中山思想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12月，民革山东省委会与民革青岛市委会共同主办了“弘扬民族文化，共贺中华繁荣——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山东、台湾书画邀请展”。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华国际观光协会理事长刘宗明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荣誉主席连战、副主席林丰正，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

坤等分别为展览亲笔题写了“华夏之光”“彩艺宏扬”等贺词。

2009年12月，李德强率团赴台湾进行参访。参访团拜会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和蒋孝严以及部分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山东籍退役将领，史学界、企业界等高层人士。李德强的台湾之行受到了热烈欢迎，在与连战会面时，原定的交流时间是30分钟，虽然连战的秘书一再提醒“时间到了”，连战仍与李德强相谈甚欢，直到45分钟后才结束。参访团还拜访了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党史馆、“国父”纪念馆等部门，并与台湾史学界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交流。

2010年8月，在李德强的倡导下，“傅斯年学术思想的传统与现代”研讨会在山东聊城举办。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王汎森、

台湾交通大学校长吴重雨专程出席了研讨会。

2011年9月，由民革中央办公厅主办，民革中央画院、民革山东省委会、民革济南市委会、山东画院承办，山东中山书画院、山东省博物馆协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全国书画作品展山东巡展”在山东济南开幕。展览共展出美术作品80余幅，弘扬了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也受到了台湾书画界同仁的高度评价。

前些年，由黄埔16期生、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先生发起的“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每次举办时，都有来自海内外的黄埔同学以及有代表性的知名黄埔同学后代亲属、两岸关系知名专家学者等参加，其中还包括40余名台湾岛内的退役将领。该论坛已经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交流的重要平台，每次的论坛活动，李德强都积极参加。李德强还担任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亲友联谊会会长，通过与海内外黄埔师生及亲友交流联络，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早日实现统一而努力。

如今，年逾古稀的李德强还未停下脚步，不是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就是为百姓帮扶解困出谋划策，始终走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路上。■

四十余载科创梦 为国为民黄埔情

——记黄埔后代刘锡潜

刘锡潜，黄埔军校第17期生刘寿彭之子，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200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8年当选山东省十大财经风云人物，被业界誉为“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品牌之父”。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吹遍中华大地，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召唤着勇敢无畏的弄潮儿。刘锡潜秉承“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开始了他不同凡响的人生旅途。

如今，刘锡潜创办的禹王集团已扩展为拥有四大支柱产业、11个工业实体的集团性企业，在大豆深加工、生物医药、技术陶瓷新材料、粘接新材料四大领域占据行业领军地位。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企业、中国大豆蛋白协会理事长单位、全国首批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全国绿色工厂等称号，并于2018年摘得中国工业大奖的桂冠。2022年，他又被推选为国家大豆精深加工产业科技创新联盟首届理事长。



/ 刘锡潜。

雏凤清声，不一样的农民

50年代初，5岁的刘锡潜就开始在上学之余跟随父母奔波于生计，帮助经营织席、贩篓、养鸡、养兔、养牛等50余种家庭副业，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心智，也历练了他生活的勇气。干活的时候，家长们总给他讲述他的外祖父跟随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故事，还有他父亲跟随31师师长池峰城在台儿庄保卫战中拼杀敌寇的故事，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他父亲居然从山东步行到成都考取黄埔军校。“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渐渐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催生了“救国救民”的幼芽。

1970年，刘锡潜被推选为村里的生产队长。上任第2天，

他就去县里的新华书店将与种植、土壤结构等有关科学种田的各类书籍买回家学习。刘锡潜潜心钻研，采用新的种植技术和种植方式，使当年农作物产量增长了30%。在此基础上，他又陆续在密植、深耕技术及微量元素的使用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发明和推广了玉米撮种、玉米和苕子绿肥间种，特别是对当时推行的串种方式的改革，不但省去了田间的除草工序，大大节约了时间、减少了劳动力，最终产量还比其他生产队都高。刘锡潜带领大家采用科学种植使原来贫瘠土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了1.7的水平，为农作物高产丰产创造了基础条件，成为在当地第一个实现玉米密植产量突破1000斤的生产队。

雏鹰起飞，别样的商人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刘锡潜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就要到来，决心今后要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中去。

1979年，《人民日报》的一则小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吉林省财贸学院发明了一种用大豆高

温脱脂豆粕制作的植物蛋白肉，这种植物蛋白肉的营养和口感跟肉差不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刘锡潜认为，这个产品很适合当时人民生活的需要，便创办了当时戴着“红帽子”的“禹城县城关蛋白质厂”。这是禹王集团的雏型。

刘锡潜刚开始创办蛋白质厂时，就为企业制定了“贡献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宗旨。这源于他幼时立下的“救国救民，报效国家”的志向。刘锡潜，别样的商人，从此走上了一条产业报国的新路。这是一条新时代更加广阔的道路。

弱鹰折桂，摘取“皇冠上的明珠”

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之际，我国科学技术的研发遇到了一个瓶颈——检测试验产品质量的化学试剂的质量和品种种类远远满足不了研发市场的需要。

1983年，刘锡潜找到沈阳化工学院研发胶粘剂产品的教授们，并加入到他们正在进行的 α -氰基丙烯酸项目研究中，即商品名为502胶粘剂的产品研发项目。该项目在胶粘剂行业的技术难度被誉为“皇冠上的明珠”，是胶粘剂行业中最复杂、最精密的工艺。实习半年后，刘锡潜就把该项目从实验室搬到了他的家乡，办起了“禹城县东方化学试剂厂”。所有的设备都是刘锡



/ 1989年7月，刘锡潜（左上图右一，右上图左）与工人一起建设制药厂。



/ 刘锡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潜用采购站收集的旧材料自行改制、焊接完成的。刘锡潜及其团队进行了上百次的试验，终于在第二年生产出了合格产品，胶的剪切强度达到了先进水平。刘锡潜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改革，使化学工业胶粘剂在生产过程中不再使用有机溶剂，解决了行业的绿色生产难题，新产品项目成果被美国化学杂志刊登，成为山

东省德州市建国以来第一个获得国家发明奖的项目，刘锡潜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502胶粘剂成功后，刘锡潜及其团队又相继研发试验成功了包括离子对，色谱试剂甲醇、乙腈等众多用于医药、卫生、科研的化学试剂产品，其中有7个产品于1991年替代国外进口产品。至今，禹王牌502胶粘剂、

化学试剂仍是业界的知名品牌。

鹰掠深海，以智强国显初心

“这一代，你们（指中国人）应该追不上我们，下一代恐怕也未必然。”这是1989年刘锡潜在日本考察时听到一位日本人说的话。刘锡潜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军事实力的比拼，更是国民智力水平的较量。中国人要强大起来就必须要有睿智的大脑。随后，他了解到“吃鱼可以健脑”“人类若缺乏必须脂肪酸，将造成大脑发育障碍”等权威观点，更坚定了他研发脑营养保健产品的决心。刘锡潜最终将目光聚焦在刚刚接触到的能够健脑的深海鱼油产品上。

通过多方了解，得知国内只有黑龙江省石油研究所研究鱼油提取，刘锡潜立即找到他们进行合作，研发生产以深海鱼油为原料，用以预防和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多烯酸乙酯”产品。1992年，他创办了山东禹王制药有限公司，掌握了从深海冷水鱼中提取大脑营养的3A（DHA、EPA、DPA）营养素技术，研制出了中国第一款药准字号的用于心脑血管的药物“多烯酸乙酯”鱼油，和第一款健脑营养保健品“忘不了3A脑营养胶丸”。

产品“忘不了”赢得了政府、市场、专家协会的一致认



/ 世界记忆锦标赛教练团访问禹王集团，前排左五为刘锡潜。

可，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认定为国家级新产品。禹王制药公司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卫生部批准的DHA、EPA标准品生产企业，标准品纯度达到99.99%。199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二届国际脂肪酸和脂质研究大会”上，刘锡潜作为中国学术界的唯一代表，发表了题为《“忘不了”3A脑营养对记忆力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并应美国联邦政府、国际鱼油研究中心的邀请进行了参观交流。

2021年，“忘不了”与拥有“世界脑力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称的世界记忆锦标赛建立合作关系。刘锡潜代表公司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忘不了’与世界记忆锦标赛有着提高人类记忆和思维能力的共同愿望，我们联手研发‘营养+方法’的记忆和思维提升方案，让更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中国智慧，让我们国家更强大，让世界更和

谐！”近几年非常火热的《挑战自我》和《最强大脑》等记忆和思维综艺节目中的多数选手，都是从这个赛事中走出去的，他们中的很多青年学子都成了世界级的记忆和思维大师。

如今，禹王制药在历经多年的磨练与考验后，已发展为全球唯一一家能自行生产人体所需要的7种必需营养素的企业，为欧美贴牌生产各类营养素1000多种产品。其出口排名连续多年为全国鱼油类保健品第一，成为全球最大的功能性鱼油制品全产业链供应商。

鹰击长空，大豆产业勇突围

1994年，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开始规模化种植，在国际市场四大粮商的冲击下，中国大豆产业全线遭受重创，全部巨额亏损，中国大豆产业到了生死关头。经过苦苦思索，刘锡潜提出必须打造“中国大豆”品牌，品牌的核心定位为“非转基因、高

蛋白、可食用”，从而找到一条和国外转基因大豆差异化的路子。确定思路后，刘锡潜尽自己所能在全球范围内宣传和推广“中国非转基因大豆品牌”，并连续10年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各种打造“中国大豆”品牌的议案。

彼时，与刘锡潜创建的大豆产业对阵的是世界顶尖的五百强企业：美国杜邦、美国嘉吉、美国ADM、日本不二等，与他们竞争，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刘锡潜相信，产品质量好才是硬道理。为此，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新型低温豆粕，解决了蛋白原料功能性差和蛋白收率低的问题，使大豆分离蛋白的得率从33%提高到45%，让中国蛋白加工企业每加工一吨大豆蛋白就能增加收益3000—4000元。让人意想不到的，禹王牌低温豆粕的问世，不但使国内大豆蛋白加工企业有了利润，还使其产品品质大大提高，达到了出口水平，挽救了整个国内蛋白行业。从此，中国从一个大豆蛋白的纯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2002年，刘锡潜接手临邑县一个上了一半设备的蛋白厂，把它改建成禹王的第一条蛋白生产线。经过一年的艰苦摸索，最后居然研发生产出了当时添加在肉制品中的凝胶性最高的蛋白产品，不但解决了产品销路，还



/ 2001年4月，刘锡潜（右）与车间工人交流低温豆粕工艺。

增强了客户的食用口感，提升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随后，禹王由生产3000吨规模的生产线，陆续扩大到生产5000吨、7000吨、10000吨规模的生产线。2003年到2021年，陆续在哈尔滨宾县、山东省禹城市、哈尔滨克东县建立了5个大豆加工企业，带动了高产高蛋白大豆种植业、中国蛋白民族工业、中国大豆深加工行业技术、中国大豆蛋白行业国产装备制造业的同步发展。

2021年9月10日，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视察禹王集团，看到禹王设计研发生产出的诸多创新产品，禁不住说：“在禹王，我看到了中国大豆产业的希望，在中国每个行业都有这么一两个企业就好了，禹王就是中国的豆王。”

鹰王强体，筑牢企业根基

在跌宕起伏的商战中，刘锡潜深知只有企业文化是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的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为此，刘锡潜建立了以“至真至诚”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它引导每一个禹王人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上，都不再执着于和他人做横向比较，而只按照“至真至诚”的标准和自己做纵向比较，最终达到进步的效果。刘锡潜还提倡“形式逻辑”应用于做事、“辩证逻辑”应用于对人的思维导向。

同时，刘锡潜提出了“重道一筑形一善器”的科学做事方法，使禹王人做事有了一个从思想准备到按照客观规律（路径）进行形式体的设计，再到按形式体路径多快好省地完成事情的全过程的方法论。



/ 禹王·欧洲大豆蛋白产业现场峰会在禹王集团召开。

通过十多年的规模扩张经历，刘锡潜逐步意识到，禹王在现代化管理程度上仍然落后，要想在全球成为优秀企业，必须搭建起系统化的管理平台，从人治走向法治。鉴于此，刘锡潜和他的管理团队为企业建立了方针目标管理体系，增强了企业整体系统管理能力，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水平，逐步使企业走向流程化、标准化、法制化。


禹王集团“至真至诚”的核心价值观、“重道—筑形—善器”的科学做事方法，以及“基于核心价值观的方针目标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为禹王集团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使禹王“发展叩问使命愿景，日常管理交给体系，创新进步留给自己”的管理设想变成现实。

雄鹰展翅，探索未知空间

新材料行业是一个战略新兴产业，也是国家的短板，更是一个未知的科技创新产业。2006年，刘锡潜决定往新材料产业方面发展。截至2021年，刘锡潜已建成3个新材料公司，覆盖了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主流结构陶瓷品类，初步构建起“氮化物”“碳化物”“氧化物”三大类结构陶瓷“硅谷”雏形。并于2018攻克了国家重点项目中“卡脖子”技术难题；2020年再度突破OLED蒸镀源关键“卡脖子”技术瓶颈。

2019年底，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口罩等防疫物资出现了短缺现象，刘锡潜立即要求禹王制药公司、禹王和天下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借助生产优势转产口罩、酒精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禹王制药15天火速完成口罩生

产线建设及产品下线，实现单日产能60万只，堪称禹王版的火山速度！2020年，刘锡潜向武汉等疫情重灾区捐赠口罩、消毒液、保健食品等抗疫物资价值达300万元。除此之外，刘锡潜每年向慈善机构、敬老院、残疾儿童学校捐款捐物，近5年累计捐款1200万元。刘锡潜的“跨界”助力，彰显了企业家的责任担当。

循至诚之道，择善而行。站在历史新起点，刘锡潜将继续秉承黄埔精神，不忘初心，牢记“推动变革，引领进步”的使命，带领禹王集团继续做强做大大健康产业，做精做透新材料产业，从B端走向C端，从传统制造走向智能制造，从经验管理走向数字管理，实现向现代企业转型，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

赤诚爱国心 深深黄埔情

——记黄埔后代熊文正

熊文正，黄埔军校军官训练班第3期生熊顺义之子，山东省工程咨询协会秘书长、研究员，山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委员。

熊文正虽已过耳顺之年，但始终怀着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忙碌在工作岗位上，活跃在社会活动中。

牢记父亲教诲，走好人生道路

熊文正的父亲熊顺义毕业于黄埔军校、陆军大学，曾任国民革命军122师少将师长。抗日战争中，率部参加了太原、徐州、武汉、枣宜、随枣、豫西鄂北等会战，特别是在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大战中指挥部队重创日军留下英名，获颁忠勤、宝鼎等勋章和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解放战争中，率122师及9个保安团，四川绵竹、德阳两县政府1万余人起义。起义后任解放军西南军区起义12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西南地区平叛、剿匪等战斗，获西南军区嘉奖。1955年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熊顺义生前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要求子女品格上要忠诚善良、学习上要认



熊文正。

真刻苦、工作上要积极努力、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他常告诫孩子，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在父亲的谆谆教导下，熊文正健康成长。中学毕业后，他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毕业后先后当过大学教师、省直部门管理干部，后来又从事了30多年的工程咨询工作。作为山东省工程咨询院副总工程师，主持过山东省及国内部分省份近千个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评估和设计文件的编制工作。工作中，他常带领专家和同事们亲赴现场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在主

持的大型核电站、火力发电厂新能源电厂、输油管线、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及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民生工程项目中，他优化设计方案，在节约建设投资资金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熊文正带领的团队取得的工程咨询成果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山东省优秀工程咨询成果一等奖9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项；山东省发改委优秀成果奖1项。他被聘为中国工程咨询协会专家，编著有《齐鲁科技精英》《科学技术论原理》等书籍。忠实的品行、努力奋进的

工作作风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及良好的业绩，让熊文正深得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的信赖和认可。他还两次获得山东省发改委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临近退休时，他不负众望又担负起山东省工程咨询协会的领导工作，继续为山东省争创全国一流工程咨询行业努力工作。

积极参与议政，履行委员职责

2013年，熊文正担任山东省政协委员。此后，他积极参与山东省政协组织的各项参政议政活动，切实履行委员职责。

担任省政协委员期间，熊文正向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建议。如他提出的《关于推动山东更好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议》《化解过剩产能 推动结构性改革》等获得了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他还经常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社情民意，撰写一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提案。如《关于完善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纪念馆建设的建议》《改善济南市城区道路拥堵状况杜绝交通事故频发的几点建议》《关于在我省公立医院建立健全陪护制度的几点建议》《做强工程咨询业 加快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和《高铁PPP等模式创新的实践和建议》等提案被有关部门采纳，收集的社情民意信息送至有关部

门并引起了高度关注。他积极参加山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港澳台和外事委员会组织的调研活动，并在20多次专题协商会中，就山东省的政治、经济、科技建设发展等问题，如“进一步提高简政放权质量和实效”“促进我省经济园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专题，与山东省、有关市区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协商对话，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熊文正被山东省政协职能部门聘为十一届山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山东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专家，并被聊城市委、市政府聘为聊城市重大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被潍坊市委、市政府聘为“产业强市”专家委员会委员。

呼吁祖国统一，讲好黄埔故事

1970年后，熊文正经常参加山东省、济南市组织的各种对台宣传活动，协助其父对国民党故旧蒋经国、陈诚、孙震、胡宗南、孙元良等有影响的台湾军政要人宣传党的对台政策，呼吁大家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入21世纪，熊文正应邀参加了民革中央、黄埔军校同学会组织的台儿庄大战胜利75周年

纪念活动，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组织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纪念活动等。其间，无论是作大会发言还是与来自台湾的党、政、军、企业界人士，黄埔后代及其父在港台地区的故旧交流，熊文正都把宣传黄埔精神、抗战精神，反对“台独”分裂势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主题，同时还向他们介绍山东省优越的投资环境，动员他们来山东投资建厂、办学，为山东省的文化、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2011年12月，熊文正应邀作为黄埔后代代表随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参访团赴台交流，与中华战略协会、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台湾新同盟会和台湾陆军军官校友会等团体中的黄埔将领、国民党“中常委”及黄埔后代座谈交流，并与他们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达成了部分共识。为了更好地宣传“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和国共两党团结抗战的事迹，他积极参与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组织编写的《黄埔人生》系列丛书（共10册）的编辑工作；积极为《黄埔》《春秋》《联合日报》等报刊和四川省成都市文广新局、四川省威远县政协、山东省枣庄市民革相关单位撰写文章和提供历史资料。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



/ 熊文正(中)在山东卫视讲述《我们的抗战故事》。



/ 授勋仪式上，熊文正家人与法国前总理(左四)合影。

熊文正接受山东卫视采访，在《全民抗战 英雄山东》专题片中讲述了父辈在台儿庄大战中英勇杀敌和鲁南儿女支援前线作战的动人故事，讴歌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

动员亲属后代，支援祖国建设


熊文正的外甥自幼聪颖可爱，一岁多就被他从偏远农村的姐姐家接到了济南和他一起生活。经过精心培养，他的外甥高中二年级以全国奥数竞赛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学习。清华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全额奖学金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高盛、高通等著名公司工作。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其外甥多次要求熊文正去美国生活，但是都被婉言谢绝。

2018年，全国掀起“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熊文正动

员已是美国高通公司高管的外甥回国参与祖国的经济建设。外甥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在中国注册成立了中外合资企业，主要生产高科技智能医学诊断和医学数据分析仪器，该企业生产的设备已被国内中心城市一些三甲医院采用。

熊文正的女婿是法籍华人，先后任法国达索、生物梅里埃等著名公司驻大中华地区的总裁。为了支援祖国的经济建设，在熊文正的引导下，其女婿将他供职的法国达索公司的3D设计软件成功地引进到我国北京国家体育场和C919大型客机等一些重大建设项目中。2015年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受法国奥朗德总统的委托，法国总理瓦尔斯到北京与李克强总理会面后，直飞上海，主持法国政府授予其女婿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的授勋仪式，并邀请亲属参加。在授勋仪式上，瓦尔斯高度赞

扬了熊文正家族对中法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其间，熊文正与法国总理、外交部部长、经济部部长，法国驻华大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等政府官员和法国达索、生物梅里埃等国际著名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交流，向他们介绍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投资等环境，希望法国政府和企业家加大参与中国经济、科技、文化建设的力度，加强与中法合作的美好前景。该活动由法国国家电视台向法国国内实况转播，引起较大反响。

在熊文正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其女婿不论走到哪里，总是想方设法加强所在法方企业与中方企业的合作。2020年9月，为了表彰他女婿对上海经济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龚正市长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他颁授了白玉兰荣誉奖章。

为改革开放伟大新时代贡献聪明才智

——记黄埔后代聂炳华

聂炳华，黄埔5期聂松溪重侄孙，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原巡视员，研究员，兼任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讲师团特聘教授、山东省经济管理学会会长。

聂炳华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和社员，也当过济南市邮政局的工人和局办秘书，还当过高校的领导和教授，但是最主要的经历还是从事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和决策服务工作。他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有幸以一个政策研究人员的身份参与了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全过程，把自己有限的聪明才智奉献给这一伟大的事业和全新的时代。作为政研人员，聂炳华把“但有一分智，当为改革谋”当作自己的追求。工作中，他勇于改革创新，深入调查研究，在为不断推进和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鼓与呼的历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展现了独特风采。聂炳华把他的政研生涯形象地称为“三步曲”。

一步曲：步入政研战线，服务省委决策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7月，作为全省被选拔到山东省委机关工作的三名大学毕业生之



/ 聂炳华。

一，聂炳华被山东省委调查研究室（现称“省委政研室”）选中，从此开始了他的政研生涯。山东省委调研室是省委的综合参谋部门，肩负着服务省委决策和政策研究的主要职能和重大责任。他对能到这么重要的部门工作感到十分自豪，立志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奉献给政研事业。

起初的10年中，聂炳华主要是虚心学习领导和老同志的经验，苦练调研基本功，不断提高理论与研究水平；同时积极参与实际调研工作，在陆续展开的农村体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中，取得了一系列调研成果。在工作中，他逐步崭露头角并成为调研骨干。

1989年下半年，聂炳华作

为省委包村组组长，带队到本省邹平县南部山区西董乡的一个贫困大村——北禾村包村扶贫。在他们的努力下，北禾村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脱贫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双文明村和国家外事联系点，被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誉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窗口”，就连前来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赞不绝口。

1991年4月，聂炳华回到省委政研室主持本室社会事业研究处的工作。他创新调研方式，以尽可能集中全社会智力为决策服务为目的，率先探索实行了以广泛联系协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式调研，形成了上接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有关司局，横有省直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党委政研室有关处，下连各市、县



／ 聂炳华(前排左一)代表省政府研究室与高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党委政研室和企事业单位联系点的联系网络和合作制度，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中央政研室的重视和宣传。

同时，他紧紧围绕山东省委、省政府决策需要，主持和参与调查研究，成果多次被国家和省的重要决策采纳。说起这些，聂炳华如数家珍，顺口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山东是农业大省，要推动农业不断发展，关键靠科技。但是，长期以来，科技、教育和农业体制却存在严重脱节问题。1991年，聂炳华带领处里同志深入调研，撰写了《山东省科教兴农的情况与建议》，为中央提出“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提供了依据。随后又主持承担了《农科教结合的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重大课题，国务院和山东省委、省政

府的有关文件都吸收了研究成果的内容，对山东和全国的农科教结合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再如，为了加快高新技术发展，国家开始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何积极稳妥推进其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992年，聂炳华主持了《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模式、运行机制及政策研究》，系统提出了办好高新区的对策建议，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专呈中央领导参阅。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作了重要批示，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专门政策加以推进。又如，1993年，聂炳华受国务院研究室委托，主持完成了《关于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研究》专题报告，提出了以改革思路制定文化经济政策的观点和具体建议，为后来国务院出台

有关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而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像这样的成果还有很多，关于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强化精神文明建设、如期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加强环境保护、推进体育工作、加快中心镇建设，等等，其中多项成果还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山东省优秀调研成果特等奖，甚至作为国家重大软科学研究案例予以宣传推广。

就这样，聂炳华在政策研究的沃土中辛勤耕耘，并得到可喜的收获。1995年，他代表全国党委政研系统参加了全国软科学工作会议，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为了表彰聂炳华在决策服务和政策研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



/ 聂炳华编著的书。

1997年8月，山东省委、省政府授予他“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他也是省委机关唯一获得此称号的人员。1999年6月，山东省编辑出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华诞献礼书——《与共和国同行》，宣传部分优秀知识分子的突出事迹，聂炳华被收录其中。他以《但有一分智，当为改革谋》为题，全面介绍了自己作为政研人员的境界追求和工作状况，也增进了广大读者对政研机构、政研人员和政研工作的认识和了解。

第二步曲：重返政研战线，服务国家决策

1999年8月，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强化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山东省委、省政府选派部分干部到高校任职，聂炳华被派到山东经济学院担任党委委员、副院长。聂炳华惜别奋斗了18年的

政研工作，来到山东经济学院任职。

学校发展，基建、后勤先行。任职第二天，聂炳华就当起了分管基建和后勤的“先行官”，克服种种困难，创造了高校基建优质、低价、高速建设之路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经验，受到山东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推广，确保了学校的快速发展。2000年，聂炳华经国务院批准，成为第一个由学校申报获批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同时，晋升为研究员，成功申报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两个硕士点并担任首席研究生导师，增加分管本校经济研究所任务，兼任山东省经济管理学会会长。他积极倡导和组织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社会决策，自己也根据山东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需要继续服务决策，如负责承担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调研和文件起草任务；撰写了关于“发挥省城优势，发展省会经济”的对策建议，成为省委、省政府制定支持济南省城发展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尤其是2002年，是中央确定的调研年，聂炳华编著出版了《但有一分智，当为改革谋——调研报告辑选及调研方法理论初探》一书，从自己多年的调研实践经验出发，对调研理论作了初步的研讨，在当年全

国图书大会上备受关注。

2005年8月，聂炳华接到山东省委关于中央政研室借用他到本室文化研究局工作的通知。对于有机会重返政研战线，而且还是进入政研战线的“国家队”，聂炳华感到非常高兴，坚决服从组织需要并迅速报到。入驻中南海的当晚，聂炳华就在“海”里转了一圈，看到丰泽园、游泳池、西花厅，看到南海夜色朦胧中的瀛台，北海灯光映照的白塔，想到这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经日夜操劳的地方，想到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地方，他心中油然升起一种神圣之感，决心珍惜这十分难得的机会，争取多为政研工作做贡献。

中央政研室是服务中央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要求具有很高的政策研究水平，能否尽快适应工作是个重大挑战。聂炳华积极请教领导和各位同事，尽快熟悉室里的工作特点，努力树立从国家层面、国际视野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主动配合中央决策需要承担室里研究任务，并主动选择课题开展研究。

刚进研究室不久，他了解到中央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研究创新型国家建设问题，立即撰写了《国外科技创新的政策及其启示》研究报告，得到

室领导的重视和分管领导的表扬。初战顺利，增强了聂炳华的信心，研究积极性大大提高。回忆那段难忘岁月，聂炳华说：“我那时吃住在办公室，睁眼上班，闭眼下班，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搞研究，简直成了一个忙碌而快乐的‘单身汉’。”室领导很关心他的生活，担心他住办公室太闷，要在外面为他安排宿舍，聂炳华很感激，但为了节约上下班奔波于路上的时间就婉言谢绝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又一个课题的研究中。在参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课题研究中，他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意义、路径和措施等方面对课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证与研究，完成了研究任务。知识产权创造、转化、运用、保护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了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有关要求，聂炳华迅速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引起室领导的重视。国家知识产权主管部门还为此主动邀请他到山东、辽宁等省进一步调研，对研究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贡献了一份力量。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聂炳华提交了《关于山东省实行新农合的情况与建议》《欠发达地区也能搞好新农合——关于山东省嘉祥县实行新农合的调查》两个调研报告，为全国新农合的推进提供了典型示范经验。

光阴荏苒，近两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在中央政研室及其文化研究局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的指导、支持下，聂炳华连续取得了17项研究成果，顺利完成了分担的各项任务。2007年7月，聂炳华又一次告别政研系统，回到山东经济学院。他把在中央政研室学到的好作风带回学校，在完成分管工作的同时，继续关注山东省和国家改革发展值得重视的问题。2008年，他承担了国家级重大软科学研究课题《环渤海国际合作科技创新圈研究》，得到中央政研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高度重视与评价，为后来国家推进环渤海经济一体化发展有关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2009年4月，中央作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重大部署，聂炳华接受专门咨询，针对“蓝色经济”“蓝区”建设的概念、背景、意义、规划布局、战略措施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被聘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完成了山东省委、省政府交给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环渤海、长三角等国内沿海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重大调研课题，课题成果被吸收到蓝区建设规划和有关决策中。

三步曲：三进政研系统，服务省政府决策

2010年5月，一纸调令，聂炳华被任命为新组建的山东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年近55岁的他披挂上阵，第三次进入政研系统，完成了他政研生涯的“帽子戏法”。这一阶段，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继续做课题研究。山东省政府研究室的职能是调查研究、文稿起草和决策咨询。聂炳华带领分管的两个处的同志，围绕山东省委、省政府决策需要，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组织协调和主持参与调查研究，其中包括生态山东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加快推动各类园区转型升级、加强教育改革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及大力推动“双创”（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多方面的调研，调研成果普遍转化为山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有关讲话和出台的政策规定。

致力政研传承。多年的决策服务实践，使他深知政研队伍素质对于提高决策服务质量的关键意义。2014年初，聂炳



/ 聂炳华参加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留影。

华被任命为巡视员，分管机关日常工作之余协助领导分管人事。在山东省政府政研室领导和班子其他成员的支持下，他在强化队伍建设、搞好政研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在实践中做好传帮带以外，聂炳华重点加强对年轻同志热爱政研工作的思想教育和专业培训，发表文章《再谈“但有一分智，当为改革谋”》现身说法，鼓励年轻同志热爱政研工作，以饱满激情投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新时代，努力为决策服务，在政研领域建功立业。他还承担了山东省委交给的培训任务，为全省政府调研系统员工讲授如何搞好调查研究，培训人数累计数千人。此外，他积极关注智库建设，作为副组长

重点参与了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山东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实施意见》的调研起草工作，对推进山东省的智库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聂炳华还率政府智库代表团赴台湾访问，连同以前的两次访台，为促进两岸交流奔走。

如今，聂炳华已经退休，但是作为“老调研”，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积极出谋划策的身影。2018年底，在举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受山东省委组织部委托，聂炳华代表全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对拔尖人才制度以及拔尖人才为改革开放做出的突出贡献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山东省委人才领导小组命名的“山东省智库高端



/ 聂炳华(左三)在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学习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座谈会上作辅导报告。

人才”，他在中央要求山东走在前的新旧动能转换、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经略海洋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里都有成果体现。同时，他积极指导高校、科研机构和民间智库自身建设和服务决策工作。作为国家中外文化交流重要平台——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的理事，他积极参加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大量活动；作为尼山儒学世界中心讲师团特聘专家，他围绕弘扬传承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实现“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和公益活动；特别是作为黄埔亲属，聂炳华多年来不仅热心关注山东省黄埔同学历史的研究，而且每当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贯彻中央和山东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座谈会时，他都积极参加，畅谈学习体会并提出贯彻落实的建议，努力为传承和弘扬黄埔精神、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贡献。

继承先辈家国情怀，砥砺奋进再创佳绩

——记黄埔后代曾学锋

曾学锋，黄埔军校第3期区队长曾泽生之孙女，民革中央祖统委委员，山东省第十三届政协委员、青岛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96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雄的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强大支撑，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做出了重要贡献。回望人民军队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曾学锋显得格外激动，仿佛又听到长辈的谆谆教诲，看到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代代人为国家富强所作的无私奉献。在这一代代人的奉献中，就有曾学锋的祖父曾泽生，为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不畏牺牲、英勇奋斗；有她的父亲曾达人，为建设强大海军顽强拼搏、奉献一生；也有她自己，始终以家族长辈为榜样，传承家国情怀，积极作为、努力工作，奉献着黄埔后代的热情和力量。

家国情怀，世代相传

曾学锋的祖父曾泽生是一位富有爱国心、正义感，一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军事将



曾学锋。

领。他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8期，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3期。在校期间担任区队长，后来又进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军事科学习。抗战爆发后，他主动请缨出滇抗战。1938年，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在著名的禹王山阻击战中，连续27个昼夜坚守阵地，与敌方展开100多场激战，打出了滇军声威。台儿庄战役后，他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1940年，日军进占越南，为阻止日军继续进犯，他率部回滇，先后指挥部队光复越南境内的勐烘、坝洒、沙坝等地。1945年，奉命到越南接受日本投降。

解放战争时期，曾泽生任

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1兵团副司令，并兼国民党第60军军长。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1948年10月率部于长春起义。起义后，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随后进军西南参加了解放鄂西战役。

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并向朝中边境推进、轰炸中国丹东地区，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在得知中央部署后，曾泽生率领50军主动请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50军作为首批入朝部队，

也是唯一整建制的两次入朝作战部队，在1950年10月25日至1955年4月的4年7个月中，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进行大小战斗95次，毙伤敌军14052人。在高阳战役中一举全歼英国皇家坦克营。18勇士夜袭水源威震敌胆。尤其在著名的汉江南阻击战中，顽强阻击敌人50个日日夜夜，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号称世界头号强国军队的光辉战例，进行了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其激烈程度在我军20多年的战争历程中极为罕见，打出了国威、军威，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领导的称赞和嘉奖。

祖父曾泽生的爱国情怀，深刻影响了曾学锋的父亲曾达人，坚定了他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理想追求。5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曾达人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海军建设服务的革命事业心，长期从事海（光）缆通信技术研究，是军队海缆通信领域颇具造诣的专家，是军队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学科带头人。20世纪50年代，曾达人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套海缆加工机，建造了我国第一个海缆加工厂，研制出我国第一条海底电缆。60年代，创建了我军第一座海底声呐反潜站。70年代，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深海布缆船和深海



/ 曾学锋(前排右一)和祖父曾泽生(后排左二)合影。

布缆系统，成功地敷设了我国第一条深海电缆。80年代，他勇追光缆通信时代步伐，指导部队顺利完成了我国第一条海底光缆通信系统的建设任务。90年代，由曾达人主持研制的海缆技术装备多达22项，主持完成重大科研项目10余项，取得5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18项填补了国内和军队的空白。凭着对国家的赤子之情和对党、对军队的无比忠诚，曾达人刻苦钻研科学技术，用毕生的心血凝成一条条伸向大海深处的海底电缆，为我国、我军的通信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传承精神，奋进新时代

祖父曾泽生“光我民族，促进大同”的爱国情怀，父亲曾达人爱党、爱军，为国家无私奉献的行动，时刻激励着曾学锋报效祖国、无私奉献的决心。为



/ 曾达人。

了传承家风，父亲给她取名“学锋”，就是让她学习雷锋，继承和发扬老一辈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和大爱无疆的奉献精神。

1992年，国家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式与世界接轨，改革的春风再一次拂绿中国大地，也激

发了曾学锋抓住时代脉搏、闯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她辞去稳定的工作，加入这一轮下海的大潮，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

曾学锋创办了一家集国际空运、海运、快递、仓储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企业。青岛港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企业业务的稳步提升提供了强大动力。十几年的用心经营，企业取得了亮眼的成绩，被列入青岛十佳物流企业之列，并多次被青岛市工商管理局评为“青岛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回顾这段经历，曾学锋由衷感叹国家的巨变，感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是因为乘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巨轮，才使得许许多多青年人实现了梦想。她说：“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让自己的人生放出了光彩。”

2009年，曾学锋被山东省工商联评为“影响山东经济十大女性人物”；2011年，被青岛市发改委、青岛市工商联等部门联合评为“青岛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在创业的同时，曾学锋还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资助“春蕾儿童”，在四川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中踊跃捐款捐物。2009年，她被青岛市工商联、青岛市光彩事业促进会评为“青岛市光彩事业优秀企业家”。2010年，曾


学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后来成为民革青岛市委副主委。

进入新时代，作为参政党的一名领导干部，曾学锋始终注重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理论修养，自觉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了在事关大局、事关政治方向、事关根本原则的问题上，是非分明，立场坚定，切实发挥了“关键少数”的表率作用。

身为民革中央祖统委委员、民革山东省祖统委副主任和山东省、青岛市黄埔军校同学亲友联谊会副会长，曾学锋深深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重要讲话中所强调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并倾注精力投入到弘扬黄埔精神，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建两岸一家亲的实践之中。黄埔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动员和鼓舞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天下黄埔是一家”，黄埔同学同出一门，不论前期后期，不论大陆台湾，不论海内海外，无论过去现在，都是爱国团结、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力量。曾学锋与台湾和海外黄埔后代建立

了亲密的联系，大家通过回顾先辈们的奋斗历程，颂扬爱国、革命、牺牲、团结、负责、奋斗、奉献的黄埔精神，消除歧见、增进共识，树立起推动祖国统一的共同目标。

曾学锋通过赴台活动，拜会了一些政界人士，其中包括国民党领导人、新党领导人等。她也参与接待了台湾黄埔老将军参访团和国军后代参访团，如台湾擎天协会青年华夏文化参访团和台湾眷村后代参访团等，与在台黄埔老将军和后代开展了多方面交流。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重大政策主张。曾学锋深入学习后，积极建言献策，提交了多件关于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建议和提案，为祖国和平统一尽绵薄之力。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曾学锋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数的革命先辈，怀着对国家的责任、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积极进取、努力奉献，才有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今天，我们更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甘于奉献、勇于牺牲，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落实为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心有大爱万象春

——记黄埔后代王义军

王义军，黄埔军校第21期王健萍之子，现为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国家画院访问学者、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书画学会理事、山东艺术设计职业学院副教授、阳信县政协二级调研员、阳信画院院长。

王义军的父亲王健萍是黄埔军校第21期学员，年幼时受家风熏染，立志向学，苦读不辍。少年时代，面对饱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华夏大地，王健萍满怀报国热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在西南军区、西藏军区、山东阳信教委任职，1983年退休，曾任滨州市黄埔军校同学联络组组长。

在父亲王健萍耿直、严谨、恭雅的个性引导下，王义军自幼养成温良友善、关爱他人的优良品格。王义军有极高的绘画天赋，投身艺术、做一名画家成为他的人生梦想。1979年夏天，王义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惠民师范美术专业。在校期间，王义军是同学中的佼佼者，备受老师青睐。在老师的悉心传教下，他不仅绘画技法日臻完善，而且系统学习了西方美术史、美术概论等专业知识，奠定了坚实的美术理



/ 王义军。

论基础。惠民师范知名国画教师石雨田、董健等名家的授课和示范，使他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他将中西绘画技法融合贯通，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下宝贵经验。惠民师范毕业后，王义军被分配到县文化系统工作，开始集中精力投入美术创作。后入北京画院、清华美院、山东艺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进修学习。

1990年8月，通过父亲在台湾的黄埔同学、著名画家倪汝霖的帮助，以及山东省民革中山书画研究会的大力支持，王义军在阳信县成功举办了“海峡两岸书画展”，共展出各类书画作品120余幅，其中台湾书画家作品56幅，在两岸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王义军个人创作也取得骄人成绩，油画作品《泰山挑夫》《脊梁》成功入选山东

省美术作品展。作品《大地》荣获山东省文化系列优秀美术作品评选二等奖。作品《梨乡暖冬》荣获“古贝春杯”山东省美术作品大赛一等奖。1993年，王义军被吸收为山东省美协会员。

阳信置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人文荟萃、艺韵鼎盛，尤其不乏美术人才，自古名家辈出。1990年初，阳信县为进一步提升该县和阳信鸭梨的知名度，决定举办首届中国阳信梨花会。4月，阳光明媚，梨园春暖花开，欧阳中石、魏启后、陈维信等书画名家应邀相聚梨乡，挥毫泼墨，同场献技，演绎了一场酣畅淋漓的书画艺术盛会。王义军再次亲身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魅力的强烈冲击，更加坚定弘扬传统文化、投身国画创作的决心。不久，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阳信画院成立，王义军担任院长，挑起了引领阳信美术事业发展的重担。随后，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县里投资兴建了书画展览馆、陈维信纪念馆。一时间，书画展览接连不断，美术创作如火如荼。王义军也因为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突出的工作成绩，被滨州市委宣传部表彰为全市宣传文化系统优秀工作者，被滨州市文化局和阳信县人

民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1995年，他被任命为县文体局分管文艺创作的副局长，并于2007年12月当选县政协副主席。

走上领导岗位之后，王义军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2004年，他经过多方协调，终于如愿以偿成立了阳信县美术家协会，这是阳信县首家专业性文艺社团。自此，全县美术工作者和爱好者们有了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和精神家园。王义军先后邀请和组织外地和县内名家，举办20余场次个人国画作品展和滨州市首届美术新人新作展，“北山问道”张志民（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艺术学院原院长）工作室师生作品联展，张志民工作室师生结业作品济南展，庆祝历届梨花会书画作品展，庆祝建党10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胜利召开、2022北京冬奥会书画作品展等一系列极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展览。他还承办全县廉政、职工、教育、助残等专项展览近百次，组织各类艺术讲座、笔会和县内美术作者外出交流、写生达百余次之多，使得大批美术人才脱颖而出并连创佳绩。他本人也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连续8次入选中国美协举办的专项美术展赛，并有两次取得优秀奖。为了培养更多的书画人才，王义军数次拜会张志民，力邀他回乡开



/ 王义军为当地美术教师讲课。

办工作室国画研修班，并邀请高等艺术院校教授和一线名家，组成阵容强大的师资团队，王义军自己担任助教兼班主任。至今，研修班已开办4期，培养出近百名以中小学美术教师为主体的国画创作队伍骨干，为阳信美术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年来，王义军在日常工作之余，一边精读美术学术专刊，钻研创作技法，一边奔赴各地写生，提高创作水平。他数次前往逶迤险峻的太行山。面对鬼斧神工的群峰众岭，他用豪迈雄壮之笔让画作流淌出胸有丘壑直达霄汉的气势。流连忘返于江西婺源时，面对小桥流水和白墙黛瓦，他用温婉之笔勾勒出一幅幅自然古朴、清新秀美的江南水乡美景图。通过游历名山大川，他得以积累上千幅写生作品，从而厚积薄发，取得个人艺术的不断突破与升华。

恩师张志民曾语重心长反复告诫王义军：“艺术最忌僵化模仿、千人一面，作为我的学生，必须跳出老师条条框框，领悟老师精神境界，在深入源头后，敢于跳出去走出来，形成个人的艺术语言和特色风格。”王义军始终将恩师教诲铭记于心，把目光重点聚焦到发掘黄河文化、展现鲁西北风俗民情和颂扬家乡人文景色上来，倾心绘制了《画说阳信》大型组画合集：从韩信屯兵笃马河，到一代“谐臣”东方朔；从“唐画之祖”展子虔，到玄宗御医牛天齐；继之李山、马攀龙、史若虚、陈维信等彪炳史册的英才掌故，逐一跃然纸上。万亩梨园及“两湖两桥”等知名景点，中国收藏文化名镇水落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洋湖鼓子秧歌，知名古建筑玉皇庙、凌霄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台遗址、黄巾冢、狼丘冢，乡村振兴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村王集西街、东



/ 王义军(左六)在海峡两岸孙子文化书画艺术交流展上与大家合影。

毛、牛腾雨，红色教育基地毛岸英旧居、渤海军区教导旅成立旧址、鲁西北抗日第一枪流坡坞阻击战旧址，加之特色产业、地方民俗，等等，一幅幅精品力作饱含王义军对家乡的热爱，诉说着他的故土情怀，极富个人艺术魅力。其作品被山东艺术学院画院，市档案馆、艺术馆、博物馆和多家艺术机构收藏。

2011年2月，王义军随山东省黄埔军校交流团赴台，与台湾黄埔人士进行座谈交流。其间，他和台湾黄埔四海同心会书画家进行了艺术交流，并创作六尺山水画作品赠送台湾黄埔四海同心会。

2018年，王义军参与组织策划的“海峡两岸（滨州）孙子文化书画艺术交流展”在台湾101大楼中华艺术馆举办，共展出各类文化题材精品100余件。展会活动中，王义军与台湾书画家进行了艺术交流，并共同题写

了“两岸一家亲，洪源万里流”书法作品。

近年来，王义军积极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和省同学会组织的各类艺术活动，多幅作品入选展览。2021年，其作品《脊梁》入选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的“历史伟业，百年风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画展。

艺术当追随和反映时代。王义军始终关注生活，先后创作出大量讴歌新时代、具有现实意义和人文情怀的美术作品。《人民曲艺家史若虚》《国画名家陈维信》《美术大家张志民》《全国特级教师书法名家张廷俊》《回民活雷锋杨广和》等系列家乡著名人物作品，在宣传他们事迹的同时产生强大精神感召力，有力推动了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进程。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王义军以笔为械，以“艺”战疫，先后创作《援鄂战疫三姐妹》《火神

山集结号》《一线报道》等战疫主题作品，展现了助力战疫的艺术担当。2021年3月以来，阳信县疫情防控形势一度紧张，封控居家期间，王义军有感而发挥动画笔，精心创作了《此刻，源自爱——用画笔记录抗疫精彩瞬间》系列作品，记录下县城提级管控、核酸检测、志愿服务等各个战疫瞬间。作品展现出万众一心、全民战疫的生动场景，以艺术的力量鼓舞全县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协力防控，为取得战疫胜利发挥了作用。该作品被新华网、“学习强国”平台、天下黄埔等多家媒体播报转发，产生广泛影响。

心有大爱，万象皆春。王义军正值盛年，追寻艺术的道路依然漫长。我们衷心祝愿他永葆初心，始终秉承先辈赤诚处世、矢志为国之黄埔精神，不断创作出具有文化担当、无愧于时代的美术佳作。

弘扬黄埔精神，铸造钢铁意志

——记黄埔后代姚斌

姚斌，黄埔军校第19期生孙荫霖之外孙，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的侄重外孙。民革聊城市委会委员、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供电段电力技师。

黄埔精神，实质是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精神力量，是维护和捍卫祖国完整统一的坚强信念。今天，随着岁月的流逝，黄埔军校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遥远的记忆，但黄埔精神却穿越时空，传承至今，继续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产生着久远的影响。

姚斌是在外祖父孙荫霖的身边长大的。小时候，外祖父给他讲的都是黄埔军校、抗日战争、国共合作等方面的故事。先辈张自忠将军抗日殉国的故事更是被经常提起。外祖父讲这些故事时，会提到一种不灭的精神，那就是——黄埔精神。至今，这些故事和黄埔精神仍在影响着他。

1997年金秋，姚斌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铁路供电人。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25年。2009年是京九线聊城段——临清漳卫河大桥至梁山区间的电气化工程改造的工



/ 姚斌。

程年，他负责施工盯控、验收、数据汇总、上报等多项工作。因任务重、工期短，为确保施工进度如期完成，他克服一切困难，全年未休一天，与验收组共同努力，提前高效地完成了任务。2021年7月，聊城市突降百年不遇的暴雨，姚斌担心京九铁路供电设备的运转受影响，便冒着倾盆大雨赶到机务段运行变电间，一间一间地排查铁路供电设备。排查过程中，他发现两个高压变电间因为地势低洼开始进水，如不及时用沙袋堵住门口，一旦

雨水倒灌，高压电触水，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方显黄埔后代的本色，姚斌二话不说，扛起一袋袋沙袋在变电间门口筑起了牢固的堤坝。暴雨整整下了三天三夜，姚斌冒着生命危险排查了三天三夜，从而保障了铁路的安全畅通。暴雨过后的他满身泥土，肩膀肿得像个小山包。有人问他不怕苦不怕危险吗？他说：“我的先辈张自忠将军抗日殉国都不怕，我的姥爷当年打仗的时候枪林弹雨都不怕，我生在和平年代又是黄埔后人，保护国家财产和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有什么好怕的！”

工作越困难、任务越艰巨，姚斌越是冲锋在前。他就像一台充满电的机器，总是精神百倍地投入工作，保证了每一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他所在部门多次被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铁道部火车头总工会、山东省工会评为先进单位。

作为黄埔后代和一名民革老党员，工作之外的姚斌始终铭记先辈的教诲，继承发扬黄埔精神，做一个积极推动社会进步和带动社会前进的先锋。担任民革聊城市第八届、九届市委委员、民革聊城市祖统专委会主任期间，姚斌一方面踊跃参加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有关会议及活动，与台湾黄埔后代交流、联谊，努力为增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添砖加瓦；另一方面积极参政议政、履职建言，做好促进祖国统一与社会服务等工作。

2018年，姚斌参与了《民革聊城六十年》书籍的编辑工作。2019年的“九九老人节”，他去开发区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不但送去慰问品，还献上文艺节目丰富了老人们的生活。2020年2月，他走进刘道之村为残困户送去春节的祝福和礼品。2021年1月新冠疫情期间，他向中山博爱基金会捐款2000



/ 工作中的姚斌。



/ 姚斌列席聊城市政协会议留影。

元用于武汉抗疫。4月，与聊城市人民医院宁养院携手开展“临终关怀”项目，走访癌症晚期病人并送去生活必需品。2022年3月，他组织志愿者开展植树公益活动。4月，作为民革聊城中山“博爱·牵手”志愿者协会会长，组织志愿者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聊城市的度假区、高新区捐赠了5000个N95口罩和500公斤84消毒原液……姚斌还是民革聊城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主任、聊城市黄埔军校同学亲友联谊会牵头人，他积极联络聊城市的黄埔后人组织开展祖统联谊活动。2013—2020年，姚斌先后多次被民革聊城市委会评为先进党员、社会服务先进个人。

此外，姚斌还身兼多种角色。他作为聊城站前社区巡视组组长，参与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监督等各项公益活动；参与创建山东省禁毒志愿者服务团并担任聊城分团副团长，多次配合聊城市公安局举办禁毒宣传活动；作为聊城市众擎协会副主席，利用休息时间多次组织会员去河南、江苏等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论哪一个角色，姚斌都牢记自己是一个黄埔后人，身上流着黄埔人的血，从而更加认真对待，出色完成角色赋予的每一项任务。

今天，黄埔精神已成为黄埔军校留给后人的光荣传统和宝贵财富，成为两岸同胞共同承载的历史记忆和精神遗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姚斌将继续把发扬和传承“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视作自己的使命和职责，矢志不渝，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二十大后如何经营两岸关系

□ 臧幼侠(台湾)

臧幼侠先生，祖籍江苏省新沂市窑湾镇。其父臧肖侠为著名抗日英雄，曾带领官兵三次参加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战绩卓著。臧幼侠先生为臧肖侠将军长子，退役陆军少将，现任台湾振兴中华民族暨文经促进会理事长。

多年来，臧幼侠先生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致力于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臧幼侠先生积极为两岸交流交往搭建桥梁，组团到家乡参访交流，为家乡建设发展得更加美好提供多方支持与资源。

两岸统一，一定会实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这里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青年的问题，另一个是日裔“台独”的问题。

我们先看青年的问题。

谈及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感兴趣的人很多，有官员、有学者、有商人、有贩夫、有走卒，唯独台湾的年轻人没有兴趣。因为接触太少，他们对两岸关系非常懵懂；又因为台湾给他们的资讯贫乏，甚至负面资讯居多，他们对两岸关系的理解更是走入了误区。然而，年轻人才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

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已多次提及。不论在中共二十大，抑或是其他场合，公布了很多惠台政策，对年轻人更是关心。但这些资讯却被台湾媒体屏蔽掉。即便是我们老一辈人也需要费些周折才能找到这些资讯，何况是把打工赚钱放在更重要

位置、不关注两岸问题的年轻人，他们更无从获取这些资讯。

但是，台湾青年也有关注的焦点，那就是和平与战争！对台湾青年而言，他们不相信两岸中国人会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同文同种的问题。但维持和平的能力、保证两岸融合发展的权力并不在他们的手中，而是操控在外国势力和愚蠢的当局手中。在这样的当局掌控下，未来会怎样，是否会惹来是非？所以，台湾年轻人也身处无奈的境遇之中。一方面要他们去喜欢大陆，但是他们又不了解大陆，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大陆（去过大陆的台湾人很少，只有600万人次，其中年轻人占的比例更小）。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让他们表现对大陆的热情是有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增加台湾年轻人了解大陆、认识大陆的机会。加之，民进党当局一直用“1450”去辱骂大陆年轻人，使大陆年轻人误认为

“1450”代表的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双方本身因资讯受阻存在误解，再加上“1450”的挑拨，就可能造成两岸下一代的结怨。

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涉及台湾的内容，年长的一辈，除了日裔“台独”之外，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平统一”对两岸、对中华民族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宣示。

如何挽救台湾青年？要让他们去认识大陆，让他们去亲身体会大陆的发展，亲眼见识大陆的软硬件建设；更要让他们去了解两岸的同文同种，了解两岸拥有信仰习俗完全相同的文化；还要让他们看到祖国军事力量之强大，以及航天技术的发展现状。

以往，我们的工作多集中于老将军、里长、民意代表和学者身上，这些人的影响固然重要，但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喜欢看短篇，喜欢刷抖音，喜欢打游戏机，这些见过大陆发展、了解大陆现状的人所写的长篇大论，并不能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如果

把这些资讯放在年轻人喜欢的载体中，相信他们对中华大地的知识会逐渐丰富。

借助当下的新媒体去吸引台湾年轻人了解大陆是一种快捷的方式，如果能给他们实践体验的机会将会有更好的效果。

利用假期，给更多的台湾青年提供到大陆参观学习的机会。组织台湾的本科生、高中生、初中生，由老师带领赴大陆，让他们走出台湾岛，去亲眼见证大陆的发展。

挑几所知名大学、高中、专业学校，让台湾学子去走一走、看一看；选一些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让台湾学子了解大陆的飞速发展；驱车带他们去感受令世界惊叹的伟大工程；还要让他们看到祖国的军事实力，了解祖国武力之强大；更要让他们见识祖国航天科技的发展，看看运载火箭，看看神州飞船。

年轻人有共同的爱好，不论是台湾学生，还是大陆学生，相信经过同吃同住同交流的相处，可以真正地融为一体，通过大陆学生的讲述去了解大陆，通过台湾学生自己的所见去感受大陆。我们也要积极促成台湾学子毕业后踊跃赴大陆交流。犬子就是在清华读研究生时，了解到大陆学杂生活费比台湾便宜太多，而且环境又好。这就是实际的例证，台湾青年看了必然心动。

可以说，掌握了青少年，和平统一的工作就成功了一半，否则两岸的复杂性必增加。

我们再看日裔“台独”的问题。

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的组成其实不甚了解，可能台湾人自己也知之甚少。事实上，台湾人当中不认同祖先来自大陆的是日裔“台独”。何为日裔“台独”？

台湾岛内目前包括五种人：一是台湾“原住民”（编者注：即少数民族）；二是郑成功带来的汉人；三是日本殖民政府刻意移民（非投降的日军），所产生的“湾生后代”，日据时代就刻意教他们汉文，但在思想上告诉他们，你是潜伏在台湾的日本人（待命尔后的工作），所以在台湾70岁上下，且皈依某教会，又不知祖父名字为何的，大概就是日裔“台独”；四为蒋公带过来的军、公、教人员；五是新移民，其中来自越南者居多，也有不少来自大陆。

日本人离开台湾前把最好的房地产均交付于第三类人，因此，此类人在台湾不需要工作，靠房地产就可获得暴利，是属于中间富有的一群。“两蒋”时期，他们闷在台湾吃饭，李登辉当政后开始活跃，逐渐开始用他们的金钱腐化台湾，同时也冒充国人进入大陆营商，返台后就以台商身份道尽大陆的不是，图谋增加台湾



/ 2019年清明，臧氏家族兄弟姊妹返回江苏新沂祖籍地，一起整修祖父母、曾祖父母的墓地，以维中华民族的四维、五伦。

人对大陆的恶劣印象。由此可见，他们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破坏者。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讲到：“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切记有关台湾问题，要抓住年轻人的心，让他们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俾消弭两岸日裔“台独”的离间，由此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及和平统一指日可待。■

推进国家完全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对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的分析解读

□ 彭韬

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特征和本质要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战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二十大报告。报告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台论述体现了中央对台大政方针政策的延续性、稳定性、前瞻性,是推动祖国统一

阔步前进的纲领性文件。报告主要聚焦五个层面,阐述了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并指明了未来一段时间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主要举措,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导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一、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一) 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谈道:“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

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肩负着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可见，党的领导是重中之重。党发挥了总揽全局及顶层设计的核心作用，是推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台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无不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种特征和优势体现在对台工作中就是党将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对台工作效能，不断根据两岸关系的新形势，在对台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抓落实，巩固了全国对台工作一盘棋的格局，保证了对台政策的稳定实施，为推进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持。

（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

十八大以来，针对岛内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在继承中央历来秉承的对台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习总书记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对台工作思想及方法路径，形成

了重要的理论思想，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两岸和平统一指明了方向。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决议》中习总书记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张，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守正创新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包括必须坚持党中央对对台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统一，坚持在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持团结台湾同胞、争取台湾民心，坚持粉碎“台独”分裂图谋，坚持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持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等内容。

总体方略是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对台工作经验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在新时代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党应对国际大环境和台海新形势的战略自信，也使得大陆在涉台问题上更加“战略清晰”，是推进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行动纲领。

二、突出强调了致力和平统一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二十大报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推进同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开展广泛深入协商，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方针

自1979年大陆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以来，这一方针政策迄今仍在坚持，没有改变，说明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也是大陆释放出的善意和诚意。2022年8月《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并回应了台湾民众的实际关切：“统一后，有关国家可以继续同台湾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外国可以在台湾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

方、半官方机构，国际组织和机构可以在台湾设立办事机构，有关国家公约可以在台湾适用，有关国际会议可以在台湾举办。”这是中央本着解决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诚意，对台湾民众的善意回应。

从此次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可以看出，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对进一步加快建构两岸“命运共同体”，加速两岸一体化进程，加强两岸同胞对共同家园、共同家国的认同，最终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意义重大。

（二）两手准备，两手都要硬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手段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放弃和平统一的机会，战争意味着人民流离失所，同胞骨肉分离，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大陆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中国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动和平统一表现了我们对于武统的克制，但是克制不是没有底线，如果“台独”分裂分子和外部势力

勾连挑衅，甚至突破红线，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的最后选择。大陆为解决台湾问题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这也是针对外部干涉势力和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发出的最严厉警告。

三、突出强调了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利益，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一）团结台湾同胞、争取台湾民心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一直居于突出位置，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突出强调了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利益，这与习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和“两岸一家亲”理念，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一脉相承。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台湾同胞是中国人民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这是“台独”分子无法抹杀的客观事实，我们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在新时代发展两岸关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急两岸人民之所急，想两岸人民之所想，争取台湾民心，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二）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路径

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还提出要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国家发展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解决台湾问题的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

大陆一直坚持将改善两岸民生福祉，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在融合发展中夯实和平统一的基础作为对台工作的现实目标与实践路径。虽然民进党当局对两岸融合发展极力阻拦，但大陆广阔的市场，极具韧性的经济发展与完整的产业体系，仍对岛内民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两岸只有通过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才能为台湾同胞带来更多机遇，大陆“31条”“26条”

等惠台政策才能更好地落地，帮助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台胞台企深度融入到大陆经济社会中来。贯彻落实融合发展理念，加强两岸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融合中促进认同，消除两岸之间的误会与隔阂，实现两岸人民的心灵相通，达到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目的。

四、突出强调了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宣示：“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战，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

（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致胜法宝

1937年，为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抗战，毛泽东教育全党：“我们爱好和平，但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可见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

生俱来的优良作风，党就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习总书记在2020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继续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优秀品质。在台海形势日益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发扬斗争精神至关重要。大陆强调的斗争，是一体两面的。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的斗争中，“斗”体现在反对霸权主义及“台独”势力，“争”体现在争取实现融合发展，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可以说，我们越敢于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斗争，就越能争取和号召大多数台湾同胞，就越能有力塑造统一大势。正如2005年出台《反分裂国家法》保证了随后十多年两岸关系步入了和平发展的快车道。同理，大陆近年来加大在两岸军事、外交、政治、舆论等方面的反“独”斗争，也是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筑牢底线。

（二）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

二十大报告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

定”。这是在向国际社会再申底线，向世界严正表明台湾问题自始至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其涉及到中方核心利益，中国必将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两岸的问题只能由两岸的中国人来决定，而两岸问题的定海神针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历史证明，两岸关系一旦步入“九二共识”正确轨道，就可阔步前进，造福两岸同胞；否认、歪曲“九二共识”，两岸就会陷入“兵凶战危”状况。2008年，正是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两岸才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但2016年5月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直接导致“两会”协商谈判难以为继，两岸官方联系沟通被迫中断，台海陷入风高浪急的紧张局面，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严重受损。

新形势下，大陆将坚决与妄图“以台制华”的外部势力和一切“台独”分裂活动作斗争，任何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进程的图谋和行径，都将遭到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五、突出强调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二十大报告指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一）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作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和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写入了二十大报告。目前，中美及两岸实力对比发生历史性巨变，大陆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对台影响力，日益多元的对台政策也对岛内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感召力。大陆比以往更有信心、有能力、有条件把控两岸关系的大局和发展方向。大陆将坚守行之有效的对台政策，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按照二十大报告所绘制的蓝图，巩固一个中国框架，把控台海局势，稳步推进国家统一。


虽然当前台海局势复杂严峻，两岸关系面临困境与挑战，但我们要从国家发展大势和民族复兴全局看待台海形势和统一问题，坚持大陆发展与主导在我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思路，积极应对不利因素，坚持“高压遏独”与“融合发展”相结合，坚持打击“台独”分裂势

力和“以人民为中心”相结合，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

（二）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是推进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保障支撑

习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使命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民族复兴必然伴随着祖国完全统一。当下，台湾问题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后“障碍”，若台湾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就谈不上民族复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对于任何企图把台湾分裂出去的势力，我们一直遵循“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唯独台湾问题不能谈”的底线和红线。台湾问题涉及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民族和国家的核心利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然而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频繁干涉中国内政，“台独”势力阻碍两岸统一，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一方面，美国大搞“印太战略”，企图拉拢盟友全方位打压和遏制中国，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发展、拖慢中国复兴进程；另一方面，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当局妄图“倚美拒统”，在岛内大搞“文化台

独”“法理台独”“以疫谋独”，甘当棋子，制造敌意，挑起对立，让两岸关系陷入漫漫寒冬。二十大报告涉台论述是对一切“台独”势力的严重警告、是对一切反华势力的强力反击、是对祖国人民的巨大鼓舞。更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祖国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面对复杂多变国际格局与严峻复杂的台海形势，大陆始终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国家统一。

二十大报告虽未就国家统一提出具体时间表，但已清晰描绘路线图。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是执政党的目标与大国意志的坚定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战略部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习总书记将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纳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大框架中，将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祖国统一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解决台湾问题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夙愿一定会实现！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踏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新征程

□ 林际平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听了习总书记的报告，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同时，我们注意到，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已正式写入党章，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中国统一的事，要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国家的力量、民族的心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实现完全统一之路任重道远。近百年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逐渐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回望百年来波澜壮阔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国共两党的几代黄埔军校师生，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我

们的前辈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革命誓言，铸造了爱国家、爱民族的伟大的黄埔精神。我出生在世代黄埔军人的家庭，也是黄埔人的一员。我的父亲林上元是黄埔军校18期毕业生，在抗战最艰苦的1941年报考了黄埔军校成都本校，并在毕业后放弃了留校机会，在祖父（时任第七战区中将参谋长）安排下直接奔赴前线参加反抗日本侵略者和保家卫国的斗争，抗战精神、黄埔精神从小一直激励着我，家国情怀深植我心。

我长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多年致力于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继承发扬黄埔精神，在香港青少年一代中做了较多切实有效、影响广泛的工作。2018年8月，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我们在香港举办了“周恩来与黄埔军校”纪念活动。我们邀请了黄埔军校早期重要领导人和部分知名国共两党师生的后代齐聚香港树人大学，回顾革命历史，与大学的师生分享了当年黄埔前辈们许多感人的家庭故事，在广大香港青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在香港社会发生“修例风波”的情况下，对青年学生树立



/ 林际平。

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组织了200余人到香港大学，邀请著名历史学教授陆人龙先生，做了关于黄埔军校校总理孙中山当年在香港大学学习并传播革命思想的专题讲座。与会人员沿着100多年前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在香港的革命足迹，回顾了孙中山为建立黄埔军校所做的丰功伟绩，并展开深入研讨。香港各大主流媒体争相报道，在整个香港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2020年秋季，香港新冠疫情肆虐。我们在遵守特区政府防疫规定的同时，在黄埔军校同学会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和“香港教育工作

继往开来, 奋进新征程

——一位台湾人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 熊子杰

“二十大”“十四五”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只是数字, 对一个1990年就在中国福建福州投资, 亲身参与、见证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的台湾人而言, 这些数字是“进步、繁荣、富强、文明、美丽”的象征, 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持之以恒“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态度、政策。

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 笔者深刻体认到,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团队一脉相承、前仆后继,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以“一个又一个五年”的周详计划、稳健步伐, 一棒接一棒、一步一脚印地逐步落实各项改革、建设、发展, 增进了民生福祉, 提高了人民生活品质。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团队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从“一穷二

白”到“吃得饱、吃得好”的丰衣足食; 从“精准扶贫”到“全面脱贫”, 再到“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现在正向着“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努力前进。


回首过去10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团队承前启后, 取得了多项历史性胜利, 在防疫、医疗、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民生、工业、基建、环保、反腐

(接前页)

者联合会”共同举办了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图片与书画展。开幕式在香港培侨中学举行。在整个巡展联展的系列活动中, 我们穿插与学校师生的互动和讨论环节, 我们这些抗战将领的后代当场解答学生们的提问。学生们提问最多的是什么是黄埔爱国精神? 什么是民族牺牲精神? 根据学生们的提问, 我们向大家分享了作为在香港的青少年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辛亥革命后, 梁启超就喊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创造者, 教育引导青少年的工作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

国后, 青少年的教育尤为重要。通过在三个中学举办黄埔精神走进校园的活动, 我们深深感觉到, 传承黄埔的爱国主义精神绝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一定要深入基层, 深入学校, 深入青少年中, 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的这一爱国主义教育行动得到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认同。包括央媒等60多家中外媒体报道了我们的系列活动, 在香港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迈入新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必将肩负起努力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责任和使命。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言犹在耳, 至今还有

其深远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作为黄埔军人的后代, 我立志继续努力, 以中共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坚定反对“台独”, 争取两岸和平统一这一伟大战略目标实现。我将坚定立足祖国的南大门——香港, 发挥我们黄埔组织的独特作用, 为香港长治久安、为祖国和平统一和台湾同胞福祉贡献力量。

(作者为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会长)

败、社会治安等领域都创下举世瞩目的佳绩；在生物、医药、航天、交通、信息、量子、新能源等科技领域，更展现出“弯道超车”“换道超车”巨大无比的能量；在全球防疫、经济、气候、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上，大陆更是主动扛起责任，而且说到做到，向弱势国家伸出援手。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时，即使在自身防疫物资还很缺乏的情况下，主动提供各项防疫物资及人力援助，展现出大国的担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以仁者爱人、人溺己溺的精神，对待全世界人民，珍惜每一个生命。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团队不忘初心，谱出了一篇篇动人的乐章，书写出一首首灿烂的诗篇，实现了对全中国人民许下的承诺，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创举，让中国大陆 14 亿人都能“丰衣足食”，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笔者相信，新领导团队必能战胜国内外的挑战，继往开来，接续奋斗，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如今，世界正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未来世界的走向是延续以美国及西方利益团体为主的“单极世界”，还是中国大陆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全球疫情起伏不定，



/ 熊子杰。


经济增长放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不愿放弃基于“霸权思维”的不当利益及特权，在世界各地挑起军事战、贸易战、科技战、货币战、能源战等冲突。美国还图谋干涉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与“台独”分裂势力相勾结，牵制大陆的进步发展。这些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

未来十年，中国大陆能否继续进步、繁荣？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原则，以科学的方法、廉洁的施政管理国家，中国人民与政府上下一心，必能彻底粉碎西方利益集团设置的障碍，持续推动改革、进步的巨轮，顺利完成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加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大陆的体制及共产党的执政理

念正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民的肯定与推崇，更是许多国家在推动改革、建设、发展时学习的榜样。未来，大陆必将以大国的风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与世界上能够真诚、平等、尊严地对待彼此的民主国家一道，共同为全人类扛责任、谋幸福。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的召开代表着中国大陆一个新征程的启航，中国共产党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全世界民主国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共同解决种种攸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而只想维护自己利益的西方霸权主义集团必将瓦解，“单极世界”秩序必将终结，不公不义的“霸权思维”“新冷战思维”必被全世界所唾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是中国共产党庄严的誓言，对中国人民如此，对全人类亦然。笔者相信，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新领导团队的带领下，中国将冲破西方霸权的重重阻挠，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必将引领全人类进入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新世界。

（作者为黄埔后代、台湾湖南商会会长）

忆往昔岁月峥嵘 新时代悬帆启航

——一位岛内黄埔后人眼中的二十大

□ 杨保罗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当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讲完此话，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也让我心中热血澎湃。

脑海中的画面闪回到2004年，那时我在父亲的引导下定居上海。因为台湾经济发展起步早，所以我那时对上海是相当抵触的，觉得到处老旧脏乱，特别是校园环境。那时候台湾小学的厕所都是有门的，但是当时我在上海看到的厕所却是没有门的。父母告诉我，在他们小时候台湾也是这样的，让我相信大陆一定会越来越好。由于抱持这个想法，在我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在遇到任何事情时，都能自然地去应对。

随着大陆的开放与发展，在大陆成长的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身边的变化。2008年，我到北京参观了奥运会场馆，亲眼见识了大陆在建筑方面实力的强大，特别是北京的鸟巢，从里到外彰显科技的智慧。在奥运会开幕式时，我第一次经历了全民共欢的辉煌时刻，感受到万众一



/ 杨保罗

心，共创历史的伟大力量。刚定居上海时父母所说的话成为了现实，我亲身感受到大陆确实在变好。那时我也步入了高中学习时代，热爱体育运动的我，开始为未来的事业奠定基础。

在青少年时期，因为大陆的学习压力比台湾大，所以在平时放学后的时间，不像在台湾的同龄人一样，会参加很多兴趣社团活动，往往要做无数的卷子及准备次日的考试。但我也在枯燥的学习生活中发现了乐趣，那就是打篮球，这也让我有了一段

疯狂的篮球时光。

我在台湾上小学时就接触了篮球运动，所以到大陆后，只要对手不是专业体育生，我都能在校园的球场上横扫八方。假期到外面的野球场，同样轻松击败一个个对手。篮球成了我在大陆读书时期的休闲娱乐。随着大陆的发展，世界著名的体育联赛NBA也到大陆推广，我也凭借着娴熟的篮球技术，有幸与NBA球员近距离接触，为我留下了青少年时期的难忘回忆。

2010年，已在上海生活6年的我，再次在大陆经历全民共欢的辉煌时刻，那就是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前，经常在大陆买不到“有品牌”的东西，往往都要回台湾或者请亲朋好友从台湾帮忙带到大陆，但世博会成功举办后，很多品牌都入驻了上海，让我在大陆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熟悉的招牌及陌生的新品牌不断涌现，很多新的高楼拔地而起，大大小小的商城相继开业。我深深感受到大陆与台湾的天平，已经偏向大陆这边。

那时，寒暑假返台与台湾同龄人交流，常被问到大陆的环境是不是变化很大，交通是不是很方便，高楼大厦是不是非常多，等等。当我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眼睛里都流露出向往的神情，表示很想到大陆看看，感受一下大陆的建设。有的假期我没有回台湾而留在大陆，都会有台湾的朋友来游玩，我就充当地陪的角色，让大家深度短暂感受大陆生活，让他们拥有一个难忘的假期。

转眼间到了2022年的今天，我确切地感受大陆的进步，与大陆的朋友们为了更好的生活一起合作，一起发展。我在大陆读的本科是旅游管理专业，再加上自己热爱运动，便选择成为一名职业体育健身经理人。抱

着为社会推广大健康理念的使命感，也为了在大陆的庞大市场里占据一席之地，我时刻挑战自己，超越自己，顶着业绩压力，付出了非同常人的辛劳。不论是大陆的朋友还是台湾的朋友都经常好奇地问我：“你怎么上班时间那么久？”“平时怎么工作都不休息，没有周六日吗？”“一天上班时间达14小时！”“一年只休息4天！”他们无不流露出震惊的表情。而我总能笑着回答：“这就是我深爱祖国大陆并留在大陆的原因。”


一切的机会，都必须建立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上。现在，大陆正全力为人民谋发展、为民族谋复兴，大陆又有这样一片广阔天地，只要个人付出足够的努力与热情，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失败中用心总结经验，就有可能抓住机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在工作闲余之际也关注家乡台湾的动态，很遗憾的是台湾因意识形态问题，民心涣散，发展缓慢，没有很大的改变。人们享受着生活中的“小确幸”，看似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但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小确幸”最终会让我们丧失热情和斗志，是生活中的陷阱。当然，不能过多强求大家改变，要做到改变就需要从我做起，自己先在两岸间

预备作奋斗的先锋，带动周边的人为自己的生活打拼，也为两岸的交流出力。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更增强了在大陆打拼的信心。纵然未来会有更多的挑战，种种困难也在所难免，但只要我有坚强的意志，一定能一一克服！

我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两岸人民最好的前景，因为两岸本是同根生，同文同种，只有团结一心，凝聚所有人的智慧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口号是简单的，实践是艰难的，我们可以结合台湾过去成功的经验和大陆的资源优势，在认同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基础上，携起手来，在华夏大地上共同创造新的辉煌。我们不用担心犯错，要实事求是，接受教训，虽然要经过漫长的奋斗过程，但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顺势而为，踏上两岸统一的旗帜奔向更好的未来。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青年强，则国家强。作为岛内的黄埔后代，作为生逢其时的青年，自当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坚定反“独”促统，悬帆启航，一往无前，才不辜负“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不辜负火红的青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作者为台湾黄埔后代）

海峡两岸大事记

2022年10—11月

□ 吴亚明

10月

2022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在台北举办

2022两岸汉字文化艺术节15日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开幕。两岸200位名家书法篆刻展、少年汉字艺术创作展，27个书法篆刻团体参与的“汉字艺术嘉年华”等活动，让民众近距离体验汉字和中华文化魅力。

台湾地区有关政党和人士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洪秀柱，新党主席吴成典，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等台湾地区有关政党、团体和人士以各种形式表示祝贺。

台湾统派政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劳动党、统一联盟党、中华爱国同心党、台湾人民共产党等台湾岛内统派政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广大台胞热议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受到台湾同胞高度关注。岛内反对“台独”、主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人士和广大祖国大陆台胞对二十大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二十大报告表达强烈认同和坚定支持。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走进台中雾峰林家

为纪念台湾光复77周年，“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巡回第41站，23日在台中雾峰林家宫保第开幕。

外交部发言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中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5日强调，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中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岛内各界纪念台湾光复77周年

25日是台湾光复纪念日，台湾各界有识之士汇聚台北中山堂，表达对抗日先烈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活动由统一联盟党主办，劳动党、夏潮联合会、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中华基金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等团体百余名代表参加。

台北秋祭白色恐怖死难者

一年一度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追思慰灵大会29日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举行。尽管风雨交加，仍有百余人到现场参会。人们肃立于一幅幅烈士遗照前，向在20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中牺牲的烈士默哀、致敬。

11月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湖南)数字化低碳化发展

展论坛在长沙举办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湖南)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论坛3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两岸企业家代表、两岸合作区产业联盟单位代表等近300人参会,围绕推进两岸产业融合发展、扩大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影响力交流研讨。

台湾渔船北太平洋海域着火遇险,宁波渔船救起48名船员

6日,隶属浙江宁波甬发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的“甬发1”渔船在北太平洋海域作业时,发现附近海域有渔船遇险求救。“甬发1”渔船立即向事发地点靠近,发现台湾“祥庆”渔船船体着火,船员已转移至两条救生筏。“甬发1”渔船迅速将两条救生筏上48名船员转移,并对1名失踪船员开展搜救,但没有发现。下午,获救48名船员已安全转移至另一艘台湾渔船。

两岸嘉宾宁波“以农会友”共探乡村振兴之道

9日,第五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在浙江省宁波市举办,论坛以“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振兴乡村”为主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600余人“以农会友”。

台企深掘进博会机遇

10日,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闭幕。参展进博会台资企业20家,参展总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比去年略增,且八大展区均有台企参展。

外交部发言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在谈到所谓萨台“自贸协定”彻底废除一事时表示,中方高度赞赏萨尔瓦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出符合中萨

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决断。

两岸民间团体共同呼吁:坚持“九二共识”,共创民族美好未来

由全国台联等两岸民间团体联合主办的2022年台胞社团论坛座谈会暨“九二共识”30周年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代表300多人以线上线下形式与会。与会人士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早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回正轨,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两岸青年在渝共话融合发展

由国台办、重庆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重庆·台湾周”日前在重庆举行。作为本届“重庆·台湾周”重要活动之一,第三届海峡两岸(重庆)青年融合发展研讨会召开。150多名两岸青年共聚山城,共谋西部发展机遇。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75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开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75周年纪念会1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出席并讲话。

第30届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聚焦推进祖国统一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第30届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16日在北京举行。来自祖国大陆主要对台研究机构、高校和有关方面学者、嘉宾约80人,围绕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与推进祖国统一、台湾民情发展规律与变化趋势等议题展开研讨。

国台办: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表示，我们最希望看到并始终致力于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但“台独”分裂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才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民进党当局不要再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为“台独”遮丑，混淆是非，欺骗世人。

2022“美丽中华”主题推广活动跨两岸举行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主办的 2022“美丽中华”主题推广活动 16 日举行。活动连线两岸 7 个会场，重点推介“千年运河”“美丽乡村”两大旅游主题产品，向台湾旅游业界介绍祖国大陆文旅产业新发展、新样貌。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应尽快取消针对“小三通”的单方面设限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8 日答记者问时重申，对于恢复两岸“小三通”，大陆方面没有任何障碍。有关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投入运营。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以欺骗性伎俩继续损害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而应尽快取消单方面设置的人为限制。

法学法律界人士：加强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 2022 年学术年会暨两岸关系法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和厦门同时召开。与会祖国大陆法学法律界人士表示，要加强两岸法学法律界交流，以高质量法学研究成果服务对台工作大局，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依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祖国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病逝，遗体将制成

标本保留

18 岁祖国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19 日 13 时 48 分停止心跳离世，园方将保留皮毛标本和骨骼标本，也会保留活体细胞。

国台办：对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病逝感到痛心和惋惜

对于祖国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不幸离世，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9 日答记者问时表示，大陆的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收到台北动物园的通报，大熊猫“团团”于下午 1 时 48 分停止心跳。我们对“团团”病逝感到痛心和惋惜。

长三角两岸企业家太湖论坛共话大健康产业合作

2022 年长三角两岸企业家太湖论坛 19 日在江苏省泰州市举行。论坛以“融合创新 健康共赢”为主题，200 多名两岸人士与会，围绕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交流探讨，共话合作。

两岸企业家海南共谋琼台合作新机遇

以“融合、创新、共赢”为主题的 2022 第四届台商峰会 24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逾百名台商和祖国大陆企业家参会。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

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 26 日投票，选举产生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等。除嘉义市市长选举因故延期外，在已选举产生的 21 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 13 席，民进党获 5 席，民众党获 1 席，另有 2 席为无党籍。

台湾地区所谓“18 岁公民权修宪复决公投”闯

谈谈航母战略问题

(上)

□ 石稼

《战国策·赵策》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讲的是用阴阳之道、四时变化来说明，贤能的人要善于审时度势，善于控制战争，能利用特定的时势乘时而起，而不会被时势所裹挟，不会被战争所控制，进而在政治、军事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这表明，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其既定规律，规律即是道。对道的把握体现着战略制定和有效运用的艺术，只有依附于道的战略才是持续的真

正成功。一个成功的战略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但战略本身并不是目标。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证明：航母大战略作为大国的必需品，是只有大国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同样，中国航母的发展记录着中国走向强盛的进程，勾勒出中国迈向民族复兴的轨迹，规划着中国实现崛起的蓝图。

战略在中国古代称为庙算、韬略、谋略、方略、兵略等。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近代军事战略学的奠基人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给出战略的定义是“为了达到战争的目的，对战

斗的运用就是战略”。按照克氏理论，谋略就是如何用最简便、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实现战略，达成战略目的。

“善谋者胜，远谋者兴。”将“善谋”和“远谋”结合起来，实现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海陆空战略—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有机统一，航母是担当这一角色的最佳选择。

航母虽然在军事领域是攻击性武器的一种，但在国家战略领域却被视为一种大国重器，并演变为一个战略符号，赋予了大国尊严、国家实力、军事威慑、外交政策甚至战争态度等

(接前页)

关失败

台湾地区 26 日举行所谓“18 岁公民权修宪复决公投”。据台湾当局选务部门公布的开票结果，同意票未达到通过门槛，以失败告终。

蔡英文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

蔡英文 26 日晚宣布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民进党在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国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答记者问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6 日就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应询表示，我们注意到这次选举的结果。这一结果反映了岛内“求和平、求稳定、要过好日子”的主流民意。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未来。

丰富意涵，其功能和价值已经远远超过武器本身。它既是国家战略意图的明确表达，更是达成国家战略目的的重要工具。

难怪有人谑称：“世界上没有什么外交冲突是一个航母编队解决不了的，这种强大的威慑能量和辐射效应是任何其他海战装备都无法比拟的。”

辽宁舰从入列的那一刻起，有关中国航母战略所蕴含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已经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了。有美国观察家指出：中国的航母海军战略已经正式启动，而且发展速度和自信心相当惊人，从辽宁舰的训练和新航母建造进度来看，美国的百年航母发展路，中国仅需20年就会走完。

发展不发展航母是个战略问题

翻开自航母诞生以来的一百年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航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崭露头角到二战时大显神威，再到冷战和冷战结束后成为国际政治军事舞台的大国利器，已不难看出航母的战略重要性。

曾几何时，美国国内围绕要不要发展吨位更大、作战能力更强的航母争论不休，与苏联把航母视为“活靶子”“浮动棺材”的观念不同，苏联人拿这个观点作为本国海军发展的重要指导，而美国人则是说给外国

人听的，目的是要说服包括中国在内对发展航母有需求的国家，放弃发展航母。

事实上，美国自己在发展航母这个所谓的“活靶子”“浮动棺材”方面一直不遗余力，甚至不惜血本。美国在《21世纪海上力量：投送决定性的联合能力》战略中，阐述了运用航母等海空力量实施威慑的理念。

创造性的概念和技术将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把海、陆、空、天和信息空间连成一体。在这个浑然一体的作战空间中，海洋将提供巨大的机动区域，由此可以向全球投送直接和决定性的力量。

难怪一些战略家批判美国这是在搞战略欺骗和战略忽悠。究其原因，是航母的战略价值所决定的，也是经过一百年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美国人自己深谙其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在航母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如果将航母的战略价值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国家战略拓展作一个链接，可以梳理出中国发展航母的战略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体现和维护大国地位、尊严与形象。中国政府和军队在说明中国为什么必须发展航母时，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建立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现代化军队，

而建立现代化军队，没有航母是说过去的。

刘华清将军在《回忆录》中说：“中国没有航母就不是现代化海军，这是海上作战体系的核心！”

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在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时表示：“大国中没有航母的只有中国，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

2016年12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建造航母是中国几代海军人的梦想，是大国的象征。”

在辽宁舰入列前，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没有航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张世平少将有个论断：“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拥有航母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支撑，拥有航母是历史必然。”

梳理一下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对影响大国地位的核潜艇、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一些国家重器的重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国内在发展航母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共识。

上世纪50年代，对中国要不要搞原子弹，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

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历经了美国的核讹诈之后，对中国要不要搞核潜艇，毛泽东主席曾豪迈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对发展两弹一星的意义，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2019年12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海军山东舰交接入列仪式时指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山东舰的入列，从战略上给予了高度肯定。

中国历届领导人高度共识的背后有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历经了百年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之后，核武器、核潜艇、航空母舰等在某些时候会演化为现代版的“舰炮外交”，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美军航母在南海海域的嚣张行为，就是

最现实、最直接的例证。

二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按照刘华清将军的初衷，发展航母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台湾和南海问题。他认为：南沙飞不到，台湾的东部飞不到，那中国的海权维护靠什么？有了航母，南沙和台湾问题的格局，就会大不相同。我们搞航母，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苏联比赛，主要是用于解决对台斗争需要、解决南沙群岛争端和维护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任务。

刘将军讲的这两点任务现在看依然是中国海军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要制约因素。从辽宁舰、山东舰入列以来开展的训练和演习看，主要集中在南海和台海地区。南海海域面临的挑战主要是美国的介入和挑衅，台海地区面临的危险主要是岛内“台独”势力的分裂图谋和行径以及美国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

对近年来航母编队赴南海训练和演习，尽管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说得轻描淡写，但西方媒体却认为，这是在充分展示中国对维护南海“核心利益”的强硬立场。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一篇题为《美军航母航至争议水域，中国炫耀武力》的文章中强调，中国在南海举行盛大

军演，与美军航母的一种“对峙”气氛就这样浮现了。日本媒体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在南海决不妥协的姿态，是对美国“自由航行”政策和对周边有争议当事国的武力警告，随着中国在南海岛礁的机场和港口设施进一步完善，南海形势的天平将会彻底倒向北京，中国今后在维护海洋权益上立场恐将越发强硬，而与中国在海洋问题上存在东海油气资源和钓鱼岛争端的日本今后恐将面对来自中国军方更强的压力，自卫队恐将疲于应对中国频繁“侵入领海”的舰船和越来越多抵近的战机。

与在南海问题上的含蓄立场相比，中国对发展航母与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的关系则说得比较直接和坚定。

台湾媒体援引日本防卫省2018年4月公布的数据称：根据统计，“辽宁”号成军以来，曾有5趟、10次接近台湾“外海”。报道还细数了每次的经过：第一趟于2013年11月自台湾海峡南下演训，随后在该年12月自原路线返航。第二趟为2016年12月穿越宫古海峡，并在2017年1月自台海返航。第三趟于2017年7月初自台海南下，并在该月中旬自台海北航。第四趟为2018年1月初自台海南下，并在该月中旬循原路线返航。第五

趟则为2018年3月20日左右自台海南下，并于本月20日接近台湾东部“外海”。对当时辽宁舰绕行台湾海峡和进行军事演习，国台办主任刘结一说得再明白不过：“大陆的立场是一贯的，非常明确。大陆有最大诚意，愿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前景，但我们也有足够的意志、信心和能力，阻止任何企图把任何一块领土从祖国分出去的言论和行动。我们举行军演，是为了捍卫我们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行动。”台湾《联合报》当时援引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葛莱仪的话说：“解放军近期举动是一个信号，北京要让台湾当局和美国知道，不要挑战涉及大陆主权核心利益，也不要台湾议题上挑战北京红线。”该报还评论称：台湾当局难道真的还要嘴硬下去？真要弄到“地动山摇”，不见棺材不掉泪，台湾才能理解大陆的强烈情绪吗？蔡英文执政两年来，一直所谓“维持现状”，难道现在要因为“约束不了下属”而功亏一篑了吗？

可惜，美国和台湾岛内的政客们没有多少人能读明白这段话。两岸的危机如自由落体一般被推到了一个越来越危险的境地：明明可以看到，却眼睁睁地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三是战略威慑与海外利益拓展。对中国而言，航母的战

略威慑功能主要体现在反霸和不称霸两个方面。在反对霸权主义方面，就是要通过发展航母，对与中国军事力量基本相当或相对较强的国家形成战略威慑。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银河”号事件，是中国海军心上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痛。1993年7月7日，满载728个集装箱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银河”号远洋货轮，从天津新港出发，计划经由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跨越印度洋，预计8月3日抵达阿联酋迪拜港。8月1号，美国海军以“银河”号上可能载有制造化学武器原料为由，派出军舰和军机对“银河”号进行跟踪、拍照和侦察，并蛮横地提出要登船开箱检查。在美方压力下，9月4日，中、美、海湾国家三方人员一起登船开箱检查“银河”号全部货箱，在确认没有发现违禁品后，“银河”号才被放行。

中国海军“青岛”号导弹驱逐舰上的一位军官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银河”号事件是美国人强迫我们吞下的一颗苦果，事件发生后，中国海军因没有航母编队，只能望洋兴叹，这是中国海军的奇耻大辱！

再联系近年来每当岛内“台独”势力猖獗，大陆军事反制力度加大时，美国总是把自己

的航母战斗群派到台湾海峡游弋，公然为岛内“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就不难理解中国在面对强敌干预和威慑时以壮士断腕的精神发展自己航母战斗群的悲愤与决心了。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中国海军有了航母战斗群，台海一旦有事，只要航母战斗群不停地围绕台湾岛航行，就能有效地对台湾实施封锁，强敌的航母大队也再不敢轻易干预介入台海战事了。

在不称霸方面，中国的航母战略应该是要对那些伺机侵害中国权益，但实力又相对较弱的国家能形成震慑。

一般而言，航母防空的作战半径为800—1000公里左右，反潜200公里左右，反舰主要根据导弹的射程确定，但至少也有几百公里，所以，一个完整的航母战斗群一般能控制两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能对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进行有效打击。

南海问题之所以演变成一个棘手问题，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南沙群岛远离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曾母暗沙距海南岛1600多公里，而中国海军航空兵的战机又因航程太远，没有空中加油机，无法对在南沙海域巡逻执勤的舰艇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护。东

南亚一些国家正是趁中国没有航母而鞭长莫及，大肆抢占中国南沙岛礁。一位西方战略学家说得很现实：“没有海军，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可以做这样一个基本研判：具备将把海军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电子战装备等有机融合成一体中国航母战斗群，会形成一个攻防兼备的强大作战体系，会有效地制止对中国海洋权益的侵犯行为，从而在根本上终结以往因距离太远鞭长莫及的尴尬局面。

2013年5月，中国海军原司令员张连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鼓舞人心的话：“一个核动力航母编队，可以控制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有这么一个战斗群，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在海外利益维护拓展方面，航母的战略价值也非常突出。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70%要通过海上运输，如果没有航空母舰战斗群，任何一个与相关海域关联的海洋国家都可能卡住中国的海上经济通道。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和海外利益不断拓展，海外投资保障、海外公民安全、海上航线安全等都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新课题。以“十二五”为例，期间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规模达到5390.9亿美元。截至“十二五”末，对外投资存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978.6亿美元，中国境外投资企业3.08万家，投资区域遍布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海外华侨华人有五六千万之多，持有的流动资产总额超过两万亿美元，海外“华人经济”正在形成。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推进，对海外利益的维护与保障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覆盖了40多个国家，总人口44亿，约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超过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9%，是世界最主要的能源和战略资源供应地。

经过几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过预期。在这样一个宏伟的发展战略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要使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通道畅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涉及东南亚、南亚及波

斯湾、印度洋西岸等三个航线。

从这个路线图可以看出，除直布罗陀海峡、斯卡格拉克海峡、卡特加特海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佛罗里达海峡、阿拉斯加湾等6个航道对“一带一路”战略影响相对较小外，包括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10余个海峡要道都对“一带一路”战略有重大影响，而这些海峡要道，绝大多数与美国海军曾提出的要依靠强大的航空母舰控制世界上16条重要海上战略通道相重叠。

这16条战略通道包括：阿拉斯加湾、朝鲜海峡、望加锡海峡、巽他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直布罗陀海峡、格陵兰—冰岛—联合王国海峡、卡斯洛拉克海峡、卡特加海峡、莫桑比克海峡、佛罗里达海峡等。其中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中东、北非这一航线上涉及的战略通道是必经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大动脉。这些战略要道，既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支点，也是“一带一路”的“软肋”，成为一些国家图谋制衡中国发展的重要筹码。

中国航母的发展，无疑对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对确保

“一带一路”海上运输线及航道的安全及有效应对海外危机等，都将提供重要保障和战略支撑。同时，还能保障身处海外的成千上万公民的安全，以及遍及世界的中国企业投资利益，等等。

2017年4月26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柏林同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共同会见记者时，对中国发展航母的目的作了非常明确的回答：“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人员往来已遍及全球，在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将近3万家，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中国公民达到数百万，所有重要国际航道中往来的货船大都或装载着中国货物，或与中国有关。在此新形势下，中国有充分理由提高自身的国防能力，并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地区和平做出贡献。”

航母是“万吨级外交”

美国五角大楼的办公楼上，挂着一幅美国军火界巨头之一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宣传画，图片是一艘“尼米兹”级航母的黑白摄影，下方写着一行字——9万吨级外交。

这幅宣传画很形象地描绘出航母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位置。这家军火巨头的老板是美国号称“引领军火工业攀登未来科技高峰旗手”的罗纳德·休格，“尼米兹”级航母的最后一艘“布什”号航母(CVN-77)

就由其建造。该舰于2009年1月10日服役。

一幅画、一行字，就把航母之于美国的意义和价值作了非常形象和精准的总结和定位。

2010年11月29日，马来西亚《中国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国危机时期“航母外交”的背后》的文章，其中称：美国海军曾经骄傲地说，每逢危机出现，每一位总统最先就会问道，最靠近的航母在哪里？美国媒体美其名曰“航母外交”。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的海军力量，航母一直是其不可或缺的外交工具，尤其是在国家众多、矛盾复杂，同时又有重大利益关切的亚非地区，美军的航母一直如影随形，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达成其政治军事目的的重要手段。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动用航母解决危机的历史，可以看到美国是逢事必有航母，解决问题必动航母。

据统计，美国为了外交需要，自1946年至1982年，共动用军事力量260余次，其中动用海军兵力占总次数的80%以上，其核心是航空母舰。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的一部国际关系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美国航母的足迹史，其在一系列国际重大事件中留下了独特而浓重的一笔。

1958年的黎巴嫩危机，美军派遣航空母舰支援，有1400多名陆战队员登陆黎巴嫩。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军出动8艘航母对古巴周围500海里海域进行封锁，迫使赫鲁晓夫颜面扫地，撤走导弹。1991年的海地危机，美军出动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和一艘核动力航母，迫使海地军方坐下来谈判。后面发生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军事打击叙利亚等，更是无一例外地让航母冲在前面。

在台海地区，每次台海危机也总能看到美国航母的影子，美军在敏感时刻向台海附近派遣航母已成惯例。1995年因李登辉访美引发的台海危机，美军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海附近海域。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美军又派了两艘航母为“台独”撑腰打气。2008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美军两个航母编队又“恰好”经过台湾海峡，此举真可谓司马昭之心。

在国际事务尤其是地区危机中，如果说美国所扮演的角色是“世界警察”的话，那么航母就是警察所佩戴的“枪”，必要时既可以举枪示警，也可以开枪射击。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看重航母在“维护世界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在每次紧张局势期间，都可以看到美军航母编队幽灵般游弋的身影，航母充当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急先锋”。

1862年9月26日，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在议会下院首次演讲中说：“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真理只在美国航母打击的范围之内”，代表了美国航母外交的真正本质和价值理念。

客观而言，航母作为一种进攻性武器，之所以能在外交事务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是由航母的特性决定的。航母作为海军武器库中最大的舰艇，以其强大的战略威慑、海域控制、远程投送和精确打击等能力，充当着大国博弈与军事外交的工具，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航母国家通过用航母“秀肌肉”来表达立场、应对危机和遏制冲突的重要手段。

航母作为“万吨级外交”并非美国所独有。1988年10月24日，法国国防部部长西瓦蒙在第11届法国海军装备展览会开幕致词中说：“核航空母舰是宏伟的计划，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它将作为法国外交政策在全世界的执行工具。”英国皇家海军

前司令斯坦霍普元帅对航母在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简单明了：“简单地说，力图发挥国际战略影响力的国家都有航空母舰。”

辽宁舰入列后，关于中国“航母外交”的提法也不断见诸媒体，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军事专家毕胜戈曾在《海峡时报》刊文称，“中国正在开启航母外交时代”。国内一些学者认为，“航母外交”正在成为我国海军对外交往的高端形式。

对中国而言，航母作为“万吨级外交”，与美国的“航母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主要是由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和防御型国防政策所决定的。

“航母外交”作为中国国防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自然会将“防御”与“和平”这一核心理念贯穿其中。而防御与和平的理念无法用西方的逻辑思维和话语体系来表达，它既源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70余年的伟大实践。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说：“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

在和平与防御的理念下，“航母外交”需要在中国外交和

中国国防所确定的基本框架下忠实地执行国家的意志。

一方面，中国的“航母外交”是和平外交，不是“舰炮外交”。航母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的一部分，走和平外交还是舰炮外交，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意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走的一直是以和平为核心要义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共赢，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017年4月27日，中国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中方发展航母是否旨在为中方的外交政策保驾护航时，发言人耿爽很明确地说：“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航母外交”会秉持中国外交的一贯传统，用航母来传递中国的和平理念，把与各国增进战略互信、和平相处、和而不同、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和谐世界、和谐海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念，通过“航母外交”宣传出去、体现出来。

600多年前，大明帝国的郑和船队，带着200多艘舰船、2.7万多人七下西洋，与南洋、

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及非洲东岸的30多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宣扬的是“和顺万邦”“共事天下太平”和“共享太平之福”等中国人和为贵的思想。

郑和所开创的和平航海范例，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理外部事务的智慧和智慧，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今后所开展的“航母外交”也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传递的信息是：以和平为核心价值的“航母外交”，一样能彰显一个大国的形象和地位。

今天，一些国家对中国“航母外交”是不是“舰炮外交”有所质疑，随着空间的转换和时间的推移，他们会理解：中国铸造航母利剑不是为了去战斗，而是为了和平，是要做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维护者。

另一方面，中国的“航母外交”是防御性外交，不是称霸和军事扩张的外交。这是由中国的国防政策决定的。2018年4月26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被炒热的“中国威胁论”称：“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国防白皮书对防御性政策和海军力量发展说得非常清楚：“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

展的战略态势，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领域斗争密切配合，积极应对国家可能面临的综合安全威胁。”“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观察中国发展航母是否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主要不在于中国发展不发展航母，也不在于中国拥有多少万吨的航母，而在于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只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不变，“航母外交”的本质就不会变。

这些政策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强大的中国不会欺负别人，但也不能被别人欺负。1971年10月25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时就掷地有声地表示：“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40多年后，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参加美国智库会议时的演讲，也阐述了同样的观

点：中国崛起本质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自救”和复兴。我们绝不去欺负别人，也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一个治理得越来越好的中国，一个长久繁荣稳定的中国，是美国的机遇，是全世界的机遇。

还要看到，防御性国防政策并不意味着中国永远放弃战争政策。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屈辱主要是来自海上的人侵战争。中国是一个拥有1.8万多公里海岸线、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大国。海殇则国衰，海强则国兴。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确保海上战略通道和海外利益的安全，是包括航母战斗群在内的中国海军的应有责任和历史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中国发展航母，不是立足于和谁打仗。开展“航母外交”，既是宣传和表达中国的和平理念，也是为了遏制别国不敢与中国轻易开战，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得中国的和平发展更有依仗、更从容，也使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落实得更更有底气，这应该是中国“航母外交”的最高境界和价值追求。

军语新解

□ 石评

卓越的研究工作是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空军的第一要素

——亨利·哈里·阿诺德

亨利·哈里·阿诺德是美国名将，被誉为“美国现代空军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历任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主管航空兵事务的陆军副参谋长、陆军航空队司令等职，绰号“快乐的阿诺德”。阿诺德是美国空军唯一一名五星上将，同时拥有陆军和空军上将军衔，是美国陆军的航空先驱，也是兰德计划（Project RAND）的创始人。兰德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非盈利政策性智库之一。



/ 亨利·哈里·阿诺德。

阿诺德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跟莱特兄弟学习飞行，是美国最早的一批飞行员，创下过 6540 英尺的高空飞行记录。年轻时对飞机的特殊钟爱让他最终为美国空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二战期间，他提出了现代战争中极为重要的概念“战略轰炸”，并将其理论化、系统化。在他的努力下，美国陆军航空队脱离了陆军控制，独立组建了空军。尤其在二战后期对日本本土作战中，显示出他对空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远见卓识。他曾豪迈地说：无须陆军和海军去发动那种伤亡巨大的登陆作战，美国的战略空军足够解决问题！作为对他这种豪迈说法的佐证，1945 年 8 月，在阿诺德的陆军航空队对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没几天，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如果说战争成就了阿诺德作为杰出军人的荣

耀，那么战后他在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则让他更为世人所记住。“卓越的研究工作是保卫国家安全所需的空军的第一要素”是他一生的座右铭。显示出他对研究工作尤其是空军研究工作的热爱和重视。事实上，阿诺德一生都注重理论研究，他曾长期潜心钻研航空技术和航空兵战术，写下了《飞行故事》《飞行员与飞机》《空战》《陆军飞行员》和《全球性使命》等著作。

他的理论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和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性和未来预测性，他也因此名声大振。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站在何处》的绝密报告，另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的预测。

二战结束后，阿诺德找到了他的老朋友美国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两人着手建立了一个由冯·卡门领导的科研顾问团，研究未来二三十年的空军发展方向。当时的成员就包括冯·卡门的高足、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学森。这个科研顾问团在 1945 年年底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站在何处》的绝密报告，报告预测了影响战后空军发展的八大“基本现实”，即：（1）飞机，无论是飞行员驾驶还是自动驾驶，其速度会远远高于音速（超音速飞行）；（2）因为空气动力学、推进和电子控制的发展，无人设施会将毁灭性武器投送到远距离目标，

这个距离可达几千英里(洲际弹道导弹);(3)小剂量的爆炸物将导致范围几千平方英里的大规模损毁(核武器小型化);(4)目标追踪导弹将进一步完善目前对付飞机的防御系统(防空导弹系统);(5)只有当飞机或导弹以极高的速度运行方能侵入由此防御系统保护的敌区(高超音速突防);(6)战斗命令和每架飞机间的完美通讯系统会被创建(机载通信系统);(7)飞机的定位和观察目标、起飞、导航和着陆、通信等,将不受视线和天气的限制(飞机全天候起降作战);(8)装备齐全的空中力量能远距离轰击目标、并能在空中补充供给(远程战略轰炸机与空中加油),等等。

时隔70多年,当我们再回看这一份报告时依然称得上是振聋发聩,上述的八大预测都已经全部变成了现实,而且代表了美国空军战后长期以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阿诺德的巨大影响力。

另一个是朝鲜战争的例子。为将自己的研究事业进行到底,1948年,阿诺德拿出100万美元,网罗了包括军事、情报、历史、数学、心理、统计学等等的大批人才,在加利福尼亚成立兰德公司,成为当时美国最强大的“智库”,主要任务是为美国政府、军队尤其是军火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咨询服务。兰德公司成立不久对朝鲜战争的精准预测,让这家智库名声大噪。

朝鲜战争爆发前,兰德公司发表过一个报告,预测美国会帮助韩国进攻朝鲜,且把美国可能的进攻方式以及时间表给了美国军火商。果不其然,美国随后出兵朝鲜。之后,对中国会不会出兵朝鲜,兰德公司又写出了《中国将出兵朝鲜》的预测性报告,并开价500万美元(当时是一架先进战斗机的价格)卖给美国政府,内附380页的研究资料。报告断定:一旦中国出兵,美国将输掉这场战争。美国对华政策研究室的官员们认为:当时的中国无论人力、财力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认为兰德公司是在敲诈,是无

稽之谈。而战局的发展和兰德公司预测的结果完全一致。从朝鲜战场兵败回国的麦克阿瑟曾感慨地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舍得几百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军人的生命,却吝啬一架战斗机的代价。”事后,美国政府又花了200万美元,买回了那份过了期的报告。朝鲜战争无论开始还是结局,都被兰德公司言中。兰德公司也因此被称为美国的“预言师”。

阿诺德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军事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先进的军事理论,不仅是军队建设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纵观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发展进程的重大跃升,首先是从理论跃升开始的,军事领域的革命更是如此。军事上的重大理论突破,必然会孕育出作战形态、作战样式、作战手段等的新变化,敌我双方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军事理论、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上的较量。

从阿诺德主导的美国空军和兰德公司的经验看,军事理论研究的生命力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实用性,即能够指导当下的军队建设和发展;二是前瞻性,即能够准确预测出该方向的发展前景、趋势和可能的变化;三是要有方法,能够找到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有效路径和解决矛盾问题的思路、办法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大国均加强了军事理论研究,且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统计,二战后全球规模的军事研究与发展增长率比军备开支的增长率平均超过4—5倍,世界军费开支中有10—15%是用于军事发展与研究。而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也已经让军事理论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先进的科学领域,以至于日益增长的军事科学力量,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甚至精神等方面的影响,甚至打乱科学发展的优先顺序。

因此,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研究,为未来的军队建设和作战提供科学的指导,是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这个问题认识不足,未来是要吃大亏的。■

陈赓与黄埔军校

□ 陈予欢

陈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大将之一。他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并屡立战功，深受黄埔师生的赞誉和爱戴，为团结黄埔将领共同致力民族独立、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黄埔生涯

陈赓（1903—1961）原名庶康，别字传瑾，化名王庸、陈广，湖南湘乡县柳树铺人。自填学生详细调查表：住址登记处，湖南湘乡县二都；通信处，湘乡二都柳树铺羊吉安陈立本堂交；入学前履历，民国六年毕业于县立中学校。刚满13岁，陈赓就偷偷跑出家投奔湘军，开始了闯荡江湖的生活。在旧军阀部队的4年中，陈赓只落得一身疥疮和满腹失望，但他的阅历却丰富起来，令他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有了更多的思考和选择。1921年，陈赓来到长沙，在何叔衡开办的书店中阅读进步书籍，后由何叔衡介绍，接触到毛泽东。受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的影响，陈赓工作之余进入各种



/ 陈赓。

补习学校和业余中学进修，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并参加青年救国团等群众团体，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活动。1921年底，参与湖南早期中共党组织工作。1922年，进入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多次聆听毛泽东的讲演，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0月，由夏曦、刘春仁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2月，陈赓考入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1月20日，作为旁听代表列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受到孙中山接见。

6月，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

3队学习，任中共黄埔军校首位支部候补干事，后任第3队中共党支部书记，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战斗，11月毕业。历任第2期入伍生队连长，第3期步兵科副队长。军校时期，周恩来看了陈赓表演的小品以后，认为陈赓不但是学生当中的骨干分子，而且对文艺也在行，就决定让他挑头成立“血花剧社”。他还参与发起组建“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青年军人》刊物，与国民党右派在军校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及其“白花剧社”进行面对面斗争。1925年2月，随军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作战。6月29日，参与组建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7月31日，被周恩来及中共广东区委调任为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8月20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缉拿“廖仲恺被刺案”凶手的行动。

10月，随军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10月27日下午，东征军指挥部到达羊高圩，此地距华阳约20余里，忽然接到前方谭曙卿派通信兵送来的急报，称第3师被敌军（林虎的部队）包围于距华阳10余里的塘湖地区，形势危急。蒋介石闻讯，急忙赶

到前线督战，并令陈赓向谭曙卿传令：凡退却者，不论官兵，一律军法从事。但是，在敌人的强大冲击下，第3师已守不住阵地，官兵开始向后溃退。看到林虎的部队已经迫近，陈赓一面指挥对追兵进行阻击，一面背起蒋介石撤退。陈赓一口气跑出好几里，到达河边后，连忙找到一条船，把蒋介石安顿在船舱里，飞速划到河对岸，一直退到了羊高圩附近，才在一片凹地里潜藏起来。叛军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发现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其后，以为东征军大队人马就在附近，加之东西南三面都有东征军部队，所以不敢穷追深入，便携着战利品向安流方向退去。天黑后，陈赓前去侦察道路，恰遇闻讯前来接应的古大存。古大存立即组织力量护送蒋介石到东征军总指挥部。安顿下来后，蒋介石马上将第3师溃散的部队加以整顿，并组织反击。他写了一封信，命陈赓火速交给何应钦。第二天正午，陈赓找到何应钦，报告华阳方面第3师失利的情况。陈赓救蒋背蒋脱离险境一事，一时间传遍了东征军和黄埔军校。陈赓为此闻名遐迩，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蒋介石曾经在黄埔军校向师生训话时说道：“什么是黄埔精神？陈赓就是黄埔精神。”

1925年10月，蒋介石调陈



1925年在黄埔军校任入伍生连长的陈赓。

赓任他的侍从参谋。尽管蒋介石百般器重和拉拢，但仍然无法改变陈赓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1926年1月，陈赓作为湖南省籍学生代表列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还认识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鲍罗廷的秘书胡志明。3月，陈赓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4期步兵科第1团第7连连长。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中，在周恩来领导下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5月，国民党右派主持通过实施“整理党务案”，强迫黄埔军校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陈赓毫不犹豫地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声明脱离国民党党籍。

黄埔恩怨

1927年4月18日，为联合黄埔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陈赓与蒋先云等在武汉发起成立黄埔军校各期同学讨蒋大会筹备委员会，35名黄埔同学联名签署讨蒋宣言。在筹备会的倡议下，4月23日武汉各界群众在武昌阅马场举行30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到会者“尤以各军武装同志为多”。七一五事变后，陈赓被迫离开特务营。

1931年6月，陈赓被中共中央特科派赴天津开展隐蔽斗争。火车停站时，他走出车厢在站台上转了转，突然发现在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再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被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黄埔军校原副教育长钱大钧。钱大钧不仅认识他，对他还相当熟悉。陈赓赶紧把帽子往下一拉，低头上了火车。火车开动后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出现在陈赓面前，说：“陈先生，长官有请。”陈赓只得去了。钱大钧见到他，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就叫副官跟上了你。”陈赓也不辩护，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后来，陈赓起身告辞，钱大钧也没有强留他。陈赓走后，副官问：“钱长官，你怎么放他走啊？”钱大钧说：“我在

黄埔军校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捕他，不是自找个烫手山芋，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陈赓走后，钱大钧也未再去纠缠他。

1946年，陈赓率改编后的第4纵队担负重要任务，既要阻止胡宗南打通同蒲铁路，又要保卫太岳、太行根据地，还要保卫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安全，中共中央决定，第4纵队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胡宗南是陈赓黄埔军校1期的老同学。当年，陈赓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领导人之一，胡宗南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头，两个人在政治上势不两立。后来，两人在战场上也多次交手，1932年在大别山，1936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山城堡，胡宗南部队都受到不小打击。如今胡宗南不仅部队众多，而且全部美械装备。8月，胡宗南飞到运城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增调他所谓的“天下第一旅”等精锐部队，沿同蒲线北上，南北夹击陈赓部队。第1旅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王牌部队，旅长黄正诚曾任黄埔军校炮兵科战术教官，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第22期野战炮兵科，该旅整编前为第1师，第1任师长就是胡宗南，时任第1旅第1团少将团长刘玉树，是黄埔



1944年，陈赓（左一）、宋时轮（左二）等在延安的合影。

军校第8期生。陈赓从敌电台和报话机密语中判断出第1旅行踪，该旅从临汾跟上来准备在临浮公路中段驻防，策应占领浮山的敌两个旅。这是难得的歼敌良机。22日，陈赓指挥3个旅沿公路中段一字摆开，趁敌军还未宿营构筑防御工事，当夜就向“第一旅”第2团发起攻击。第二天拂晓，又与黄正诚率领的第1团接上火。23日午夜刚过，就全歼敌第2团；24日天亮前消灭敌第1团。黄正诚被俘虏时，不服气地说：“你们违反战术法则，我们的炮火还没展开，你们就偷偷摸进来；你们的大炮在10米内使用，也违反射击教程；你们采取夜袭，这种打法不正规……”殊不知，近战夜战、火炮抵近射击、不等敌人火力展开就猛打猛冲，正是陈赓战胜优势装备敌军的法宝。黄正诚起先见了穿粗布军装的解放军还要摆摆架子，可是一听到司令员是陈赓时，立刻恭敬地说：“他是我们黄埔军校有名的老大哥，我很尊重他。”陈赓开导了他一番，指出他们是不义之师必败，他开始若有所思：“老大哥言之有理，启我茅塞，请容我三思。”

1947年11月，陈赓指挥伏牛山东麓战役，歼灭国民党军李铁军（1期生）部第5兵团。第5兵团司令官李铁军侥幸只身逃脱，他在溃逃中对部下说：“我半世英名，被陈大哥毁于一旦了。”战役开始前，陈赓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对打不打李铁军兵团，会上争论激烈。最后，陈赓提出“牵牛进山”，扯散它、消耗它，主力隐蔽，时机成熟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伪装主力引诱李铁军兵团进伏牛山的任务交给第4纵队13旅和第9纵队25旅。11月16日，陈赓率部包围镇平，把全旅仅有的几门山炮和所有的各种火炮集中起来，一齐急袭，激烈的枪声密得像爆竹，镇平刹时陷入硝烟与火焰之中，城里敌人声嘶力竭向李铁军求援：“共军主力正在攻城，几百门大炮轰击猛烈……”李铁军再也沉不住气了，率主力整编第3师急忙赶来。肥“牛”终于“牵”上了。为了把“牛”牵得更紧些，第13旅和25旅攻打内乡县给“牛”看，在鱼关口再设伏狠揍“牛”一顿。最终，李铁军深信不疑地率部队追上了陈赓主力，被成功“宰杀”。

1948年冬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与陈赓是同窗，副司令官胡璉是陈赓在黄埔军校第4期当连长时的学生，第12兵团第14军军长熊绶春是黄埔第3期学生。在围歼战中，陈赓说：“能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争取他们，可以影响、争取、瓦解敌军。”在向浍河南岸出击中，俘获熊绶春第14军参谋长梁岱。梁岱谎称是第14军下属部队的书记，未被识破。当天下午，梁岱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有关部门交给他陈赓写的三封信，一封给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封给第14军军长熊绶春，一封给第10师师长张用斌。梁岱回去后，把信交给了熊绶春，信的大意说：如放下武器，就是生路，否则死路一条。熊绶春看过信，说：“不要理它！”并且，当场把三封信都撕毁了。但熊绶春的心理还是受到影响，产生一定的动摇情绪。过了几天，第14军一个被俘的排长又被陈赓部队释放回来，再次带来劝降信给熊绶春，限他24小时答复。熊绶春看了信，不再把信撕掉，而是交给梁岱看，问他：“你看怎么办？”随后，又向梁岱探询：“像我们这样的人，会不会被杀？”就在熊绶春犹豫之际，总攻开始了。结果在激战中，熊绶春被击毙，梁岱再次被俘。在被送往后方

收容所的路上，梁岱碰见一位骑马的解放军军官，戴着眼镜，后边跟着几个卫士。解放军军官高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梁岱答：“我是第14军参谋长。”军官又问道：“你们军长呢？”梁岱说已经阵亡。军官当即派人找到熊绶春的尸体加以掩埋，并在墓前立了木牌，写了“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说是以备家属寻找。后来，梁岱才知道，他碰到的那位骑马的军官，就是陈赓。

黄埔情谊

1941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为团结黄埔师生促进抗战事业，在延安召开了黄埔同学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徐向前等百余黄埔师生出席会议。大会推选徐向前为延安黄埔同学会分会主席，选举产生了徐向前、陈赓等在内的15名理事，孟庆树等5名候补理事。陈赓在前线没有参加会议。

1945年，陈赓与周恩来在北平饭店偶遇侯镜如。侯镜如想不到在这种场合，与自己秘密加入中共的“入党介绍人”及“两次中共起义的老领导”（周恩来）相见，一时语塞。周恩来反应敏捷，开口道：“20年未见面了，好久好久了！”侯镜如答：“是呀，是呀，军校一别，二十春秋了。”侯镜如明白，这

是指在黄埔军校时期，这一问一答，周恩来保护了侯镜如。后来，陈赓秘密约见侯镜如。陈赓一见面就说：“周老师（周恩来）问你好！”侯镜如正好借此机会，告诉陈赓当年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后，在上海登报寻找组织，由于局势混乱而无结果。最后，陈赓与侯镜如以“不打内战，合作建国，再会”匆匆结束了这次会面。随后，他向周恩来、安子文报告，并对侯镜如脱离组织关系的这段历史作了调查与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许多黄埔出身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被俘获释的黄埔系军官、流落社会的原黄埔军人，经常前来找陈赓叙旧，或者带着一些个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向他求助。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也常请他出面接待这些朋友。虽然陈赓工作繁忙，后来又重病在身，但他总是热情接待，从不推辞，积极努力帮助他们。

1950年春，陈赓路过重庆时，曾专程看望一同关押的宋希濂、钟彬、曾扩情3位黄埔1期生，并设晚宴和他们坦率交谈了五六个小时，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勉励他们迎接新生活。1952年7月1日，陈赓去看望刚从香港返回北京不久的侯镜如，热情握着侯镜如的手说：“欢迎你回北京，你不要有顾虑，组织上早

已对你作了结论，你不是叛党，是脱党，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咱们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一起干事业。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嘛。”

1956年11月12日，陈赓与朱德、李济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组成中央谒陵代表团，赴南京中山陵谒陵。他见到了专程来谒陵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当年在黄埔军校任军事顾问的切列潘诺夫，还见到了昔日黄埔军校第1期同学侯镜如、廖运泽等。

1958年11月16日晚，陈赓陪同周恩来夫妇到唐生明（4期生，国民党湖南起义将领）家吃饭。席间，周恩来与大家谈了许多往事，一直谈到和平统一祖国的问题。此后，陈赓利用自己在黄埔军人中的影响与威望，积极配合周恩来做昔日黄埔同窗的工作，耐心开导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改恶从善，为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新功。1960年4月7日，他在北京民族饭店宴会厅会见黄埔同学，主要有：杜聿明（1期生）、宋希濂（1期生）、周振强（1期生）、王耀武（3期生）、郑庭笈（5期生）、杨伯涛（7期生）等6位。陈赓和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席间，他同黄埔同窗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大

家被陈赓的真诚感动。6位黄埔同学回到劳动的北京红星人民公社后，还联名给陈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1960年10月19日，陈赓陪同周恩来在北京颐和园宴请在京的黄埔同学，参加人员有：张治中（黄埔军校教育长）、邵力子（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郑洞国（1期生）、侯镜如（1期生）及杜聿明（1期生）、宋希濂（1期生）、王耀武（3期生）、杨伯涛（7期生）、郑庭笈（5期生）、周振强（1期生）、唐生明（4期生）、黄雍（1期生）、覃异之（2期生）、周嘉彬（黄埔军校区队长）、李奇中（1期生）等。大家一起合影。

1961年3月16日，陈赓因病在上海逝世。3月25日，首都各界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隆重的公祭大会，周恩来总理主持，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1962年3月12日，在陈赓逝世周年前夕，周恩来为陈赓骨灰盒题词：“陈赓同志之骨灰。”

参考文献：

1. 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7月编辑，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第5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4月影印发行《陆军军官学校第三队学生详细调查表》。

2. 陈赓编写组著，当代中国

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陈赓传》。

3. 廖盖隆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总纲·人物》增订本。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

5. 张光宇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6. 1927年4月24日《汉口国民日报》。

7. 刘绍唐主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11月1日出版《民国人物小传》第10册。

8.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黄埔军校史图册》。

9. 陈予欢著，广州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

10. 湖南省档案馆、湖南人民出版社校编，1987年9月出版《黄埔军校同学录》。

11. 穆欣著，新华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陈赓大将》。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

13. 王健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中国红军人物志》。

聂荣臻在黄埔军校论说“纸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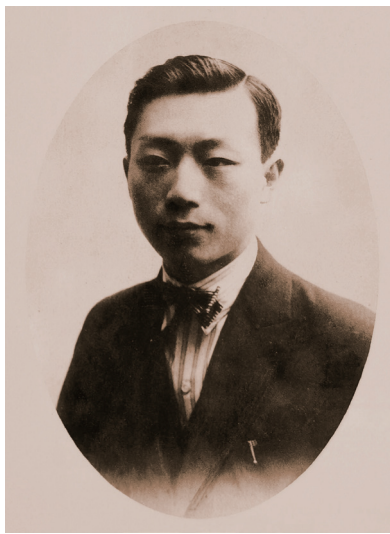
□ 陈宇

“纸老虎”的概念，在中国明清小说中即有之。“纸老虎”论的集大成者是毛泽东，他在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有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等，时间在1922年至1925年之间。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聂荣臻也较早地在课堂讲稿里使用了这一概念，他的这篇课堂讲稿刊登在1925年10月24日出版的《黄埔潮》上。聂荣臻的“纸老虎”论说，重点阐述黄埔军人应有的“克己牺牲”和“大责任”，为丰富和奠基黄埔精神内涵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一

1925年9月3日，由中共派在莫斯科“中国军事班”学习的26名学员，学成后回国到达上海。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陈独秀接见了他们，其中熊雄、聂荣臻等12人分配到广东工作，大多数人到黄埔军校中任职。

聂荣臻离开上海，于9月中旬抵达广东黄埔军校。



/ 聂荣臻。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而创办的。聂荣臻回忆说：“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刚由苏联回国的聂荣臻理所当然地受到重用，被授予少校军衔，分配到政治部任秘书，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后为邵力子）、副主任鲁易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

传工作，并兼任政治教官。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秘书一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秘书。军校服务细则规定：秘书“有督促全部部务进行之责”“对于政治工作有随时规定计划，商情主任或副主任按期施行之责”“对于全部工作成绩，有随时指导职员整理之责”等。由此可见，聂荣臻的工作任务繁重且责任重大。

聂荣臻回忆：“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1925年9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兼1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同志。鲁易又名鲁其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过去就熟悉，他没有经过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国的。后来他由黄埔调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洪湖地区作战中英勇牺牲了。熊雄同志虽与我一起分到了黄埔，但他很快就随东征军出发，到1926年初才回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鲁易同志的工作……我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

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那时政治部共有工作人员约20多人。”

这时的广州是国民革命中心，左派和右派斗争激烈。戴季陶等人积极反共，廖仲恺刚被暗杀。左派有识之士都主张反击，而陈独秀却一味退让妥协。正是在如此政治大背景下，周恩来叮嘱聂荣臻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党团活动，争取进步青年，扩大党的影响。聂荣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有专职教官和兼职教官。专职政治教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他们的课最受学生欢迎。此外，政治课还经常请一些社会名流来讲。聂荣臻初到黄埔军校，主要工作是负责安排政治教育、编辑教材和讲义、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帝国主义论等课程，特别是协助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宣传及部务工作。

聂荣臻是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的成员，在军校政治部分管党的工作是他最忙的职责。黄埔军校的党团领导小组，开始由鲁易和聂荣臻负责。不久，熊雄从东征前线回来，任党团领导小组书记。这时，全



1925年，聂荣臻（前排右三）与黄埔军校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校中共党团员的人数已经相当多，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几个支部和小组。但是，只有少数中共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大部分还是秘密党员。党团活动的内容，除了做好教学工作以外，大量的工作是在军校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党团活动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党团员，同时也做党团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学习等。

聂荣臻每周自黄埔岛搭船去广州市区一次，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听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委员，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等人做的形势报告。回黄埔军校后，

聂荣臻将报告精神在党内传达学习。

9月底，黄埔军校政治部编辑的《黄埔潮》（3日刊，又称半月刊）创刊，专载政治论文和时评。《黄埔潮》杂志一共有3个版本，另外还有黄埔同学会印行的《黄埔潮》，1926年7月底创刊；黄埔同学会广东支会印行的《黄埔潮》，1927年6月下旬创刊。3个版本的期数都是独立编号，后两个版本为周刊。在黄埔史研究中，多见将这3个版本混为一谈。

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充满了朝气，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前来报考，“到黄埔去”成为那时青年中流行的一句靓丽口号。大批优秀青年来到

广州黄埔岛上学习军事，准备为了打倒列强、报效国家而战。刚到广州的聂荣臻也深深被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所感染，他登上讲台授课，并整理讲稿发表成文章。10月24日，《黄埔潮》第5期刊登了聂荣臻的讲稿《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

二

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安排军校官生的政治教育，并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每期要上100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对那个时代传播进步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聂荣臻在黄埔军校讲过多次政治课。那时的黄埔军校授课没有正式教材，大多是由教员自编讲义。聂荣臻发表在《黄埔潮》上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一文，即是他其中一次给学生授课的主要内容。

聂荣臻在这堂课的开篇，首先提出了革命精神对于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切军队在战争中之能取胜，它必具有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此外，还有一个重

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反之，不知道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命令的驱使是靠不住的，尤其以每月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的。”（《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聂荣臻以正在作战中的东征军（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骨干）为例：“能如此勇敢直前牺牲一切地去杀贼，一鼓气儿竟将天险惠州攻下”，这就是证明官兵们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此次出征东江的目的，并证明他们是受了党的训练，受了主义的培养的表现。聂荣臻还列举了俄国红军的事例，介绍说，俄国红军完全是出身于只懂很少军事知识的工农，兼之装备组织等都远不及久有训练而且装备精良的敌人，然而，他们最终肃清了一切反革命的敌人，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围攻，保障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及社会主义。“为什么他们这样的厉害？因为他们很明白的知道为什么要战争。战争是为劳动者的利益。换言之，即为红军本身的利益。这样的目的，为帝国主义军队中所没有，因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所保护的利益，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压迫他人和寄生

虫的。”

聂荣臻明确指出了黄埔军校进行政治教育的目的，即是“使我们在军事训练之下，得着精神上的愉快，使我们成为活活泼泼有训练有主义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人”。以及“三有”：有训练、有主义、有革命精神的革命军人。显然，在聂荣臻的课程体系中充分体现了黄埔精神的深刻内涵。

聂荣臻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了纪律对军队的重要性，指出：“（俄国）红军的军纪，亦不是机械的、盲从的，完全是由他们的觉悟程度而定——担负解放劳动者的大责任。觉悟愈高，他们的战斗力愈强、坚忍不拔的勇气愈激昂，而战斗的进击愈勇往直前而不顾。”聂荣臻认为，唯有政治觉悟提升到“大责任”的高度，才能保证有“三愈”：愈强的战斗力，愈激昂的坚忍不拔勇气，愈勇往直前而不顾的战斗进击。

关于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点内容，聂荣臻在讲课中列举了多种方式和方法，指出：“（俄国）红军的军营即是红色的学校，反对一切的压迫和虐待。国家的政权和党，不但很注意于兵士之学习军事知识，并且十分地注意于兵士政治学识之发展；授课、集会、演讲、党部学校、补习学校、俱乐部、戏园、图书馆、音

乐会及一切的报纸杂志等，均普遍地实行于各军营中，这就是他们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因此我们很希望学生同志们，课余都进图书室去，无论我们的时间怎样短少，只要我们自己肯去研究，多少我们总会有所得。还希望自动地起来在本部的刊物上多多发表意见，并且组织俱乐部，设立各种有益的游戏。”聂荣臻在此特别提出了黄埔军校学生在课余时间提升政治觉悟的实操方法：多进图书馆、俱乐部，多写文章发表在本校的刊物上。

聂荣臻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中也有“政治工作”，但它“不是教育的、觉悟的，而是欺骗的、愚民的政策”。并列举法国、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军队中用教士做政治宣传工作，说明“愚民政策，也是蒙昧不了觉悟群众的”。

聂荣臻由国外帝国主义军队延伸到中国反动军阀的军队，重点阐述说：“中国的一切反动军阀的军队，自然说不上有政治工作，他们——军阀也不曾会注意到此。他们是用很公开的愚民政策以压服一般不觉悟的兵士——农村破产的劳苦群众，用军人服从为天职，禁止兵士看阅一切出版物。兵士们也无非为的几块钱饷的生活费，‘有奶便是娘’，哪能说得上战争的目的。”

聂荣臻特别指明当时国内南北方有代表性的两个军阀——陈炯明和张作霖，虽然他们拥兵数万，貌似强大，其实是不堪一击的。为此，聂荣臻由革命队伍拥有革命精神说起，推导出“我们只要肯努力的去做点宣传工作，所有一切‘纸老虎’的军阀，是不堪有主义有目的革命的觉悟军人一击的”的卓越论断。

由此即见，就在这课堂上，聂荣臻由“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入题，在中国共产党人中较早提出了一切军阀是“纸老虎”的概念。

关于“纸老虎”的提法，在中国民间早已有之。明清时代的著述中已经有此概念出现，与之近似的还有“纸头老虎”“纸糊老虎”“纸虎”等说法。明代施耐庵著《水浒传》已有“纸老虎”的踪迹。清代褚人获著《坚瓠集》中有：“纸牌能耗人财，故呼纸老虎。”晚清李鸿章、慈禧太后也曾用“纸老虎”比喻清军和皇权。胡适在1930年8月23日日记中写道：“要知政府之为物，本是一种纸老虎，经不起戳穿。”

以上“纸老虎”的比喻重在自嘲和“内指”，在战略上将“纸老虎”外指敌对势力和一切反动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

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理论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和唯物史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毛泽东是“纸老虎”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中至少有7次论述“纸老虎”问题（1940年2月、1946年8月、1948年1月、1956年7月、1957年11月、1958年12月、1964年1月），对此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中共历史上较早提出“纸老虎”概念的还有蔡和森（1922年9月）、恽代英（1922年9月）、邓中夏（1925年10月）等早期领导人，他们为这个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聂荣臻在这堂讲课中以东征军和俄国（苏联）红军为例，详尽地论述了“知道了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就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这说明聂荣臻当时已经较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具有的重大意义。他说：“军队中政治工作是如何重要哟！尤其是我们革命军当充分的准备着精神的战具，以对待那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者。现在国民政府之下各军队已先后设立政治部了，我们更希望所有的政治都不是为撑门面的，是要真正成为军队中思想上的指导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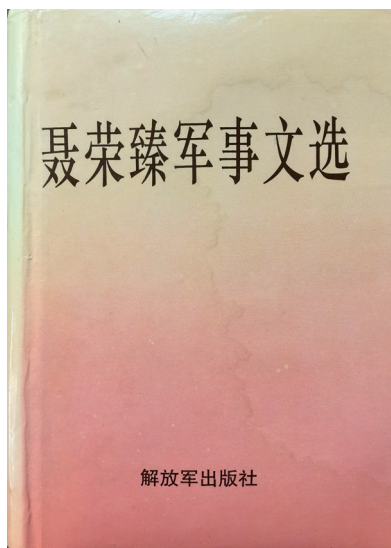
关、教育机关，使革命军人人都能了解我们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为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目的也即是我们自己求解放而斗争。”（《聂荣臻军事文选》）对于黄埔军校的在校学生，聂荣臻要求他们更加关心政治、学习政治、研究政治，鲜明地指出：“在黄埔的学生同志们，更容易接受政治知识，复有研究主义的工具。那么，就应当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去研究政治问题和主义。”

聂荣臻最后号召说：同志们，准备着“精神上的战具”，高举我们的战旗，完成党赋予给我们的使命！

这一课“讲堂录”，后来以原标题全文编入《聂荣臻军事文选》。

聂荣臻在这堂课中，5次用到“精神”两字，特别强调革命精神对于取得胜利的重大作用；5次用到“责任”两字，尤其强调了“大责任”，实际上把救国救民的使命担当赋予了黄埔军人；4次说道“勇”——勇气愈激昂、勇敢地上前去斗争、勇往直前牺牲一切地去杀贼、勇往直前而不顾，充分彰显了黄埔军人的勇于牺牲精神。

统览聂荣臻这堂政治课的主线，可明显看出他重点讲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几个关键词，特别是提出了多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词



/ 聂荣臻军事文选。

汇，如：精神战具，精神活泼，克己牺牲，大责任，纸老虎，使命等。黄埔精神核心内涵之牺牲、责任，在聂荣臻的讲课中更以“克己牺牲”和“大责任”重点强调和凸显了出来。可以说，聂荣臻为黄埔精神的提炼、形成和总结也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三

聂荣臻发表在《黄埔潮》杂志上的这篇文章，展现了他的口才、文采和理论水平。1926年1月12日，聂荣臻被推选为《军事政治月刊》政治编辑主任。

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打击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中山舰事件”。他借口中山舰有异动，突然发起袭击，聂荣臻等共产党员被扣押在中山舰

上。“中山舰事件”是由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弄虚作假造成，而蒋介石却将错就错，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一律交代登记，并不得担任党政军的正职，以抑制中共的发展，进而取消中共的存在。4月初，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1军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开始退出军校和第1军。周恩来离开第1军。聂荣臻等一批原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共产党员被免去军校职务，后到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等单位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直接参与同国民革命军各军及黄埔军校等单位的联系，派遣干部，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和进行北伐准备工作。

聂荣臻初到黄埔军校时，第1期学生已经毕业，第2期学生去参加第二次东征，第3期学生刚入学。1926年春，第4期学生入学。从1925年9月中旬到1926年4月上旬，聂荣臻在黄埔军校工作了6个多月时间，给军校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10月22日，清风店战役胜利结束后，被俘虏的国民党第3军军长罗历戎（黄埔2期）即自称是聂荣臻的黄埔学生，要求见聂老师，聂荣臻与罗历戎谈话，教育他悔过自新。（《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百岁风雨路 悠悠黄埔情

——记我的父亲、百岁黄埔老人刘华民

□ 刘春

我的父亲刘华民，1922年9月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在那个军阀混战、国家风雨飘摇的年代，读书识字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我奶奶虽然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但很有远见，省吃俭用地供我父亲读书，想让他出人头地，不再给地主当佃户。于是，父亲在本村小学堂接受了启蒙教育。

13岁那年，幸运降临到父亲头上。当时，宋哲元在他的部队办了一所军官子弟学校，名叫育德中学。由于父亲的二舅父在29军宋哲元部任连长，作为军官子弟，父亲得以进入育德中学学习。父亲说，学校条件很好，还发了校服，大家体操、上课、吃饭、休息都是集体行动，完全按照部队的模式管理。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悍然向我29军发动进攻，炮轰宛平城。29军将士奋起抗击，组建起大刀队与日寇浴血奋战。由于战事吃紧，学校不得不解散，父亲返回了家乡。也就是在这时候，父亲心中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的种子，立志要读好书、学好本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家效力。

回乡后不久，家乡也成为了沦陷区。父亲听说山东籍将领李仙洲在安徽阜阳创办了成城中学（后改为国立二十二中），许多山东有志青年都慕名前去，父亲也决定前去投奔。在本村开明乡绅的资助下，父亲从山东步行到安徽阜阳，进入二十二中学习。

父亲回忆，学校的学生宿舍很简陋，没有床，大家在地上铺点稻草，稻草上铺个床单，就在上面睡觉了。起“床”的时候，发现床单上有很多乱



/ 生活中的刘华民。

蹦的跳蚤，很多学生因此染上了严重的疥疮，有的学生甚至还被病痛折磨得丢了性命。父亲也未能幸免，浑身長满了疥疮，特别是腿上，烂了好多洞，流血流脓、痛苦难耐，一个学期不能上课学习，还差点丢了命。至今，他腿上还有许多当时留下的疤痕。

1944年夏，随着沦陷区的扩大，学校也处于危险之中。为了师生的安全，学校开始向陕南、四川一带迁移。第一批西迁的师生走到汝南韩庄时，遭到日军的追杀，许多学生伤亡，这就是韩庄惨案。父亲西迁的时候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还要躲避敌占区的日本鬼子。过平汉铁路时，他们白天不敢过，只有夜晚趁鬼子的探照灯照别处的间隙，才能分批迅速通过，看到探照灯将要照到他们时，大家就趴在路边的沟里隐藏起来。

途中经过河南内乡县时，父亲见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在此招收学生。他感觉报效国家的时机到了，马上征求老师的意见，老师听了父亲考军校学本领报效国家的想法后大加赞赏。这样，父亲就和部分同学一起报名投考西安七分校。经过半年的军训及文化考核，父亲被分配到21期炮兵科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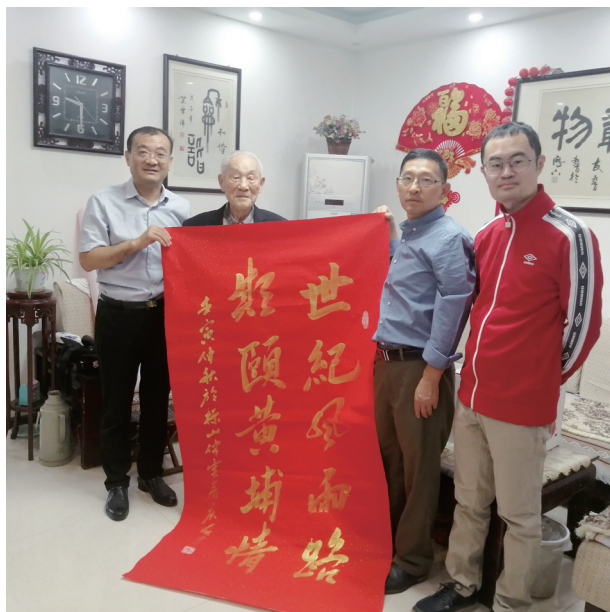
3年军校学习期间，父亲始终怀揣驱逐外敌、报效国家的信念，刻苦学习军事理论、专业知识，积极参加训练演习。1947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1948年初，父亲被分配到北京傅作义的部队。1949年初，部队起义，北京和平解放。父亲思母心切，经部队领导批准，回到家乡中学任教。后来，父亲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始终坦然面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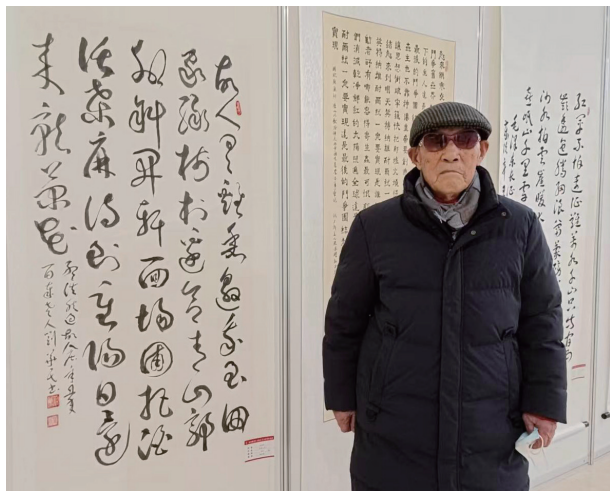
1978年，国家拨乱反正，父亲恢复了工作，回到原单位。学校领导委以重任，让他担任高中的班主任，并兼任学校后勤部会计。父亲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获得了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1981年，父亲光荣退休。1984年，根据国家政策改为离休。离休后的父亲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学生上不了音乐课。父亲觉得，校园里不能没有学生们的歌声。他懂音乐、会识谱，口琴、二胡、风琴样样拿得出手，便主动义务教学生们音乐。从此，校园里回响起学生们欢快的歌声。父亲的举动，受到了乡亲及师生们的称赞。


2015年，父亲加入了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成为会员以来，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每年都安排工作人员来家探望两三次，给予父亲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2022年9月，恰逢父亲百岁寿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亲自到家为他祝寿。“感恩国家、感恩党、感恩政府”，这是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也道出了我们家属的心声。



/ 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给刘华民(左二)祝寿。



/ 刘华民携作品参加书画展。

如今，父亲已是百岁高龄，但他几十年来关心国事的习惯一点儿也没改变，《新闻联播》《海峡两岸》是他每天必看的电视节目。父亲十分关心海峡两岸的动态。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祖国和平统一。党的二十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给了国人很大的信心。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坚定支持，祖国和平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关麟征将军与台儿庄战役

□ 马冠群

1937年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占领了我国北平、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济南等城市及广大地区。1938年春，日军由津浦路南北对进，企图一举夺得徐州，进一步攻占武汉，以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野心。在战局危殆的形势下，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广大官兵，血战台儿庄，挫败了日军会攻徐州的计划，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国抗战期间国民党正面战场最为精彩最为壮烈的一幕。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高潮的推动下，中央军和地方部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取得的。面对装备精良、气焰嚣张的日军，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将军指挥中央军汤恩伯第20军团同桂系、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等地方部队采用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迎击日军，以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正面牵制日军，另以汤恩伯军团迂回从侧背攻击敌人，阻击、迟滞日军



关麟征。

南进。

关麟征，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颇具军事天赋，骁勇善战，临危不乱。历经东征、北伐战争，用兵以稳、准、狠著称，屡建战功，逐步迭升，32岁任第52军（属汤恩伯第20军团，辖郑洞国第2师和张耀明第25师）军长，上任不久即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初，日军进攻台儿庄外围地区时，关麟征第52军正在安徽亳县一带休整。接到作战命令后，关麟征立即率部赶至台儿庄东北地区集结，准备迎击南犯的日军濑谷支队。战役初

期，关麟征部在台儿庄东北方面侧击南下日军，配合孙连仲部第2集团军正面防御，之后南进驰援袭敌侧背，协同守军形成对日军的夹攻之势，使进犯台儿庄之敌陷入中国军队的反包围中。

3月17日夜，关麟征部的郑洞国第2师第6旅赶至临城东南10公里的沙沟，当即占领阵地，掩护第52军在韩庄附近集结。次日晨，往临城附近南犯的日军濑谷支队第63联队被该旅阻遏，激战一日后，该旅退往纸坊一带布防。

19、20日两日，关麟征部52军主力到达韩庄、利国驿，并沿运河加紧布防，一面自行掩护集中，一面利用运河阻击日军南犯。

21日，张轸所部第110师接替关部在运河以南贾桥亘、微山湖间的防务，而关部迅捷经台儿庄，北渡运河，向洪山镇、兰陵镇集结，准备向峰县反攻，从而形成以攻势为主而又适宜防御之有利态势。

24日下午，第52军军部进驻峰县的鹁鸽窝，以郑洞国第2师控制黄山口、杜家沟附近地区，策应张耀明第25师。24日

夜，张耀明 25 师第 73 旅戴安澜部，准备潜入郭里集，进攻西葛埠之敌兵。不料侦探临时获得情报，郭里集已为日军第 10 师团濑谷支队赤柴第 10 联队第 2 大队所盘踞。鉴于日军疏于警戒，戴安澜旅出其不意地迅速将敌人包围，然后施以火攻，并在四周以机枪扫射，日军被歼灭殆尽。战斗中，某连排长贺扬武被日军的燃烧弹击中，衣裳、鞋帽着火，他眼疾手快除去满身行头，忍着伤痛上阵和日军搏杀。战斗结束后，张耀明师长当即奖励贺 30 块大洋，并由排长擢升为副连长，以鼓励他的英勇行为。

25 日，濑谷一部约 3000 人，坦克 30 余辆，山炮 10 余门，沿枣临公路东进，其一部经峰县进至九山，关部第 25 师奋起迎击，毁敌坦克 3 辆，斩获甚多。与此同时，郑洞国第 2 师攻达郭里集至枣庄之间的桃园等日军据点，击溃了该地据守各点之敌。汤恩伯根据战绩通电嘉勉关麟征及全军。

27 日晚，关麟征奉命率部由傅山、青山一带驰援台儿庄。

29 日晚，对腰里徐、柿树园一线日军发起猛攻。一日之间，连续收复马庄、大庄子、张楼、兰城店、贾家园、小集子、三佛楼等地，进展 10 余里。之后，又攻击北洛、獐山一带日军之侧背。

31 日拂晓，关部与第 85 军王仲廉部第 4 师联合，向台儿庄日军濑谷支队攻击前进，截断台枣支线的交通，使濑谷支队腹背受敌，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31 日下午，临沂南下的日军板垣第 5 师团沂州支队约 4000 余人，配备野炮、战车，突然袭击第 52 军指挥部。当时指挥部仅一个营，兵力约 300 人，在敌我力量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正在第 52 军军部指挥的汤恩伯军团长主张 52 军迅速转移，以免被敌军包围，关麟征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我们主力目前正给进犯台儿庄之敌以强大压力，这是胜败关键时刻，如处置不当，将导致严重后果。例如，白天在敌人面前转移部队，容易暴露企图，在敌人的迫击下，有崩溃的危险。即将到手的胜利，

就会失去。”汤恩伯仔细思考了关麟征的意见，又再次分析了敌情，重新作出了适宜的应敌部署。关麟征则根据形势，命令警卫营营长徐文亮率领警卫营在离指挥部千米之外的地方展开佯攻。日军突然遭到迎头打击，仓促应战，认为警卫营就是中国军队主力，集中全力猛扑过来。士兵们边打边利用丘陵山地撤退，待到黄昏，援军赶到，大败日军，将日军骑兵部队全部歼灭。下午 3 时，临沂方面 3000 余日军，携炮 20 余门、坦克 10 余辆，已窜到向城、爱曲一带，直逼台儿庄，威胁第 20 军团侧背，企图解濑谷支队之围。情况危急，汤恩伯立即命令：“（一）第 52 军留置一部于台儿庄附近监视，以主力依洪山镇为轴，外翼经该镇东北转向爱曲、向城席卷，将敌卷入我包围



/ 52 军追缴溃逃到郭里集一带的残敌。

线内。(二)第85军由青山附近,分数纵队,强行向南桥、鲁坊一带之敌扫荡,并掩护第52军之侧背,排除台儿庄、峰县两面敌之尾追,并截留牵制爱曲之敌,以阻其前进。”

31日夜,关麟征部奉汤恩伯之命,留下骑兵团驻柿树园、张楼一带监视台儿庄之日军,主力按集团军的部署向爱曲、秋湖方向迂回,反攻坂本支队的侧背。至4月2日,中国军队相继克复房前、小王庄、凤落、作字沟、小锅里等村庄,并击败栾庄、刘庄的日军步兵、骑兵。坂本支队分出一部在爱曲、兰陵镇附近抵抗,其主力则向杨楼、底阁方向逃遁。

同日,蒋介石为督促参战部队尽力作战,特下达训令:“临峰台韩间之敌,经中国军队连续猛攻歼灭过半,其退路断绝,增援无望,尚作最后之挣扎。临沂方面之敌,苦战之余,放弃战场,竟分兵向台儿庄转进;淮南之敌,不顾侧背危险,向蚌淮集结;晋南豫北之敌,不惜放弃既得地区,抽出兵力,以图策应,均足证明敌人对于鲁南会战之重视,及其危殆之程序。仰我英勇将士,其各认清本会战之重要性,并中国军队将获全胜之现状,严令所属作最大之努力,为战略上適切之协同,促成



/ 中国军队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台儿庄城头。


绝对的胜利,以利全局,发扬国威。”由此,各部于4月3日开始向日军发起总攻击。关麟征部在肃清兰陵镇、洪山镇之敌后,又将坂本支队包围于杨楼、底阁附近。当日,中国军队攻取杨楼、底阁,日军死伤惨重。坂本支队连夜向底阁西南之肖旺附近逃跑,关麟征部乘胜追击,复将坂本支队包围在肖旺附近,并于4日、5日连续攻击该敌,使其陷于苦战而不得脱身。至此,台儿庄东北方向的日军已完全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6日、7日,濑谷、坂本相约乘着夜色突出包围撤退,离开台儿庄战场,两支队残敌丢盔弃甲、辙乱旗靡,向峰县、枣庄方

向溃逃。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如下山猛虎,锐不可当。日军遗尸遍野,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至此,中国军队获得全胜。

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第5师团、第10师团1万余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轻重机枪1100余挺及大量战利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赢得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高度评价。

关麟征率52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奋勇杀敌的壮举得到了军界的充分肯定。1938年夏,在武汉一次军事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日本情报的专家王芑生向蒋介石汇报说:“日本军方对中国军队的评价,认为第52军在台儿庄作战中,表现出战斗力很强。”蒋介石在对武汉珞珈山举办的军官团的一次讲话中感慨地说:“中国军队如果都像第52军顽强战斗,有那样强悍的战斗力,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国内军事评论家还将关麟征誉为“关铁拳”。

台儿庄大捷后,关麟征因功擢升为第32军团军团长,率领所部继续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参加了武汉保卫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

一位黄埔四期生的人生经历（上）

——记父亲姚国俊

□ 姚建

不堪回首六十年，
世事沧桑自作愆。
少壮迷途失东隅，
收之桑榆未为晚。

60岁生日这天，黄埔军校4期生、陆军大学9期生、国民党原第38军军长、四川省政协委员姚国俊写下这首题为《六十述怀》的诗。这是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的一首诗。诗中的“东隅”和“桑榆”来自《后汉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意即过去的时光无法挽回，但在未来可以去获得。这首诗表达了他对过往的感叹、愧疚和对未来的期许。

姚国俊出生在陕西礼泉县农村一个贫苦的私塾先生家庭。在父亲的启蒙下，他幼时就酷爱读书，陕西省立一中毕业后参加北京大学预科考试，榜上有名。但他后来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报考远在广州的黄埔军校。

投笔从戎

姚国俊为什么要改变初衷，投考黄埔军校呢？这同他的家庭变故有关。就在他中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庭的重担



姚国俊 勋元
/ 黄埔时期的姚国俊。

一下压在了作为长子的姚国俊身上。本就靠亲友资助上学的他不得不开始考虑他和家人的生计：如果去上北京大学，学费、生活费哪里来？家人怎么办？

这时，有两个人的建议和鼓励促使姚国俊下决心报考黄埔军校。一位是张耀明，1905年1月生，是姚国俊在省一中的同班同学。在陕西省一中学习时，两人十分要好，无所不谈。张耀明进了黄埔军校后不久，就给姚国俊写信，介绍黄埔的情况，并动员他投考黄埔。老同学的相邀，让姚国俊动了心，他感到这不失为一条既可以帮

助家庭走出困境，自己还能干一番事业的道路，何况还有那么多老乡在一起。

另一位是王宗山。王宗山，字登云，长姚国俊8岁，是姚国俊的亲戚。1924年6月，黄埔军校成立后，王宗山担任校长办公室英文秘书兼外语教官。1925年7月，王宗山受黄埔军校派遣到北方各省招生，得知姚国俊的处境，也想帮他一把，就将自己前来招生的事托人告诉了姚国俊，表示只要他愿意，可以帮助他考入黄埔军校，而且进校后，亲戚间也有个照应。

那时，黄埔军校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中，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报考黄埔军校是许多青年人的愿望，而且，黄埔军校不但不收费，还管吃管住有零花钱，这对一些家境贫困的青年来说，亦有一定吸引力。王宗山的关心和帮助，最终促成姚国俊下决心投考黄埔军校。那年，姚国俊21岁。

黄埔岁月

1925年7月，姚国俊和北方一些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包括

共产党人刘志丹先后出发，奔赴广州。

军校对考生的学历要求是旧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考试则是按旧制中学的水平出题，加上口试，以观察考生对三民主义了解的程度，推断其志趣、常识、能力及将来有无发展的希望。中学生水准的考题，对于学习成绩一向很好的姚国俊来说，自然不成问题。他顺利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4期的入伍生。

就在姚国俊当入伍生不久，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开始了。参加这次东征的黄埔军校校军归属东征军第1纵队。东征军的第一个目标是攻打惠州，此处集中了陈炯明主要兵力，又是东江门户，三面环水，地势险要。第1纵队的大部兵力担负攻城任务，姚国俊所在的团作为预备队，给前方护送弹药给养。预备队虽不直接冲锋陷阵，但常常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也很危险。10月13日上午开始攻城，14日傍晚，经过激战，第1纵队终于攻下惠州。

攻占惠州后，姚国俊所在的2团在此留守。在出师东征和驻守惠州期间，他耳闻目睹了许多同学身先士卒、英勇战斗的事迹。参加攻打惠州的27名连的党代表，都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

左派人士，其中21名牺牲、6名负伤。他还亲耳聆听了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惠州第一公园举行的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很受教益。在这场战役中，姚国俊第一次亲历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体验到为正义事业而战的豪情，体验到军人的荣光。

第二次东征凯旋后，姚国俊又回到军校，继续接受教育和训练。开学后，学校的课程排得满满的。政治课是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都列入正课。教学方式多种多样，有演讲、讨论、问答、调查、出版刊物等。军事课主要是讲典范令和四大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另外还设有军制学、实地测图等。

1926年2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姚国俊考试成绩不错，成为军官生，担任步兵第1团第9连第1排第1班班长。入校不久，学校办理入党登记，要求学员都加入国民党，姚国俊也接到一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此时，他对三民主义已有所了解，衷心拥护，遂逐项填写并签名，成为国民党党员。后来有一天，与姚国俊同一个团的老乡刘景桂（刘志丹）找到姚国俊，慎重地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共产党。姚国俊出身贫

寒之家，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三民主义，他对“共产”亦并无反感，加之在第二次东征时，他目睹共产党员学生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情景，深受感动，因此，他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秘密履行了手续，刘志丹就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姚国俊生前多次对儿子口述）。这样，姚国俊与一些同学和教官一样，同时具有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身份。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姚国俊尚没有树立执着的共产主义信仰，加之他性格内向，不愿抛头露面，不善交往，喜欢按部就班地学习、训练，因此，他并未参加太多党的活动。不是和他很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已参加了共产党。

1926年10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捷报声中，黄埔4期的全体同学正式毕业。至此，姚国俊结束了黄埔军校生活。

初涉军旅

毕业当月，姚国俊同一部分黄埔毕业生来到第21师报到。师长严重对新来的年轻军官们训话，然后把他们分发到最基层。姚国俊被分发到第163团（团长陈诚）第1营（营长宋希濂）第2连连连附。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打了几个月。北伐军一路浴血奋战，在

两湖战场横扫军阀吴佩孚部队，攻克武昌，但在东路江西和福建一线，遭到军阀孙传芳部负隅顽抗，损失惨重。

1926年秋冬，严重奉命率第21师随东路军从广东出发北伐，一路转战闽浙赣地区。在江西南浔线上，部队碰上了孙传芳手下卢香亭的队伍，双方在德安的马回岭地区拉开了阵势。姚国俊所在的163团1营奉命向敌方阵地发起进攻。数次攻击中，他身先士卒，始终在第一条线指挥作战。激战中，姚国俊左大腿被子弹穿透，仍然咬牙不退，一直撑到突破敌阵。东路北伐军经过几昼夜血战，终于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在这次战役中，姚国俊在部队里赢得了荣誉，不久当上了连长。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姚国俊正在上海。虽然“清党”没有触及到他（1926年下半年，刘志丹被共产党组织派往冯玉祥部以后，姚已基本没有参加党的活动），但他毕竟具有两党党员身份，突如其来的事变让他感到震惊，而何去何从也让他非常矛盾。踌躇之际，他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




/ 1985年，姚国俊在黄埔军校旧址留影。

邓演达。他是姚国俊最为信赖和爱戴的一位师长。他先后联系了几位在上海的黄埔4期同学从上海出发，一路奔波来到武汉，找到了自己的老师，表示了对“清党”的疑虑。邓演达比较了解这几个年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还以北伐军总政治部的名义，根据几个年轻人各自的经历和特点，给他们一一介绍了新的岗位。由于姚国俊一直在军队任职，且表示想回陕西，邓演达就将他介绍到西北军杨虎城部工作。姚国俊还是在上中学时，就知道杨虎城的大名，很愿意在这位久已仰慕的将军手下工作。

1928年春，姚国俊被派到中央军校军官团学习。当年秋，成绩优异的他考上北平陆军大学。1931年底毕业后，重新回到杨虎城部，担任军官训练班副主任（主任由杨虎城兼任）。姚国俊以自己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在作战中的指挥应变能力，尽责尽力地为17路军培养军事骨干力量。他的工作和人品，得到杨虎城的认同和下级军官们的赞许。

1932年7月，姚国俊的陕西老乡和黄埔校友关麟征和张耀明各写了一封信给姚国俊，热忱地希望他到25师任职，信中充满期待之情。同时，关麟征也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以私人的名义，请求杨为姚放行，满足自己的心愿。关与杨是老乡，25师过去属于西北军第26路军孙连仲部，他们虽无深交，但彼此都熟悉，且都看重和尊重对方。杨虎城虽然舍不得姚国俊离开17路军，但关麟征和张耀明二人的盛情难却，最后，还是让姚国俊去了25师。

从此，姚国俊与关麟征、张耀明几位“乡党”风雨同舟、南征北战，共同度过了一段血与火的军旅岁月，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抗日伤残官兵生产自救的安置事业

(上)

□ 杨守礼 黄胜利

国家对荣誉军人就业和安置的法律保障

1937年，国民政府国防部颁布了《荣誉军人职业保障法》，规定“荣誉军人退役后由政府安排力所能及的职业或自谋职业，并要求接收单位挤出单位职工编制数的2%—3%，用于安置退役荣誉军人，不得拒绝”，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强制要求各单位为荣誉军人安排就业岗位。

1940年9月，国民政府又制定了《荣誉军人服务计划纲要》《荣誉军人服务办法》，规定：“中央及地方各党政军机关、学校、医院、公私金融及事业组织等，均应就编制员工、伏役定额内录用荣军官兵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但其编制员额不足20人者得自行酌用。”由于荣誉军人身体残缺，单位不愿提供就业岗位，因此强制要求执行，并由中央各机关带头执行。

单纯的依靠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荣誉军人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提高荣誉军人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因此，军政部通过荣誉军人总管理处等机构，从基本常识、精神状态以及

服务技能三方面入手，对荣誉军人进行岗前训练。经过岗前培训的荣誉军人，由军政部相关单位就其年龄、特长、教育程度、伤残部位及等级、原有职业等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同时用人单位将适合荣誉军人的职务、待遇、所需人数上报至军政部，由军政部再将荣誉军人安排到适合的岗位上。为了促进伤残军人自力更生，成为社会生产者，政府鼓励荣军集体创建简易化工厂、工具修理厂、实验场和各种生产合作社，参加荣军教养院下设的工艺股、习艺所、手工工场等地工作。

因国家财力匮乏，伤残官兵单纯依靠恤金难以养家糊口，抗战八年伤亡官兵接受抚恤比例仅为14.3%，伤残官兵就业机会又很少。军政部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和抚恤委员会为改善伤残官兵的生活境况，减少国家负担，本着“集体生产，合理分配，共同生活，自由发展”的原则，由国家供给或贷给必须的工具与原料，或由国家划拨荒废土地为垦区，组织伤残官兵合作生产，并准予未婚官兵结婚，已婚者可以接着入住，形成家庭的雏形，使伤管

单位家庭化。这既可积极发展社会生产事业，又增加了抗战急需的粮食供给。

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的设立

1939年6月7日，何应钦呈请蒋介石任命黄雍兼任“残废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处长获准，该处后改为“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其任务是筹组“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并同时开展荣誉军人生产相关事务。1940年9月14日，处长黄雍签呈《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垦殖团编制表》，经行政院院长蒋介石9月30日批复“准予备案”。按此编制成立3个垦殖团、7个分团，以便容纳伤残员兵1万人。此前已用屯垦筑路办法安置伤残人员，已开发之“雷马屏峨计划书”（雷马屏峨为四川南部与西康接壤的雷波县、马边县、屏山县、峨边县彝族同胞聚居区）一并会同经济部，电请四川省政府核复意见。其实早在黄雍签呈备案垦殖团编制表之前后，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陆续开发了一些垦殖区、工厂等安置伤残官兵的设施。1940

年5月，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就调拨了第一、第九两临时教养院伤残官兵，交“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接收垦殖。1942年9月，第九临时教养院选拨轻伤残、适于垦殖员兵到荣军生产事务局第二示范农场从垦。

1943年1月，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归并到荣誉军人总管理处时，已经建立了一些直属垦区：雷马屏峨垦区，及童家溪、东大台寺示范农场，第一农场、第二示范农场及第二工厂等。同时，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统一筹款购置耕牛、农具等，以解决荣军垦殖的具体困难。

战时主要劳动力在前方参与作战、后勤、运输等工作，后方遗留多为老弱妇孺，而战时增加前线粮食补给迫在眉睫，所以化兵为农，增加粮食生产，既是安置轻度伤残军人自力更生、安定社会秩序的主要途径，也是解决战时粮食供给的办法之一，因此伤残军人屯垦计划是一举数得的善举，也进一步增强了残废军人“虽残不废”的信心。

一、备案的垦殖团编制表

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备案的垦殖团，包括3个垦殖团、7个垦殖分团，每个团或分团有10个垦殖队。备案编制表包括：垦殖团、垦殖分团、垦殖队、团农林畜牧实验场、团保健院、分团诊疗所、团子弟学校7

个编制表。从这些编制表中可见荣军垦殖团的规模、组织结构、各种配套机构（实验场、保健院和诊疗所、子弟学校、托儿所）等多方面的信息，特别是一些细节，是我们了解荣军垦殖全貌的

宝贵资料，这里选择几表列出，以飨读者。

垦殖团设3个垦殖团和7个垦殖分团，每一团（或分团）分10队，每队分3区队，每区队分3班。以队为单位成立一垦殖

表1 垦殖团编制表

职别	阶级	人数	马匹	备注
团长	上校(少将)	1	1	
付团长	中(上)校	1	1	
副官	上、中尉	各1		
军需主任	二等军需正	1		
军需正	三等军需正	1		
军需佐	一等军需佐	1		
	二等军需佐	2		
军医	二等军医正	1		
司药	一、二等司药佐	各1		
军法官	同少校	1		
统计员	同少校(上尉)	1		
技术指导员	同中(上)校	1		
技术佐理员	同少(中)校	2		
合作指导员	同少校	1		
书记	同上尉	1		办理文书、抚恤事宜
	同中尉	2		办理文书、抚恤事宜
电务员	同中尉	2		
司书	同少尉	3		
司号长	军乐准佐	1		
军械军士	上士	1		
军需军士	上士	2		
文书军士	上士	2		
传达军士	中士	1		
传达兵	上等兵	10		兼服勤务
司号军士	上士	1		
司号	上等兵	2		
库目	中、上士	各1		
库兵	上等兵	10		
饲养员	上等兵	1		
炊事员	上等兵	1		
	一等兵	3		
合计	官佐	27		
	军士	9		
	兵役	27		

备注：本团政工人员由政治部派充，本编制表未列；通讯兵依需要临时呈请拨派。

新村或一工厂。队的编制如表 2，队内的各项职务一般都由荣誉军人调充，他们除带有原薪外，每月支津贴不等，非荣军被委用者按军阶支薪。

按上编制表一个队为一个新村，有约 160—170 名荣军。编制中特别指出上士看护军士除办理公共卫生事宜之外，还兼任托儿所管理员。这说明垦区新村不仅容纳荣誉军人，而且有他们的配偶和孩子，这是一个美好的垦殖新村。这个新村不同于一般传统的农村，它是准军事化的，有很规范的建制，有托儿所，团里还有子弟学校和保健院、诊疗所。

中央伤兵管理处（荣誉军人总管理处）和抚恤委员会等机构，建议设立荣誉新村。1940 年 10 月，湖南伤兵管理处处长赵凌霄经湖南省协助，勘定湘西靖县为垦殖区域。他认识到婚姻问题对伤兵垦殖以及荣誉新村建设的重要性，官兵因伤致残后在心理上会产生问题，因此只将他们身体上的创伤治愈是不够的，还需要恢复他们精神上的健康。于是作了如下规定：凡已经结婚的将妻子接来垦区居住，相互安慰；凡属荣誉军人都有相互介绍配偶的义务；未订婚的可请亲友、地方人士为其介绍，迎来荣誉垦区结婚；订婚的一律参加集体结婚。湘西垦区相继举行 3 次集体

表 2 垦殖团（分团）下设队编制表

职别	阶级	人数	备注
队长	上尉（少校）	1	荣军调充者除带原薪外月支津贴 20—30 元，非荣军委用者按军阶支薪（下同）
区队长	中（上）尉	3	荣军调充者除带原薪外月支津贴 15 元
特务长	少尉	1	同上
司书	准（少）尉	1	同上
看护军士	上士	1	办理公共卫生兼任托儿所管理员。由技训班妇女队毕业生派充，月支 20—30 元
号兵	上等兵	2	荣军调充者除带原薪外月支津贴 6 元
传达	上等兵	3	荣军调充者除带原薪外月支津贴 4 元，兼服勤务
炊事兵	上等兵	2	
班长	中士	9	荣军调充者除带原薪外月支津贴 10 元
	下士	9	同上
垦殖兵	上等兵	136	
合计	官佐	6	
	士兵	162	

表 3 垦殖团保健院编制表

职别	阶级	人数	备注
院长	二等军医正	1	由团二等军医正兼
军医	三等军医正	2	内外科等
司药	一等司药佐	1	由团部司药兼
	二等司药佐	1	由团部司药兼
事务员	同上（中）尉	1	
看护长	同准（少）尉	1	
司书	同少尉	1	
司药军士	同上士	1	
文书军士	同上士	1	
军需军士	同上士	1	
看护军士	同上士	3	
	同中士	3	
看护兵	同上等兵	8	
传达	下士	1	
	上等兵	2	
炊事员	上等兵	1	
	一等兵	3	
担架兵	一等兵	6	
合计	官佐	8	
	军士	10	
	兵役	20	

婚礼，其中 1942 年 4 月一次就有 14 对新人参加。经过近 2 年时间，一般荣誉军人都能安心地努力生产。

有的荣誉军人垦区以中队为单位，每中队有5个分队，每个分队由4个班共计64名荣誉军人组成，这样每一个中队共有320名荣誉军人，另外还有长官和家属等。各班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行从事生产活动，最终按多劳多得的原则进行分配。垦区内同一分队集中居住，从事各种农副业生产及修造道路水利等活动。

垦殖团设有保健院，分团设有诊疗所。团或分团都有10个队，就是有10个垦殖新村，地域比较广，有急病时就医不方便，因此各诊疗所按各新村或工厂之远近附设分诊所若干，人员由诊疗所酌派。特别是保健院和诊疗所都附设有病房，可使急重病人留医，这是很难得的条件。

从队编制表可知，每个队都有一个托儿所。而上述垦殖团子弟学校编制表说明，垦殖团子弟学校初小3个年级，高小3个年级，还有一个幼儿园，共有7个班级，配备7—14个级任教师，幼儿园配有8位保姆。那么整个垦殖团区应该有3个子弟学校（因为有3个垦殖团），3个幼儿园，有近百个托儿所，此外还有3个保健院，7个诊疗所，及几倍于诊疗所的分诊所，这是何等庞大的垦殖团区啊。垦殖园原定收容1万荣军，实际设置远超过1万人，再加上他们的配偶，就几近两万多人。因为他们都正

当青壮年，正是婚配的年龄，也是生育的年华，如此计算几年之内，这个垦殖园区就会发展成三四万人口的城镇了。当然这3个垦殖团和7个分团不一定设在同一个地域。

垦殖团的房产以及垦殖所需的农具、种子等费用，先由农林部或军政部贷予资金，分年摊还。荣誉军人及其家属日常所需的粮饷，前一年半原单位全额发放，以后按年递减至完全停发。荣誉军人进行垦殖活动，不仅使他们能够通过劳动满足日常所需，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而且能够增加后方的粮食供应，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增加社会财富，稳定后方社会秩序，实现虽残不废的目标。

二、对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的重视

垦殖团编制内设上校至少校的技术指导员和技术助理员，垦殖分团编制内也设有少（中）校的技术指导员和5至10名技术培训班农工科优秀毕业生选派的技术助理员，垦殖团农林畜牧实验场编制中亦设有少校技术员。这些技术人员的军阶都很高，例如垦殖团的团长是上校（少将）军阶，而技术指导员是中（上）校军阶，仅比团长低一级，与副团长同级，可见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视。

作为处长的黄雍，他在招揽伤兵生产的高级技术人才上很费心力，多方聘请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的各方面专家来为荣誉军人生产基地工作。过去他从不请人来家吃饭，但是他对留法的菌类专家陈梅朋和从国外归来的工程师魏兆琦另眼相看，为了表示对他们由衷的欢迎和敬重，黄雍破天荒专门为他们设了家宴。这一举动反映出他“求才若渴”的心境，另外也是因为他的太太、著名演员郑挹梅喜欢与文人和学者来往。果然，通过接触，她和这两位专家都成了好朋友。

陈梅朋是我国著名的真菌学家，黄雍希望他能够在伤兵农场里发挥作用。陈梅朋比黄雍小两岁，1926年获法国鲁斯大学博士学位，1926—1927年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非营利性私人研究所，一直走在世界科技前沿，是微生物学、免疫学、传染病学等学科的起源地，曾开发出狂犬病疫苗、天花疫苗、流感疫苗、黄热病疫苗等多个造福人类的疫苗产品，并培养了10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1928年，陈梅朋在上海引种双孢蘑菇成功。他执着于真菌学研究，谈到自己的研究时非常陶醉，眼睛炯炯有神，让他显得很有魅力。他在黄雍家小聚时，真诚表达了他多么期待有一个地方可以踏踏

表4 垦殖团子弟学校编制表

职别	人数	备注
校长	1	团长兼
教导主任	1	月支 50—80 元
级任教员	7—14	高初小各三级、幼稚园,月各支 40—60 元
专任教员	7—14	月各支 30—50 元
童军教练	1	月支 40—60 元
保姆	8	由荣军眷属中选用,各月支津贴 20—30 元
事务主任	1	月支 50—70 元
事务员	2	月支 40—50 元
传达	1	月支饷 5 元,另加主副食费
校役	2	月各支饷 5 元,另加主副食费
伙伙	4—10	同上
合计:教职员	41	校长不在编;保姆列为教职员
伙伙	13	

附记:按子弟多寡酌配教员;班级学生不足时应缓设。

表5 垦殖团农林畜牧实验场编制表

职别	阶级	人数	备注
主任	同中校	1	团部技术指导兼
技术员	同少校	2	团部技术助理员兼
事务员	同少尉	1	
技士		6—10	技训班毕业调任,除原饷外月支津贴 8 元
文书军士	上士	1	
传达	下士	1	兼服勤务
	上等兵	2	兼服勤务
炊事员	上等兵	1	
	一等兵	1	
合计	官佐	4	
	技士	10	
	军士	2	
	兵役	4	

实实在地从事研究。他很想栽培出多种食用菌,为国人造福。

黄雍夫妇与陈梅朋的友谊持续很久。抗日胜利后,因为仰慕他对研究的执着,为了支持他的工作,黄雍曾一度把家安置在

上海大华农场,黄雍夫人郑挹梅还拜他为师,向他请教怎么种蘑菇。他和黄雍一家的紧密联系一直持续到 1948 年黄雍因到湖南从事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工作离开上海。1949 年后,陈梅朋任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培植出两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菌种,改良了栽培蘑菇的方法,使草菇、银耳、灵芝进入了平常百姓家。陈梅朋于 1968 年 66 岁时离世。2004 年,在郑挹梅 94 岁高龄即将走完她生命旅程时,欣闻陈梅朋教授(1902—1968)逝世 36 年后,召开了他诞辰 102 周年的纪念会,中国食用菌协会追认他“食用菌产业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这对怀念他的生者是一个很大的慰藉。

另外一位重要朋友是工程师魏兆琦。魏兆琦谈吐幽默和善,能说一口流利而又漂亮的英语。谈起南京《雷雨》首演,他说他看了演出,对郑挹梅扮演的繁漪有很深的印象。他以为作为著名女演员,她一定是花枝招展,生活浪漫,没想到现实中的郑挹梅竟是如此低调,朴实无华。魏兆琦不仅是荣誉军工厂的技术指导,还义务指导中正学校遗族工厂的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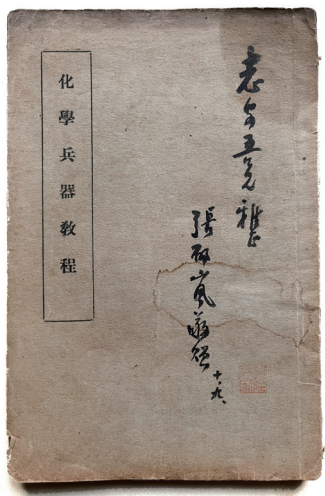
魏兆琦与黄雍一家的友谊带有传奇色彩。那时黄雍工作很忙,妻子怀孕反应很大,黄雍就请魏兆琦带妻子去教会诊所检查,并找时间帮她提高英语会话能力。魏兆琦几乎每周都带郑挹梅去山上的小教堂做礼拜,一起读英文圣经、唱英文赞美诗。在魏兆琦的努力开导下,郑挹梅怀孕时的抑郁心态变得平静

我珍藏的黄埔军校签名本《化学兵器教程》

□ 单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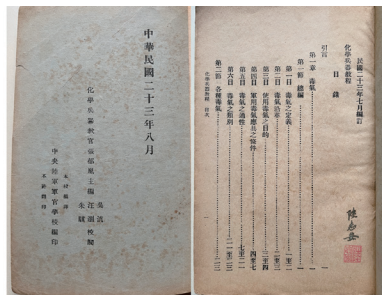
藏书者不乏对签名本情有独钟，何谓“签名本”？顾名思义，签名本就是由作者、译者、编者，包括收藏者等亲笔签名或钤印的书。签名本的书写格式，一般采用传统的三段式：受者名字、赠语谦词（雅正、指正、惠存等）、赠者签名及日期。在用笔上有软笔（毛笔）胜硬笔（钢笔）之说。总而言之，只要是他们亲笔签名的书便是签名本，特别是名家的签名，那无疑更加珍贵。赠书与受书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颇具庄重仪式感。作者出了新书，上款题字，下款签下自己的名字，用以赠送知己好友、同道中人，但求知音赏；而受赠者也自会认真拜读，当赠者手迹映入眼帘，犹见字如面，情谊浓浓。

笔者在旧书网淘得一册《化



/ 封面书影。

学兵器教程》，纸本大 32 开，222 页，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 1934 年 8 月编印，版权声明“本校编译，不许翻印”。关于化学兵器之释义，引言云：“欧战以前，各国所用之武器，不外枪炮、飞机、坦克、炸弹诸物；其中装填之药料，不外送药、炸



/ 版权内页书影。


药与起爆药三类，嗣后武器渐滋进步，更利用化学药品，制成毒气烟雾及纵火、信号、照明等药剂，曾于欧战中显示其特殊效能，颇引起军事家之注意；故现世对于上项五类药剂及放射此五项药品之器具，另辟一门，名之为化学兵器，以作专门之研究。”烟雾总论又言：“史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蚩尤作雾，帝军不辨南北，由此可知烟雾在上古时代已用之于战争矣，惟当时大都以湿草燃点，使其燃烧不能

（接前页）

了。虽然当时郑挹梅没有成为基督徒，但她对抗战必胜的信心给了她力量，后来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叫胜利，以表示对抗战胜利的期待，也是她对克服人性弱点上取得胜利的期待。魏兆琦在黄雍最需要他的时候突然降临，然

后又悄然离去，后来竟然渺无音讯，黄雍夫妇多次打听他的消息，也一无所获。

黄雍一上任，就到重庆、乐山、雷马屏峨等地四处奔忙考察，为荣誉军人垦殖团和工厂农场选址。在工作卓有成效的时

候，陈诚和何应钦两派之间的矛盾扩散到荣誉军人生产事务方面，有陈诚系的人责难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摊子太大，要“与民争利”。不过，这些流言蜚语并未影响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局人员的工作热情。 

完全而发出黑色有刺激性之烟；迨至欧洲大战之时，因科学之进步，遂利用化学方法，制成白色无刺激性之烟，专作遮蔽之用，更制成有毒之烟，以伤害敌人。各种烟雾，不惟用之陆地与海面，更可用之于空中，以掩蔽城市，防御敌机之袭击，及空军之自卫，此种欧战中重要之化学兵器，亦将来战争所不可或缺者。”

该书主编为化学兵器教官张郁岚。张郁岚，江苏灌云人，化学博士，留美烟幕剂专家，为中国化学会会员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国防化学委员会委员、南京军政部兵工署职员。著文有《硝磺审检法》（1929年载《兵工杂志》创刊号）、《发烟剂之研究》（1934年4月载《中国化学工程杂志》）、《毒气制备实验法》（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8月初版）。校阅三人：一为少将瓦斯学教官吴沆，别号戒逸，河南商城人，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化学硕士学位，曾任河南大学教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技术司司长；二为上校化学兵器教官朱骥，浙江瑞安人，兵工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化学会会员；三为上校瓦斯学教官汪浏，字君亮，江苏常州人，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化学系，获化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军政部

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教授，1950年以后，历任天津市工业局技术研究室主任、工业试验所一级工程师、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中国化学化工学会天津分会理事兼秘书长，主要从事有机磷农药合成的研究，著有论文多篇。

黄埔军校各科教程虽存世颇多，唯签名本稀少，而笔者所藏《化学兵器教程》幸为签名本。赠书者是化学兵器教官张郁岚，其在封面毛笔书写：“志安吾兄雅正，张郁岚敬赠，十九（1934年10月9日）”。内页则有受书人陆志安亲笔签名及钤印名章。陆志安，江苏南通人，南开大学化学教授，中国科学社化学股社员。

黄埔校史记载：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引起本校对化学兵器教育的重视。自第8期开始，先后选任化学兵器、瓦斯学、军用化学教官达30余名，大都为国外欧美留学及国内名牌大学毕业，如张郁岚、吴沆、朱骥、汪浏、洪瑞棻、程祥荣、许世庸等；余为军政部防毒军官班一期（同中央军校高教班4期）毕业学员，如侯怀道、邓廷璞、张镇国、刘敦钦等。当时化学战一向被国际认为不合法，可是各国又都在秘密成立用毒部队，本

校也不宜明设化学兵科，只在各期炮科实施化学兵器教育。国民政府为防御日军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1933年2月决定由军政部组建化学兵队，为了对外保密起见，去掉“化”字，称军政部学兵队，未几改编为学兵队干部训练班，之后又设防毒处，继而逐步发展扩大防化兵团，配合各部队防毒机构协同作战。直至1941年7月，该班才奉命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改为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

中央军校特科之沿革

中央军校特科全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科干部教育班，其前身为军政部（化）学兵队干部训练班。军政部于1933年2月8日在南京花露岗妙悟律院成立（化）学兵队。1937年9月改编为学兵队干部训练班，类同军事专科学校，招收大学高初中学生，对其施以两年半及短期化学军官养成教育，实为建立化学兵团之开端。队长兼班主任为李忍涛（1904—1943），云南鹤庆人，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入美国维吉尼亚军校，1929年又留学德国深造，专攻军事化学。1931年学成回国服务中央军校，曾任留德军官预备班主任等职。副主任齐清儒。化学教官多是英、美、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另外有少数是清华和燕京两大学

化学系毕业的，他们的职衔分别为上、中、少校。

学兵队第1期招收学生70余人，均为各部队保送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军士。1933年7月招考第2期学生180余名，因庙小人多，是年冬迁到上新河营房训练，次年春又迁到通光营房。第3期共五级，系1934年、1935年、1936年先后在南京通光营房和三牌楼营房入伍，其来源大部分是招考的学生，小部分是部队保送的军士，约计800人。第一级因为是1934年3月19日入伍，故称为三一九级；第二级是同年6月1日入伍，称为六一级；第三级是同年9月19日入伍，称为九一九级；第四级是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入伍，故称二四级；第五级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入伍，称为二五级。1937年冬，因抗日战争影响，由南京三牌楼营房迁到湖南省桃源女子中学校内。1938年，在桃源招考第4期学生200余人，按入伍先后分为4级，四一级（即第4期第1级）50余人，文化程度高中到大学；四二级计100余人，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和高中学生，少数是从学兵队选拔的优秀军士；四三级计29人，部分是具有高中或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学生，少数是挑选优秀军士经过考试录取的；四四级计40余人，这是由

一支艇队改编入伍的，学员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不久，校址经贵州迁移四川泸州川南师范，后又迁驻纳溪县双河场。第5期从军政部入伍生团选拔700余人，计分5级：（按入伍先后，分别为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级）。第6期190余名（按入伍先后，分别为六一、六二、六三级）。第7期200余名。第八期280余名。

1938年5月，在四川纳溪成立防毒军官训练班（简称防训班，李忍涛兼班主任），招考具有大学毕业学历的学生，施以短期专业培训后，作为技术军官使用。大部分派到前方部队任防毒教官，留小部分在防毒处和学兵队任技术军官。至1939年止，计办1、2、3期（同中央军校高教班4、5、6期），修业期4至6个月，毕业学员122人，解决了当时部队急需防毒教官的问题。

1940年4月，学兵队奉颁新编制改为总队（总队长李忍涛，副总队长李西开，参谋长姚楷时），将干部训练班改为学生队，队长谭坤，同时将防毒军官训练班改为学员队，队长李宗祥；学员队只办1期（同中央军校高教班7期），毕业学员44人。

1941年7月，奉命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正式改为中央

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1943年10月28日，李忍涛殉职，主任一职前后由汪逢栗、翟念浦继任。1945年9月，奉命改隶军政部，改为军政部化学兵干部训练班。嗣以军政部改组，即改隶联合勤务总司令部。1947年4月，正式改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化学兵干部训练班。1948年2月，奉命并入兵工学校改为化学兵组。以上为该班成立经过之梗概。

自学兵队成立后至改为化学兵组止，共计训练学员生2598名。该班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后，将各期比照同时军校各期，核准第1至8期依次改叙军校12至19期特科。奉准防毒班1、2、3、4期比叙军校高教班4、5、6、7期，计毕业学员166人。

学员生训练及分发

干训班以学历分为甲乙两组，甲组为大学文化程度称学员；乙组为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称学生。

甲组学员通过4至6个月的短期教育后，成为具有防毒技能的军事人员，以担负师以上单位的防毒工作。对他们的训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基本军事训练，学科方面有典、范、令等，术科方面有各种制式教练、野外演习等；二是专科训练，学科方面有

化学战剂、化学战防御、化学战术、气象学、侦毒技术、防毒技术、消毒技术；术科方面有侦毒、防毒、消毒等各种技术教练、演习等。

乙组学生则为两年半训练，分别依序进行入伍、军士、军官、专科教育；其中除专门教育时间为一年外，其余教育时间各为半年。学科方面：典范令、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简易测绘、化学战剂、化学战防御、化学战术、气象学等；术科方面：徒手教练、持枪教练、班排连战斗教练、野外演习以及步兵轻重武器的训练。对排、连长职责的练习，施行勤务制度，除区、分队长负责主要行政管理和正式教练外，学生中还另组一套勤务班子，由学生自己分别担任区、分队长等勤务，受正式值星官的领导，进行课堂、操场、野外等指挥工作。这个勤务制度的优点是：平时可以减少军官们的工作，让他们有时间去钻研科技；战事中遇到军官中有伤亡时，各级勤务人员就可以接替继续指挥，这也是该班教育的特点之一。

专科方面除学科系统学习相关化学教程外，术科有投掷化学手榴弹，轻重机枪射击训练，加之八二化学迫击炮、李文斯式抛射炮、吹放钢瓶、汽车驾驶修理等。最后学防毒学，



/ 中国军队佩戴防毒面具演习。

如毒气种类，侦毒、消毒、用毒等，及化学战术和使用毒气之时机（地形、风向、风速、温度）的掌握等。这些学术科，都是一面讲授，一面试验和练习。由于学术科繁多，班主任李忍涛每次升旗讲话时都谆谆告诫大家，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不能不懂装懂。为此，教官在讲课或教练前，一律都要做到备课和预习，掌握好授课时间和反复讲解重点；学生们也学得非常认真，不懂就问，直到弄懂为止。毕业考试时，学生对一些重要公式和操作，都做到了反复硬背和预习，取得了优良成绩！

干训班的学生毕业后，以准尉见习待遇，分发到军政部学兵总队所属团、营、连担任见习排长，见习半年期满升为少尉。或

分发到军政部防毒处，或担任各军师的防毒军官。带兵官可以调为防毒军官，防毒军官也可以回到总队当带兵军官。在军政部，学兵总队和防毒处这两个单位（李忍涛任总队长兼处长）少校以下的军官，可谓是清一色的干训班毕业生。在学兵总队所属各部队，自营长以下的各级军官，以及全国各正规部队的防毒军官，也全是这个干训班的毕业生，自然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系。

入伍新生之“洗礼”

黄埔 16 期特科刘嘉福回忆：

我于 1938 年冬高中毕业后，考入军政部学兵队干训班第 5 期受训；先住泸州县城川南师范旧

址，后迁纳溪县双河场营房。

在受训期间，最艰苦的是半年入伍生教育。因为班主任李忍涛是留学美国、德国学军事的，所以干训班及学兵总队的训练方式也是采用美式，特别是德式的那一套，有时要一动不能动地站立两个钟点，除非上级开恩，不然你就休想动上一动。其好处是队形整齐不变，可是，站得腰酸腿痛，真是够呛！还有奇特的胸符佩带方式，就是新生胸前符号必须要翻过来带，以示新老学生之别。

再举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1、“新兵路线”：训练的目的在于养成具有军人的气质，不投机，不取巧。入伍新生除排列队伍行走之外，个人行动一律要走“新兵路线”，即不管狂风暴雨或烈日当空，不管白天黑夜，行走要挺胸抱肘、两眼平视，两手握拳于腰际，而且要走直角，不能斜穿，不能取捷径。连夜间解手、进厕所，也要走“新兵路线”，否则被老兵发现，就说你是阳奉阴违，轻则训斥，重则叫你原地跪下卧倒，之后重走至厕所为止。处罚回来后，还要按时向其报到，然后写军人训诫、党员守则或总理遗嘱若干份等等。

2、“钉墙”：本班非常注重风纪整肃，新兵稍一不慎，就要受罚。新兵每日服装仪容姿态

等都要受老兵检查，检查时要立正，做到精神饱满，注目行礼，若发现内外衣裤有一个扣子不扣，或皮带没有扎紧（以不插进三个手指为度），就要被捶胸扣肚。如果屡教不改，态度顽固，不服从老生管教，或垂头丧气、精神萎靡不振、弯腰驼背者则被罚“钉墙”。“钉墙”即令你背墙而立，小腿、臀部、两肩、后脑壳紧贴于墙，两手平伸，掌心向外，手背贴墙，整体垂直于地面成90度，活象个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钉墙”多久由老生规定，若“钉墙”数十分钟，就会大汗淋漓，浑身酸痛。故此，人人养成笔直的军人姿态。

3、“报到”：任何一个老生，都可以随便通知任何一个新生到他那里去报到。去时要按老生规定的时间、地点，按部下见长官的礼节，要求很严格。报到的内容很多，有时是因老生发现了新生的某种错误或缺点，叫去予以斥责或指正；有时是找麻烦，如叫新生数一棵树上有多少片叶子，或替他抄笔记等等。新生决不准强调任何理由不服从。如态度不好或抗拒，就会遭到斥责，甚至体罚。

4、“扣肚”：一种惩罚方式，除了打手板、罚站、罚跪、钉墙、举枪两腿半分弯等方式外，还有一种是全班特有的，也是最常用的惩罚方式，那就是扣肚，即叫

受罚者立正站好，施行惩罚者就以拳击对方的小腹，令人想起来就头痛。

5、“战友洗礼”：新生入伍期满，就要举行“战友洗礼”的仪式。全班官生集合，由班主任训话，宣布新生入伍期满，指出今后努力方向和要求，最后由老生排成面对面的两列纵队，对面两人间隔一米各以一只手相互握住，高举过头，形成一条甬道。各人以另一只手握刺刀鞘或皮带。入伍期满的新生则站成一列纵队，鱼贯而入，通过甬道。待新生一入甬道，老生就用刺刀鞘或皮带抽打新生的屁股，跑得快者少挨打，跑到了尽头，“洗礼”仪式就算结束。

记得1939年6月我在泸州受“洗礼”时，手背虽被“五一级”的老生误打出了血，但我还是不顾疼痛跑了过去，在走回来的时候，就把胸前符号翻过来带好，这时老生已经站成一列横队，欢迎我们已参加了所谓的“战友集团”。接着，新兵与老兵由头到尾一个接一个地紧紧握手，表示已成战友。我一面和他们握手，一面又笑又流泪，过去为教育新兵所存在的芥蒂一笔勾销，前嫌尽释。从此开始享受老生待遇，也照样可以找新生的麻烦了，遇事还可以用“战友”身份去找队长，甚至找总队长去申述。

这半年的入伍生活可真难熬

呀！事隔多年，一想到当时入伍生的生活还心有余悸。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套找麻烦的教育呢？主要是训练你要遵行班训“阳刚、诚实、乐观”，爽直不搞阴谋，学会忍耐，不怕艰苦，奉行下一级绝对服从上一级，总之对入伍生实行了许多洋办法来找麻烦，那滋味可不好受。

学兵队炮轰日军司令部

黄埔 14 期特科戴威回忆：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帝国主义者继 7 月 7 日在卢沟桥挑起战火以后，仅隔 36 天，又在上海以其陆海空三军优势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在吴淞江湾一带强行登陆，大举进犯上海。

8 月 14 日，军政部（化）学兵队正在南京三牌楼营房受训，队长李忍涛集合了我们第 3 期六一级的准尉见习官和第 1、2 期的部分同学，宣读了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手谕，命令我们编成一个李文斯式抛射炮联队，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的战斗序列。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无不为之激动，深为能亲临前线与日本侵略者作战而自豪。

在编制时，我们联队编成了 4 个排，每排 4 个班（3 个炮班，1 个弹药班）。每个炮班配属一门李文斯式抛射炮，每班 16 人，除正副班长 2 人外，前 6 名士兵

组成炮组，后 8 名士兵组成弹药组，正班长指挥炮组，副班长指挥弹药组，整个联队 300 余人，共装备 12 门李文斯式抛射炮。

这种抛射炮为英国人李文斯发明，故以其名命名。炮的口径是 15 公分，专用于化学战剂的发射。它没有炮架，只有一个圆形凹底炮座，作战时将炮座及炮身的 2/3 埋在坚固的工事里，用电线将各门炮联接起来，计算好目标方位，以电钮操纵齐放。该炮可根据战场战斗情况，以排为单位或以几个排为单位，也可以班为单位使用，具有一定的杀伤和破坏力，是当时一种先进的武器。

对于这种李文斯式抛射炮，虽然在训练期间，化学兵器教官在讲堂上已讲解过很多理论和使用方法，但还不曾进行过实弹发射，因此在领到武器弹药以后，全联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操作训练，所有观测、瞄准、放射等科目都要在一两天之内掌握运用，并且这一套技术每人都要轮流学习操练。由于教官抓得紧，同学们勤学苦练，大家掌握得都很快。

8 月 17 日，我们联队奉命开赴上海。当日下午 5 点多钟，由驻地南京三牌楼营房出发，乘军用卡车直抵下关车站。夜里 1 点多钟，登上军用列车开往上海。火车驶出南京车站后，每经一站都有当地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向我

们献茶奉水，并送上糖果、面包来慰劳我们，还高唱救亡歌曲，共呼抗日口号，使我们所有官兵心情分外温暖，更加振奋。

火车于 18 日午后 4 点多钟抵达上海南翔，我们在此下车，休息待命。这里离前线不是很远了，附近村庄竹林中已有友军隐蔽着，经过联系知道是 36 师宋希濂的部队，他们是当天早晨到达南翔的，也在驻息待命。他们对我们说，这里常有敌机前来骚扰，汉奸活动频繁。正谈着，忽然发现天上有信号弹，他们说敌机快来了，一面说着一面派人去搜查发射信号弹的汉奸。我们立即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炊事班马上将炊烟遮挡起来，武器车辆等笨重物件也施以伪装。不一会儿，果然有 6 架敌机飞临我们驻地上空，开始低空盘旋，接着机枪扫射和投弹轰炸。我部联络参谋黄其祥当场被炸死，一名炊事兵也给炸伤了。不远处的马路旁边，一个友军的传令兵也被炸死倒在水沟旁，大家莫不愤慨无比，都表示要给死难者报仇雪恨。这时候已夕阳西下，我们队伍又重新集结起来。晚餐后，前线来了卡车，把我们送往江湾，一路上看到各兵种的增援部队，以及后勤补给的车辆和骡马纷纷奔向前线，中央军校桂永清教导总队的战车营也开了上去。这原本一条宽阔的马路，如今显得十分拥挤，因此

行进速度十分缓慢。当我们车队到达万国公墓便停顿下来，这时前方的步枪、轻重机枪以及炮弹的爆炸声音，都清晰可闻了。不到一小时，联队长李忍涛从前线作战指挥部回来了，马上召集排长们传达前进命令并部署各项任务。当我们按照地图到达指定阵地时，距前线只有三四百公尺，联队长随即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带领着1、2两期当班排长的同学去侦察地形，准备构筑工事，安置炮位。阵地附近有几幢散落的洋房，据说是复旦大学校长的公馆，这些花园别墅四周都有围墙，占地也不小，足够我们设置指挥所、驻屯部队、构筑工事和安置炮位。我们所使用的是抛射曲线前进的炮，这儿的地理地物很理想，不易被敌察觉，警戒也方便。

前线指挥部给我们的命令很紧迫，要在两小时以内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在我军前线步兵向敌人发起攻击之前，务必摧毁日军设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那座四层钢筋水泥司令部，那是敌人的指挥中枢。联队长要求各炮组发射化学炮弹攻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给以倭寇巨大打击，方能显出我化学兵之神威。

我们4个排共12门抛射炮，采用火力重叠式布置，集中一个目标（日军司令部），以两个排6门炮为齐放单位，各炮用电线联


接，准备完毕后，即待上级下达炮击命令。

前线指挥部的攻击命令下达后，我们便配合友军的各种近距离火器向敌军司令部炮击，第一次发射未能击中日军司令部大楼，遂立即修正了距离方位，进行第二次发射，只听得“轰”的一声，一下便穿入第四层营房，黄磷燃烧弹与爆炸弹发挥了它特有的强大威力，从观测镜中看到日军司令部大楼上空出现大片红光，浓烟滚滚，大楼里的敌人鬼哭狼嚎，四处逃窜。我们继续朝着这一目标接连三次齐放，直到观测员报告说日军司令部大楼已倒塌湮没了，我们这才停止放射。随之敌军枪炮声便沉寂了下来，紧接着我军前线步兵奋起向敌人发起冲锋，一时间号声、炮声、枪声、喊杀声响彻云霄。“我们胜利了！”联队全体官兵学生手舞足蹈地高呼着，这一大捷使我们这些青年军人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到光荣与自豪。第二天，上海各大小报纸，都以头版头条新闻，用醒目铅字刊登了“日司令部残破，第四层完全炸毁，各楼层玻璃窗宛如蜂房”的消息，并载入抗战史册。

上述回忆录表明学兵队既是一个训练机构，又是一个建制部队。1940年4月，学兵队扩编为学兵总队，总队除干训

班外，总队部还陆续扩充了一些直属部队。有军士队、汽车营、工兵营、通讯营、高射炮营、特勤连、骑兵连、烟幕连、气象队、电艇队等。电艇队的电艇是无人驾驶，用无线电遥控指挥，据说艇内装满炸药的威力，仅将海水炸开复合的力量，就可以把军舰压瘪；如撞上敌舰，必被炸毁，是制服敌舰的进攻性武器。特别是遥控指挥在当时是很新颖的，这个队后来调到宜昌，协助宜昌要塞固守江防。

在团的建制上，学兵总队迁到四川时，只建立了两个大队，以后陆续在四川纳溪扩大为第1、2炮兵团，相继又成立了第3、4两个步兵团。每个团有3个营，每个营有4个连（其中1个是辎重连）。连以下仍是三三制。团的装备以八二化学迫击炮为主，防毒、侦毒、消毒器材为辅。士兵除步炮装备外，还配有德式钢盔，防毒面具、化学手榴弹等器具。

至此，化学兵已分成三个单位：一是学兵总队，二是中央军校特科干部教育班，三是主管全国全军防毒部门的防毒处。李忍涛兼任三个不同性质单位的主官，晋升为中将。1943年10月24日，李忍涛由昆明飞印度前线视察学兵总队重炮两团，不幸于28日回国途中因飞机失事殉职，时年39岁。



1926年5月5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第一分校(南宁分校)成立

□ 贾晓明

1926年5月5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南宁分校)成立。关于该校的历史沿革、组织管理、师生构成、教学内容等,本刊有详细研究,这里不再赘述。本文特选择发生在该校四位校长身上的四段颇具代表性的故事,加以整理,呈现给读者。

俞作柏:制定“先倒桂后反蒋”计划

俞作柏是南宁分校第一任校长。他青年时期参加同盟会,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并作为新桂系将领,帮助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平定广西。两广统一后,俞作柏率部参加广州国民政府平定邓本殷叛乱的战斗,取得胜利,于是声望日高。

在广州期间,俞作柏和中共干部、苏联顾问多有接触,并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向导》《革命周刊》等书刊,思想大为进步,很快成为广西国民党人士中的著名左派首领。据李宗仁回忆,俞作柏曾对苏联顾问说李、黄、白三人“不



/ 俞作柏。

革命”,因此引起李、黄、白的嫉恨。在广西军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后,俞作柏被剥夺旅长职务。决定削除俞作柏兵权后,李宗仁等任命其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南宁第一分校校长。俞作柏以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全力举荐自己的亲信团长李明瑞接任旅长。而李、黄两人也不想将事情闹大,为了不使该部生变,也就同意了俞的要求。俞作柏不久又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兼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农工厅厅长等职。

任职期间,俞作柏任用共产党人,支持学生运动和农民革命,得到工农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北伐期间,俞作柏的胞弟俞作豫在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团长,因作战勇敢多次立功,却遭到时任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打压和排挤,无奈借故辞职。俞作柏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白对我不满”。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桂系背叛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追随蒋介石,在广西大肆“清党”,俞作柏则继续表示拥护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桂系“闹翻”,险遭暗杀,于是避居香港。在港期间,他与共产党人士多有接触,并参加了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的活动。

1927年秋,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委派俞作柏为东江军事专员到汕头策动军民支援南昌起义南下大军。因起义军失败,俞作柏返回香港。1927年12月,共产党领导广州起义,俞作豫参加了起义的部分组织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俞作柏利用社会关系,掩护一批共产党员转回香

港。

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前，俞作柏曾提出“先倒桂后反蒋”计划——“利用蒋桂战争，自己站在蒋的一边来打倒桂系，然后再进行倒蒋”。随后，他接受国民革命军陆海空总司令部上将参议一职的任命，并派人秘密赶往武汉，联络在第4集团军任师长的李明瑞“从中倒戈，使李、白措手不及”，李明瑞表示同意。战争开始后，李明瑞在阵前宣布“独立”，致使桂系第4集团军瓦解。蒋介石遂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绥靖总司令（也称第四编遣分区主任兼军事特派员）。

7月3日，俞作柏、李明瑞率部回广西主政后，既要防止李、黄、白桂系军阀卷土重来，也要时刻对蒋介石企图乘机吞并广西的企图加以防范。为此，俞作柏并不执行蒋介石的指示，而是效法大革命时期的做法，“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到广西指导工作”。中共中央先后派邓斌（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省政府与军队中工作。

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俞作柏等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工会农会会员和进步青年，委任部分中共党、团员在军事和行政机构内工作；宣布开放群众运动，实行“二五”地租政策；为农民军提供武器弹药。俞作柏

还把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分校的入伍生团，与第2、第3两期学员合编为教导总队，由教导总队抽调100名中共党员任连排长，组建了广西警备第4大队和第5大队，由共产党人张云逸为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兼军校教导总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5大队大队长后兼龙州督办等。

1929年8月，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密谋发动讨蒋战争。蒋介石害怕俞作柏和“改组派”联合，派人到广西游说，遭到拒绝。到了9月，张发奎通电讨蒋，并率部向广西进发。蒋介石认定俞作柏“已有异志”，立即调集兵力准备进攻广西，同时命令俞作柏、李明瑞到南京“听训”。俞作柏、李明瑞遂仓促决定起兵。俞作柏宣布讨蒋后，中共认为教导总队和警备第4、第5大队还没有训练好，且战事一起，需要有兵力维持后方治安，于是建议将这3支部队留在南宁，得到俞、李的同意，并决定由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由于俞作柏主政广西不满3个月，其所能指挥的部队中大部分旧军官也没来得及清除，对士兵的整顿也尚未完成，因此其讨蒋行动很快失败。在第5大队的护送下，俞作柏由龙州经越南去了香港。

李明瑞：指挥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五省



/ 李明瑞。

李明瑞在1929年6月至10月主政广西期间，曾担任过南宁分校校长（当时称广西各部队干部训练所，李任所长）。讨蒋失败后，随着蒋介石的大军压境，李明瑞深感兵力薄弱，指挥所部离开南宁。其中，邓小平、张云逸率第4大队、教导总队开往百色，进入右江地区；俞作豫、李明瑞率领第5大队开往龙州，进入左江地区。

俞作豫在龙州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改编了武装，恢复革命群众组织，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地主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革命口号，对李明瑞触动很大。11月初，李明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认真反思“倒桂反蒋”失败的原因。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广西党组织，加强对李明瑞的教育、宣传和统战工作，很快使他从根本上转变了立场，决

心彻底脱离军阀阵营，投身革命。

这时，邓小平和张云逸在百色商议举行起义，并决定吸纳李明瑞参加起义。11月中旬，邓小平亲赴龙州，劝说李明瑞参加百色起义，李明瑞欣然应允，并和邓小平一起回到百色策划起义。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中国红军第7军在此诞生。百色起义后，李明瑞从百色回到龙州，筹划举行龙州起义。1930年1月，李明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月1日，按照邓小平和红七军前委的部署，广西警备第5大队和龙州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共2000余人，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颁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宣布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左江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任。3月20日，新桂系以优势兵力突袭龙州，红八军英勇迎击后突围，在滇桂边、黔桂边与敌人转战半年，行程数千里，于10月下旬在凌云县与红七军会师，后编入红七军。

李明瑞等带领红军将士坚决抵抗，并成功突围，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连克多个城镇，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5月，红七军进入贵州，在李明瑞的指挥下攻

克榕江县城。6月，李明瑞等指挥红七军回师广西，光复了百色城。战斗打响后，张云逸与李明瑞亲临前线指挥。他们发现敌人的一个碉堡十分坚固，手榴弹、炸药包无法炸开，立即决定使用刚刚缴获的山炮轰击。当时山炮只剩下三发炮弹，为了保证发命中，张云逸、李明瑞和战士们把山炮抬到山上去抵近射击。山炮很快被架设在离碉堡200米一个火力死角处，李明瑞亲自瞄准，只发射一炮，就将碉堡摧毁。接着红七军挥师西下，收复右江沿岸多个县城。7月，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红七军在果化地区击退了滇军的进犯，消灭敌人600多人。

11月7日，红七军在河池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党代会闭幕后第二天，红七军进行整编，改为师团制，李明瑞任总指挥。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占领了全州县城，并召开总前委会议，决定向湘桂边挺进，进入江西同中央红军会师。就这样，李明瑞等指挥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5省，历时近两个月，行程7000里，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战斗百余次，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1931年春胜利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李明瑞任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部队，取得安福等战斗

的胜利，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5月，李明瑞任第7军军长，7月率部东渡赣江，在江西兴国与一方面军主力会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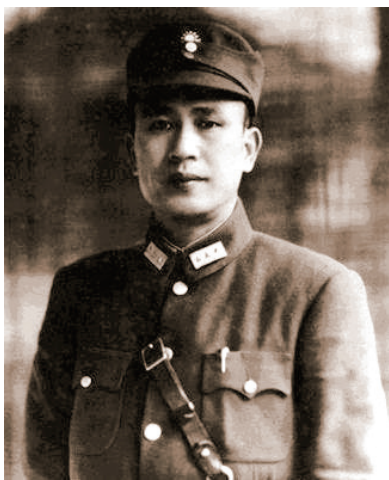
为了表彰红七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其一面“转战千里”锦旗。在瑞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亲切接见了李明瑞。

白崇禧 向共产党人学习持久战、游击战

白崇禧曾多次出任南宁分校校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9月，国共两党重新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周恩来在武汉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在桂系内部工作的谢和赓和刘仲经常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系，互相交换抗战情况，并对桂系的作战计划提出建议，“甚至白崇禧的军事演讲稿也由谢和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进行修改”。程思远曾回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就把该文章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不久，“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

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1938年初，广西学生军500多人路过武汉开赴鄂豫皖前线时，白崇禧委托程思远去请周恩来给他们做抗战形势报告。徐州会战和台儿庄大捷前，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行前他特请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到他的寓所，当面请教对敌作战的指导方针。周恩来向白崇禧建议：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张云逸的第四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向北支援南下的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又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周恩来还向白崇禧提出：徐州会战时，建议蒋介石必须给予李宗仁统一指挥五战区内所有部队特别是指挥和调动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央军的权力，否则步调不一致，就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表示完全赞同。周恩来对白还着重谈到：张云逸指挥的新四军的游击战，一定在津浦线配合整个战役，支援五战区的部队向敌猛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截断



/ 白崇禧。

敌人的供给，夜袭敌人的重要据点。同时，张爱萍将军又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该军也大力支援五战区的战争。”周恩来还对白崇禧说：“为了使战区的正规部队知道新四军、八路军全力支援国军，希望李长官能把此支援的事向军、师发出密令通告，以增加将士对敌作战的信心。”

武汉会战期间，李宗仁旧伤复发，急需手术治疗，白崇禧遂代理其战区司令官职务。在整个会战中，他坚持亲自拟订作战步骤，先后组织了数十次大小战役。后身患恶性疟疾，体温超过摄氏40度，仍坚持指挥作战。蒋介石闻知此事，特派人送去特效药给白服用，才控制住病情。不久，白崇禧患上风湿症，“腰部酸痛，行动困难，被送进医院，一周后病情好转，他就急急出院，继续参与前线军事斗争”。

10月24日，武汉弃守当晚，白崇禧送蒋介石飞离武汉，然后驱车到鄂北钟祥与李宗仁会晤，后准备前往长沙。途中，他的汽车发生故障。不久，周恩来乘汽车从后面开来，下车告诉白“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邀请白坐他的车同去长沙。白崇禧欣然上车。一路上两人相谈甚欢，探讨了“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精辟见解给白崇禧留下深刻印象。周恩来并向白提出要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希望给予协助，白当即答应。

1938年11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设立游击训练班，调集各省军官训练，请八路军教练游击战术。蒋介石表示赞成。不久，“游击干部训练班”在南岳成立，蒋介石任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具体主持“游干班”的工作。八路军应邀派去了一批干部担任教官。1939年冬，白崇禧在军训部曾组织编写了《游击战纲要》，颁发给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学习游击战的教材。

薛岳：发明“反八字形阵地”

薛岳曾于1931年2月至7月期间担任过南宁分校校长。1938年，日军占领九江后，其11军所属106师团于7月28日沿南

浔铁路两侧向沙河镇、南昌铺进攻，企图攻取德安。8月1日，薛岳奉命指挥九江至南昌以及鄱阳湖周围战事。他把7个军的兵力部署在德安、瑞昌、庐山地区，做好布置后，他对各军、师长指示说：“敌必以主力先犯南昌九江，次犯武汉、长沙。凡我军入务必共下必死之决心、必胜之信念与此三地共存亡。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薛岳在南浔正面部署了“反八字形阵地”应敌。对这个阵法，薛岳曾解释说：“该阵地如张袋捕鼠，如飞钳剪物。敌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犯中则左、右应。日军很难撞破这道南墙。”

日军106师团等部多次发起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参与进攻的1.6万多人伤亡近半，元气大伤，直到27日，经修整补充后，才在其他部队的支援下恢复了进攻。

薛岳断定，日军106师团孤军冒险轻进，犯了兵家之大忌。中国军队按照薛岳部署，利用地势层层设关，且战且退，不断消耗敌人，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骚扰、侧击敌之后勤补给线。10月2日，日军106师团主力推进至万家岭。万家岭一带，重峦叠嶂，地形复杂，山路崎岖，连驮马都不易通过。机会难得，薛岳随即给武汉军委会和第九战区司



/ 薛岳。

令部发电请示：拟抽调大军，歼灭突入该敌，以定后方。蒋介石迅速回电表示同意，并表示再调遣部队支援薛岳。薛岳于是调集约12万人的兵力，会同负责正面阻击日军106师团的第4军，迅速将进攻之敌包围起来。

10月1日至3日间，第4军部第58师向已占领万家岭等地的日军连续攻击。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拼命反击。直到4日，双方持续激战，阵地几度易手。薛岳率领参谋人员由南昌推进到德安西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就近指挥，并召集前线将领训话说：“参加围攻的各部队一律有进无退，违者斩！”此时，薛岳调遣的各部队已陆续靠拢，对106师团形成合围之势。日军空军发现106师团被围，立即告知该部队向北转进，向第27师团靠拢，同时命令27师团接应。日军106师

团这才发觉情况不妙，急忙组织突围，却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一连两天也没找到逃生之路。

10月5日至6日，中国军队坚守阵地，在多处和突围日军激战。据说当时蒋介石曾两次联系薛岳说，74军“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结果遭到薛岳的严词拒绝：“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74军长，伤亡都比74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74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10月7日，薛岳认为歼灭当面日军的时机已到，下达了总攻击的作战命令。当晚8点，第66军、74军奉命进攻。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日军106师团损失惨重，特别是日军基层军官伤亡严重，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才得以暂时稳住阵脚。

薛岳又命令各部队选拔士兵200至500人组成奋勇队，担任先头突击，同时命令各部长官一律靠前指挥。薛岳自己也亲临一线督战。经连夜血战，日军的防御阵地彻底崩溃。10日晨，中国军队收复万家岭在内的多处重要阵地，日军残部几百人被压缩到不到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武器装备损失殆尽。鉴于基本歼灭106师团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薛岳命令各部撤出战斗。■

你不知道的台湾： 两岸应知道的台湾历史故事

(十一)

□熊子杰

第十一章 日本：从未放弃占领台湾的图谋

台湾地处欧洲往来东北亚航线及美洲通往东南亚之要道上，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国船只往来亚洲的中继与货物转运站。尤其在16世纪，欧洲海权大国崛起，英、法、荷、西、葡等国，无不视台湾为往返欧亚的补给站或休息站，甚至把台湾当作对中国大陆贸易的交易中心或是走私中心，许多大陆商人将丝绸、茶叶、陶瓷、珠宝、金银饰品等物品运到台湾卖给欧美及日本商人。就是这一层商业利益及地理优势，使台湾变成欧亚新兴海上强权觊觎的瑰宝，他们无不想尽办法巧取豪夺。

早期欧美强权船只到台湾基本上都是暂时性的，欧美列强攻打台湾，也不是为永久占领台湾，而是为贸易及商业考量。他们只是向清廷施压，抢夺岛上资源，或为船只避难及补给等，都是属短暂性停留，从未想永久占领台湾，当然他们也不

会致力建设台湾。

然而与台湾毗邻而居的日本，对台湾的态度却非如此，这位恶邻一天到晚觊觎咱家围墙内的甜美果实，对侵略台湾是有深谋远虑的，甚早就积极布局，想有计划地占领台湾，甚至占领全中国。历史上，日本对台湾的侵略可分三阶段：

第一阶段：趁火打劫阶段。在元代中期至明代中期，以乌合之众的海寇为主。后来，一些日本诸侯也见猎心喜，组织正规海盗军加入。

第二阶段：偷鸡摸狗阶段。从明代末期到清代末期，以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为主，是有计划地占领台湾，甚至中国大陆、朝鲜。

第三阶段：明目张胆阶段。从清末到民初，日本的明治天皇时期，直接发动侵略战争，如甲午战争及二次世界大战，这时日本野心更大，意图并吞全亚洲，与德国及意大利结合想并吞全世界。

趁火打劫：元明日寇四起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大元后，1274年及1281年两次发动战争，渡海攻打日本，但都铩羽而归。1283年忽必烈还想第三次攻日，但因众臣反对，加上前两次挫败，元世祖心中不免迟疑，再加上打仗耗费金钱，国库空虚，内政混乱，最后还是打消第三次攻日的念头。元世祖两次攻日，虽都失败，但也重创日本，日本认识到蒙古大军的可怕，知道忽必烈必有第三次行动，而且规模会比前两次还大，于是日本全国都处于抵抗元朝的高度压力下，将全部资源投入在防元朝的工作上。此时的日本，幕府逐渐失去控制国内的武士集团的能力，导致日本镰仓幕府于14世纪中叶时瓦解，日本群雄四起，诸侯割据，战乱不断，进入战国时期，即所谓的“南北朝时期”（1336—1392）。日本国内政治动乱，物资缺乏，许多武士集团、盗匪集团趁势而起，成群结党，借海上贸易之名，行海上强盗之实，常常骚扰中国沿海及周边

岛屿，如台湾、澎湖等。当时元朝施行海禁政策，禁止一切对外贸易，然而效果适得其反，更促成中日“海盗贸易”的兴起，让日寇更为猖獗。

元朝中期，日本海寇的重点并非台湾，主要是中国大陆沿海省市。然而到元朝末期，中国内部民变四起，元朝已无力顾及海防，日寇更是猖狂，借机趁火打劫。日本诸侯看有机可乘，组织正规海盗军加入海上打劫的生意，当时元朝在澎湖地区设置澎湖巡检司，初期还能吓阻一些倭寇的袭击，到元末时期，澎湖巡检司自顾不暇，毫无能力阻挡倭寇侵袭，许多大陆沿海居民纷纷渡海移居台湾避祸，台湾大陆移居人口一时剧增，岛内经济也急速繁荣起来，但此一荣景却引来日寇的觊觎，使得倭寇侵台次数增多。

根据《元史》记载，在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有数千倭寇突袭澎湖列岛，这是史上有记载的倭寇第一次大规模侵略台湾及周边群岛，此后日寇对台湾的侵袭有增无减，日益频繁。

到了明朝初期，倭寇侵犯问题更加严重复杂，元朝残部流落海外，摇身一变成为蒙古海盗，并与日寇勾结，协助日寇打劫中国大陆及台湾，作为日寇的参谋、向导、马前卒。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对倭寇骚扰头痛不已，遂采闭关自守的政策，施行海禁防堵日寇侵袭，可是日寇骚扰中国的情形比元朝还严重。明太祖对日寇不断骚扰的情形极为愤怒，多次下令备粮练兵准备发兵日本，但受群臣劝阻，并鉴于元朝大军两次出兵日本皆惨败的纪录，以及国内战后百废待兴的状况，只好忍气吞声按兵不动。但姑息养奸，日寇侵袭沿海省份及台湾的行动越演越烈。台湾及澎湖兵单势孤，又由于大陆移民剧增，商业、贸易快速成长，人民生活富裕，就变成了日寇唾手可得的肥羊，成了海盗集团打劫的天堂。

海寇侵犯中国大陆及台湾的情形，根据明朝《明实录》记载摘要如下：

1370年（洪武三年），日寇窜犯台湾及福建。

1380年（洪武十三年）、1382年（洪武十五年）、1386年（洪武十九年），日寇连续三次大规模侵扰台湾。

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裁撤澎湖巡检司，澎湖沦为日寇、盗匪的巢穴。

1419年（永乐十七年），明军在辽东大败日寇，歼灭日寇2000多人，日寇元气大伤，稍有收敛，此后极少有日寇窜犯。

1439年（正统四年），日寇突袭大陆沿海，此时台湾成为日寇的休息站。

1581年（万历九年），日倭侵袭澎湖列岛。

1592年（万历二十年），日寇侵扰台湾基隆、淡水。

直到明朝再次施行开放海禁，日本倭寇才无机可乘，再加上日本政府也为海寇不胜其扰，终于开始管制、约束日本海盗活动，最后才让日本大部分海盗集团无法生存，最终销声匿迹。此阶段日寇侵犯台湾，主要是趁火打劫的海盗行为，也属短暂性停留台湾及澎湖，但第二阶段日本诸侯侵台的野心，却是想有计划地长久占领。

偷鸡摸狗：以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为代表

日本对中国大陆及台湾的肥沃领土及天然资源一直有强烈的企图及野心，到15世纪末，统一日本的军阀丰臣秀吉，对富饶的中国大陆及台湾野心勃勃。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像希特勒一样做起一统天下的白日梦，开始对海外扩张，他发现明朝及朝鲜内部正处于混乱和军事不振的时期，即意图以“假道入唐”（唐就是指中国，当时的明朝）名义，先征服朝鲜，再并吞整

个中国。这一场“中朝日”战役历时7年，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历时最久的战争（史称“万历朝鲜之役”）。

丰臣秀吉的“入唐”计划行动共有两次，两次都采“先取朝鲜，后攻大明”的战略。结果丰臣秀吉两次行动皆未打到中国国境，就宣告失败，无功而返，真是天佑中华。

1592年（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第一次出兵朝鲜，前后共动员20万大军。初期，朝鲜节节溃败，日军势如破竹，在很短时间内就攻下朝鲜主要城市釜山、汉城、平壤等，眼看日军就兵临大明边境，朝鲜火速向宗主国明朝求救，明神宗朱翊钧紧急发兵5万驰援朝鲜，与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合力抵御日军进攻，迫使丰臣秀吉和谈，丰臣秀吉勉强退出朝鲜半岛。丰臣秀吉第一次的“入唐”白日梦就此宣告破灭，但丰臣秀吉并未放弃他的侵华计划。

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2月，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假道入唐”，再次出兵攻打朝鲜，日军还是先盛后衰，明朝紧急调8万大军驰援朝鲜，最后一场战役双方持续了5个星期，日军大败，丰臣秀吉羞愧积郁，1598年8月在日本京都伏见城内暴毙。在朝鲜作战的日军得知消息，全军无心恋战，夹着尾巴仓

皇撤出朝鲜逃回日本，但多数日军还是被中朝联军歼灭，丰臣秀吉的第二次“入唐”梦又告破灭。

这两次战役，丰臣秀吉前后共动员了约30万大军，皆无功而返，非但如此，还让自己的政权不保，不久就被德川家康取而代之。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大言不惭地表示，如丰臣秀吉晚年死，“入唐”战役继续打下去，打垮明朝的人说不定不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而是丰臣秀吉。可见日本人对侵略中国的野心，做鬼都不会放弃。事实上，丰臣下一代也还是天天在做侵华的白日梦，侵犯我中国的野心从未改变。这场战争也是历史上日本第一次大规模侵略中国及朝鲜的行为。

丰臣秀吉攻打朝鲜时还不忘染指台湾

丰臣秀吉在“假道入唐”的同时，还不忘台湾这块肥沃岛屿，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丰臣秀吉派遣使者原田孙七郎携带招谕令文书前往“高山国”（日本古代对台湾的称呼），要求“高山国”臣服及纳贡于日本。丰臣秀吉显然对台湾的情资不够，台湾当时既无国更无王，也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统一的“高山国”，当时台湾少数民族部落

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只有许多部落酋长而已，并无统一的领导人，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一把手“国王”，丰臣秀吉的使者来台当然找不到可以呈递国书的“高山国”国王。结果原田孙七郎在不得要领下，无功而返，不但无法完成使命，还损失多人，遭台湾少数民族“出草”（杀害）。（《台湾历史图说（八）：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一）》，《海峡快讯》编辑部，1999年11月17日。）

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德川家康任命有马晴信到台湾，欲霸占台湾港口，将台湾变成日本对中国的贸易基地，并要求台湾（国王）向日本称臣纳贡，可是仍然不得要领，还是找不到台湾的“国王”，结果反而与台湾少数民族冲突，有马晴信俘掳数名台湾少数民族回日本。在侵略过程中，有马晴信与西班牙及葡萄牙人发生严重冲突，最后有马晴信不敌，狼狈地返回日本。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日本德川家康命令长崎代官村山等安筹备侵台事宜，村山等安乃命令次子村山秋安率船舰13艘及三四千名士兵向台湾进攻，这是日本第一次大规模侵台行动。当村山秋安舰队航行至琉球附近时，遭遇到台风，他们仅有一艘船抵达台湾。抵台之日军登岸，却被台湾少数民

族歼灭。这是日本第一次有计划性地侵略台湾行动，结局还是铩羽而归。

此时日本对台湾的侵略战略，从乌合之众的打劫行为演变成有计划的偷鸡摸狗行为。

此次德川家康侵台行动失败，使德川幕府侵台的计划转趋保守，但其他日本人侵台活动仍十分活跃，犯台行动时而有之。1616年，德川家康身亡，继任者德川秀忠原本也想侵略台湾，但都未成功。1633年（崇祯六年），德川家光继任后，改行锁国政策，发布锁国令，禁止日本海上活动，日本在台湾的活动也就渐渐减少。到1641年，共发布5次锁国令，终完成锁国制度，对外交流逐渐减少，此阶段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也暂告结束。

综观这段时期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意图，其最大目的除了领土外，就是想利用台湾作为对中国大陆贸易和南洋通商的中转站或休息站。在这方面，日本人和远渡重洋来台的欧美人目的是没有太大区别的。（《海峡快讯》1999年12月2日。）

牡丹社事件：日本占领台湾东部

1871年（同治十年）10月18日，一艘琉球国的贡船“山原号”（当时琉球同为清朝及日本



/ 石门古战场纪念碑。

的藩属国），从日本回航时，遭遇到飓风，漂流至台湾屏东满州附近，船上69名乘客，3人溺死，66人登陆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屏东高士佛社少数民族杀害，其余12人逃走。1873年，日本向清朝总理衙门交涉，大臣毛昶熙竟无知地答复：“（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本逮到此次绝佳机会，便借毛昶熙所言台湾东部为“无主番界”为由，向台湾东部出兵。

1874年5月8日，日本派遣3000多名士兵从台湾东部屏东车城乡射寮村附近登陆。5月18至21日，日军与台湾少数民族发生零星战斗；5月22日，日军进攻屏东石门村；6月1日，日军分三路全面扫荡屏东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台湾少

数民族部落，疯狂杀害台湾少数民族；6月中，台湾少数民族战败投降；7月，日军占领屏东龟山（今车城乡），开始盖房修路，准备长期占领屏东龟山。

清廷获知后，立即任命在福建的船政大臣沈葆楨为钦差大臣，授予他处理此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命其率兵火速前往台湾。沈葆楨立即征调唐定奎部队6000余人、张其光及吴光亮等洋枪队共8000余人先后抵台，积极备战。此时双方战力情势逆转，我强敌弱。当时台湾南部疟疾肆虐，侵台日军因疟疾疫情，病亡惨重，加上弹尽援绝，正处于相对劣势情形下，日本政府只好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赴中国交涉，最后在英、美、法三国调停下，中日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了《中日北京专

条》(又称《北京专约》),日军于12月1日撤出台湾。日军虽然退出台湾,但此专约内容等于清朝默认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冲绳)属于日本,然而日本还心有不甘,也并未放弃侵略台湾。

明目张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明抢中国东北及台湾

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867年(清同治六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改变基本国策,施行军国主义,鼓吹以武力对外扩张国土时,就一心觊觎中国肥沃的领土及自然资源。日本政府为推行军国主义,施行军制改革,积极推动军事现代化,大量扩充军备、兵源,以备对外作战之需。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已建成6个野战师、1个近卫师,当时服役兵力高达12—13万人。甲午战争之前,还不断派遣间谍、密探到中国大陸、台湾、朝鲜、东南亚等地搜集军事及民间情报,绘制详细的军用地图,但清朝上下却是浑然不知。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矛头首先就对准邻邦朝鲜和中国大陸。1894年7月23日,日军从仁川登陆,闯入朝鲜王宫,逼迫朝鲜驱逐驻守牙山的清军。提督江自康率领2200名士兵搭

乘“高升号”轮船赶赴牙山支援,在毫无警觉及戒备的情形下,被日舰突袭,不幸沉没。日军同时进攻驻守牙山的清军。同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清军和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受到重挫,日军开始借机侵略中国东北。次年2月,日军攻占中国山东的威海卫港,清朝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辽东半岛也全部沦陷。最后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本马关港,于1895年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清朝割让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予日本。原本清朝也割让了辽东半岛,在俄罗斯、德国与法国三国干预下,清朝以赔款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而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从此与中国分离开来,长达50年之久!这50年是两岸人民心中的痛。

当钦差大臣李鸿章代表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消息传回台湾时,全台湾民众义愤填膺、痛不欲生,“绅民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希望清政府能改变初衷。名臣张之洞建议以台湾矿产利益授权英法诸国,希望他们为其利益出面干预,但皆无效。1895年5月25日,台湾人民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李秉瑞为军务大臣,发表宣言,

宣布脱离清朝。此举并非独立,反而是希望能不离开中国,并借此引起国际重视、干涉、调解,使台湾免于被日本统治。

然而,此举还是无法改变台湾被割让的事实,日本侵占台湾已是处心积虑,岂会放弃。日军急迫地在5月29日于北台湾基隆澳底登陆,6月3日攻占基隆,唐景崧和丘逢甲等要员相继内渡大陆。台人辜显荣(辜振甫的爷爷)等人在6月11日打开台北城门,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台北城。此后3个月,台湾义勇军、少数民族等和日军发生大小无数血战,例如苗栗之役、彰化八卦山之役等。同年10月下旬,刘永福在弹尽援绝下,只好弃守台湾内渡大陆,日军占领台湾南部,结束台湾民主国184天的寿命。

此时,日本几乎已控制全台湾,但台湾各地抗日义举并未随之终止,如1907年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东势事件、苗栗事件,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1930年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在50年的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奋勇抗日行动不曾间断,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才告终止。只可惜当时中国政府没能一并收回琉球群岛(今日冲绳岛),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永久遗憾。 